

常德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常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民建常德市委 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



SH122106

常德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常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民建常德市委员会、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

一九八六年元月

写 在 前 面

常德民族工商业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内外夹击下发展起来的。它对于常德城市之形成及城市经济之繁荣，对湘西、川黔边境地区经济之影响，均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本辑的内容主要是，记述了一九〇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常德经济发展变化和商务总会产生的概况，以及常德解放后市工商联三十五年的光辉历程，介绍了本市一批有代表性的行业史和一些具有声誉的厂、店在旧社会挣扎求存的经营管理经验。

编印这辑工商史料，旨在使读者了解常德经济发展变迁情况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掠夺常德人民财富的罪行，深刻认识和理解党的统战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历史题材；同时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搞活经济、振兴常德提供借鉴。

本辑稿件系由市工商联、民建会的几位同志提供。对于他们积极撰写史料、关心和支持文史工作可贵精神，在此谨向他们深深表示敬谢之意。

工商史料是研究我市经济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加以年深月久，档案资料匮乏，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殷切地期望着广大读者和工商界老同志对此提出批评和建议。

编 者

目 录

常德商会会史	常德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工作组	(1)
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三十五年	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工作组	(28)
典当业的兴衰	张俊涛	(87)
钱庄的兴起与变迁	胡建武	(93)
粮食业的往昔	胡建武	(97)
机杼之声话土布	胡建武	(100)
绸布业百年史略	张俊涛	(103)
常德解放前的电力工业	刘元惕	(108)
常德之信托、保险、堆栈、围船之概述	胡建武	(111)
百年老店吉春堂	胡建武	(117)
春记福百货号与燕春肪	胡建武 刘元惕	(119)
聂振茂药号的兴衰历程	聂庆钧	(123)
城乡驰名的刘义茂线号	胡建武 刘元惕	(134)
华晶玻璃厂的经历与变化	易正文	(137)
抗战时期的计口授盐	刘元惕 张俊涛	(146)
商办乞丐收容所史话	张俊涛	(148)
同善堂创办始末	刘元惕 张俊涛	(151)
忆商办商业学校	张俊涛	(154)
川军在常德横征暴敛的片断	张俊涛 刘元惕	(159)
解散袁祖铭部队的见闻	张俊涛 刘元惕	(162)
光明的历程 终身的幸福	谢海泉	(165)

常德商会会史

常德商务总会的建立——常德县 商 会 的 结 束

(一九〇五年——一九四九年)

第一章 常德商业的早期繁荣与 商会前身——会馆的建立

常德居于沅水下游，扼洞庭湖西北之口，历史上曾为川黔要道，湘西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素有“湘西门户”之称，是常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史载，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城内即有药材行。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年）以后，牙行逐步增多，其中以谷米、棉花、桐油、土靛、冰碱、药材等行业较大，这些行号大都开设在大河街一带。城区内仅谷米行就有一百多家。每年沅水上游各县及川黔边境所产之桐油、木材、土产山货……均顺沅水运达常德，湘西北的慈利、石门、桑植、龙山、大庸等地的土特产品，大都沿陆路用车载马驮、肩挑背负，源源输入。而滨湖各县之农产品亦由河湖港汊运来本市行銷。市面店铺众多，商旅云集。清咸丰五年（一八四三年）“百货、盐、茶厘税，

每税约纳银十余万两。”鼎盛时期，进出口货物总值年达三千三百五十三万多银元。据一八六三年《武陵县志》描述当时交通畅达商业繁荣的景象是：“大舟小艇聚城旁，上溯黔阳下武昌”。

由于常德物资丰富，交通便利，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即“乾隆盛世”时期，各地和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海外贸易在闭关政策的束缚下有了一定的发展。许多城市的商业出现了繁盛的气象。这时，江西、安徽、广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北、河南等省来常定居经商者日渐增多。他们各擅一业，为了讨论行情，整理行规，抵制外帮的竞争，扶植本帮在商界的势力，并作为同乡人来往住宿、贮货、交易以及酬神、议事、宴乐的场所，开始按省、县乡土关系和同行关系组织“会馆”。据《武陵县志》记载，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常德的江西籍人在大河街设有“江西会馆”；安徽籍人在井巷子设有“徽州会馆”；山西、陕西籍人在常清街设有“山陕会馆”；江苏籍人在城东设有“江苏会馆”；广东籍人在大庆街设有“广东会馆”；福建籍人在铁家桥设有“福建会馆”。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湖北籍人在城东设有“湖北会馆”；河南籍人在水星楼设有“河南会馆”。尔后，本省籍人又分县籍在上南门设有“辰沅会馆”；在城东设有“衡永郴会馆”；在南站设有“宝庆会馆”；在河洑镇设有“靖州会馆”；在麻阳街设有“麻阳会馆”；在大高山巷设有“长郡会馆”。“会馆”经费来源有三：①基金捐款；②常年捐款；③临时捐款。兴建“会馆”之后，绅商们还集资修建了“育婴堂”、“同善堂”、“体仁堂”。故有“八省三堂”之称（一九一一年《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

“会馆”是经过稟官立案的，它受到官府的保护。“会馆”的首领称为“老总”，大都由富商绅士所担任。其职责是：掌管会产，主持祭祀，调解同业纠纷。会馆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一般都在祭神之日如农历三月十五日“财神会”、七月十五日“烧包会”、八月十八日“杜康会”、八月二十日“赵公会”。有的会馆还每月举行一次或两次例会，公议行情市价、调解同业争端、商讨改善经营、修订行约店规。如《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中例述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常德丝业修订旧规七条，布店重订条规十二条，违反规约的，根据情节处以罚钱、罚戏、罚酒席，或钱、戏、酒并罚。因此，会馆具有很大的制约力量。它既是行帮组织，又是商人团体。即使后来成立了商业同业公会和商会，但会馆作为每一省、县籍人的帮派组织形式，并没有因此而解体，却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才告结束。

第二章 市场的扩大与常德商务 总会的产生

第一节 随着市场变化，商会应运而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全面加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沿海伸展到广大内地。继长沙开为商埠后，英、日商人得陇望蜀，进一步要求开常德、湘潭为商埠。湖南巡抚端方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要求，以“各国约开口岸，……动多牵掣，诚不如自开商埠，犹足雇主权而防流弊”为由，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一日上奏

清廷，将常德准为自开商埠，并将常德沅水南岸善卷村一带划为“各商家租建之区”，“至该处关务监督，常德应归岳州关监督兼办”（见《端忠敏公奏稿》卷5第5—6页）。清廷同年七月准端方所奏：“如所议行”（见朱寿明著《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95）。但遭到常德商民强烈反对。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正月，岳常澧道韩庆云来常德筹办通商租界事宜，群起集会呈文“具控到京”，且“邀集郡城八省三堂董事，在育婴堂会议商埠事宜”，计议向韩庆云“面陈利害，并公禀省城洋务局力争”（见光绪三十二年元月二十五日《长沙日报》）。致使常德自开商埠未果。但外轮则根据《内港行轮章程》，行驶常德运输客货，并在沿河两岸租栈房及码头，成为外商“寄货港”（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9），外商便籍此以长沙为中心，形成了包括岳州、常德、湘潭等地的在湘经营网络。自此常德便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据点，市场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1、各国洋行林立。英商有“安利英”、“亚细亚”，美商有“其来”、“福中”，日商有“日华”、“三井”、“三菱”，法商有“立兴”，德商有“美最时”、“瑞成”、“彩松”，还有欧洲犹太巨富“老沙逊”等十九家洋行。他们在常德倾销车糖、颜料、煤油、布匹、百货、香烟、肥田粉；收购桐油、倍子、牛羊皮、肠衣、猪鬃、芝麻、蚕豌豆、药材及朱砂、水银等土特产品。英商安利英洋行还兼营水火保险业务。同时，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和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还凭仗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行驶常德——长沙——汉口线。为了垄断我国

内河航运业务，他们开始实行“不收乘客船票”、“途中吃饭不收餐费”，最后竟采取“全部免费，另赠一条毛巾”等手段，拼命排挤本地新兴的“富利轮船公司”、“普济轮船公司”、“民众轮船公司”、“震兴轮船公司”等民族航运企业。

2、进出口贸易繁荣。川南、黔西以及沅水上游辰、酉两河的桐油、牛皮、倍子、冰碱、生漆、矿砂等都运集常德，由洋行收购出口，全年出口贸易金额不下数千万银元。据一九三五年《桐油》杂志记载：“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前，常德为本省桐油之最大市场，……其业务之盛，达到了极点，”“年购销量约在三十至四十万担之间”。同年九月《上海总商会报》称：“常德为我国桐油市场第二位集散中心，仅次于四川万县”，并指出这个时期“是植物油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整个常德市场的鼎盛时期”。

上述地区的土特产品在常德销售后，又就地购回上布、匹头、百货、南货、棉纱、棉花、食盐、食糖、颜料、瓷器五金等物资。因此，从常德输往湘西及川黔边境地区的工业、手工业产品和原料数量也相当大。如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常德销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棉花约有十万担、土布约有百万匹、麻一百六十万斤。据《中国实业志》载：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以前，常德棉花营业异常兴旺，出口量达二十万担。其他，谷米出口年达五十万石，鱼二十万担，皮箱七千口，牛皮六千张。

3、工商业户不断增多。清末民初，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正忙于战争准备，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因此，这时我国民族工业、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常德地区虽无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形成，但手工业特别是手工染织发展很快。染坊达八家之多，织布机户有五百余家，织布机有一千一百多台。织布工人（不包括业主及家属）约五百多人，除此之外，铁器、木器、竹器、园木器、白铁等作坊也相应得到发展，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创办了刘义茂线厂，生产丝帕，加工各色丝线和棉线等产品；还兴办起碾米、电光布、卫生巾、皮革、造船等手工业工厂和企业公司达四十余家。与此同时，兴起的金融业异常活跃。据一九三四年《常德工商业现况》记述：“民国之初，常德银钱业，一时颇有蓬勃气象。钱庄计有三十家之多；官钱局有二，一为湖南官钱局，一为裕宁官钱局。”商业更趋兴旺，仅经营南货的就有一百多家，其他诸如桐油、棉花、棉纱、药材、山货、谷米、水产、靛碱等牙行达三百家之多。并且出现了一些商贾大户，如经营土布发家的“李亨太”、“蒋万新”，都拥有数十万银元的资金，还有号称棉纱大王的“姚荣庆”纱号，积累百万资财的“谦记绸布号”等。

4、商会开始建立。清朝政府为了企业振兴实业，谋求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立了商部。并于一九〇四年初，制定《商会简明章程》，同年三月又制订《大清商务总会章程》，发布“劝办商会谕帖”。为了鼓励各地商人公举会董，速订会章，以期上下一气，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开利源，规定各府州县均应设立商会。商会分为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及海外商务总会。商务总会设在省会或者商业繁华的地方，商务分会设在中小城市。为了给予商会较高的社会地位，规定各董常川来署，不必穿公服，稟复各件亦不必拘

以公牍体制。商务总会只对总督巡抚用“呈”，对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地方官用“移”，表示同等地位。在清政府的上述倡导下，常德商人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秋季开始筹备工作，次年初，报商部批准设立了“常德商务总会”，地址设东门永安街（今人民中路市物资局地址）。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政权担心商会的权限过大，对己不利。于一九一五年正式公布了新商会法。按照新的商会法，商会分为总商会与商会两部分。总商会相当于以前的商务总会，商会相当于商务分会。在这期间，常德商务总会又呈准改组成立“常德总商会”，蔡正潜为总商会会长，会董五十名，会员向一般商人打开了大门，增加到八百六十五名。会址仍设在原商务总会。直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起，常德总商会几经改组，先后推选李字田（安徽人）、蔡子陶（江西人）、罗紫庵（江西人）、郑莲荪（江西人）、曾春轩（江西人）五人依次担任常德总商会会长。被选出的会长多系大商贾和帮派势力强的头面人物。

总商会任务：1、筹议工商业之改良与发展；2、负责有关工商业的征调及情况通报；3、介绍和指导对外贸易；4、调处公断工商业的纠纷；5、调查统计工商业的情况及纂编工作；6、开办工商业补习学校；7、核准设办工商业之公共事业；8、负责筹捐派款等。总商会对商人的职责为“提倡保护，代为申诉，平值市价，修订各业规则”。

总商会成立后，对缓和帮派、行业之间的互相倾轧，抵制洋货，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节 “五四”运动时期 总商会开展抵制 仇货的斗争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六月十五日，常德发生维持国货风潮，学生在城内府坪一带宣传抵制日货时，遭该处日商嘲讽，致起冲突，群众将府坪之新隆、下南门之丸三、常清街之弘旗各日本洋行门首玻璃窗格等尽行击毁。”“六月二十九日，日本兵舰隅田号开来常德，向常德人民示威。”（《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常德总商会在学生掀起“抵制仇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浪潮影响下，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在商民中开展了提倡国货、查禁仇货的宣传工作，并将查出从日本输入的海带、白糖、布匹等都集中在下南门外和泮池坪予以当众烧毁、以示告诫商民从此不要再贩卖仇货，应大力推销国货。这一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市人民和工商界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也有少数商民暗中违抗，将日货贴上国产商标，企图鱼目混珠逃避查处。“抵制仇货，提倡国货”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原洋货充斥市场的现象大为减少，国产工业品在市场的销量逐渐增大。全市部分手工业如毛巾、袜子、雨伞、绣花……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初，因收回旅顺、大连及否认“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反日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三月二十九日，湖南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商会等发起收回旅大示威运动，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常德行动最为激烈。六月五日，常德日清公司及所属“湘江轮日人打伤常德检查日货的学生十三

人，激起了常德人民实行罢市罢工罢课三日，要求驱逐日人出境。对日轮运卸货物，购办食品，均严行封锁。日人窘急即请求赵恒惕政府镇压常德人民的爱国行动。因此，学生与驻常德之湘军唐生智部（发生）冲突，唐部士兵竟暗杀学生一人，杀伤二人，且武装迫使各校学生离校”（载《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

第三节 军阀混战中 商会困于支差派款

自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汤乡铭为湖南督办后，从此湖南遂为北洋军阀所盘踞，战争连年不断，政局变化无常，常德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经常出现城门紧关，街头戒严，谣言四起，行人狂奔的惊恐现象，弄得全城时而闭市，商旅畏缩不前，百业凋零，市场萧条。不仅如此，大小军阀还凭借武力，对商民巧取豪夺。商会常年为过往军阀支差派款所困扰，如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四川军阀部队由贵州进驻常德后，找总商会派款二十万银元，限期三天交足，否则市场受扰，概不负责。当时总商会会长曾春轩为了息事求安，维护商民利益，再三要求减少派额，不仅未获应允，反而被扣押起来作为人质。总商会迫于这种情况，乃召开紧急董事会会议，硬性议定向花、油、靛、碱、土布、匹头、钱庄、银楼、百货九大行业强行摊派，由川军派兵上门督催。如期交足后，才赎回人质，使常德市民避免了一场兵灾。又如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晚七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属教导师师长周润奉命策谋，在总商会设立的“商事研究社”（现城东贺八巷小学地址），巧设“鸿门宴”，捕杀贵州军阀国民革命军右路军总

司令袁祖铭，双方在城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刹时战火弥漫，兵慌马乱，溃散之兵趁机抢劫，市面秩序混乱不堪。这时，总商会为了维护市面安宁，避免商民受损，乃出面调停，由商会发给缴枪游勇每人十块银元，作为遣散费，并告示安民，这样才收拾了残局，使市面得以恢复正常，工商各户安全复业。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商民协会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季“五卅惨案”以后，北伐军攻下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全省农工商学各界组成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联合战线，工农运动形成高潮，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省各地。常德商民在中共湘西党务办公厅主任滕代远的领导下，建立了“常德商民协会”，公推贺洪泰南货店青年店主贺凤章为商民协会委员长。当时“关于商民运动决议案”中规定：“商民协会会员，不宜脱离现在商会，并须同时积极谋商会之改革与刷新，商民协会在不妨碍全体利益时，须与商会合作”。然而，由于总商会会长曾春轩系英商买办、亚细亚洋行经理，在革命群众运动兴起之时，吓得潜逃上海，其他会董亦各散四方，总商会会务实际上陷于瘫痪。

“商协”规定牧师、买办、劣绅、贪官污吏、外国商人不得参加。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商贾正当利益，禁止滥税滥票；反对奸商操持金融、垄断粮食；查禁兜售洋货，鼓励经销国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商协”还印刷了“五十枚”、“一百枚”票面的流通纸币作为活动经费。并且组

织了“商协”纠察队，配合店员工会经常在街头巷尾宣传国民革命之意义，劝导商人大胆经营。同时查禁洋货，打击投机商人。玛瑙巷易万顺碓槽坊使用大秤称进，小斗卖出，克扣群众利益。他们发现后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将该店老板捆绑游街示众。对查抄出来的仇货当众烧毁。对于外逃商人的铺店进行封存保护，责成看店人员将店主找回开门复业。在此期间，为了声援“湖南工农商学大联合”反对英帝国主义帮助北洋军阀扰乱北伐后方和“反赤化”的革命行动，“商协”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常德雪耻会”组织的反帝斗争。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白昼戒严，大肆屠杀。五月二十一日早晨，国民党何键所属熊震部队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遭到机枪扫射。当日，打死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八十多人。同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由于叛徒周丽生的密告（周系江西吉安人，在小西门内经营南杂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熊震调一个连的兵力，团团包围商民协会，把正在主持会议的贺凤章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六月三十日，国民党常德县政府以所谓暴徒首犯罪名，将贺凤章杀害于下南门城门口。刑场上，贺凤章脸不变色，从容就义，时年三十六岁。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商民协会，各地商人统一于商会与工商业同业之下，从此商民协会的名称方告消失。

第四章 马日事变后 市场时盛 时衰 商会几经改组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实行经济自由放任政策，爆发了第二次世界经济大危机，美国工业生产下降46.2%，德国下降40.2%，法国下降30.9%，英国下降16.2%。其影响很快波及常德，首当其冲的是桐油出口贸易锐减。当时常德地区十三家油行，不审时度势，盲目购进。结果货不畅流，资力不足，不得不将两万桶桐油以每百斤三十五元（银）作八折用款质押与聚兴诚银行。接着桐油价格不断下降，聚兴诚银行又以油价每松一成，追索押款头寸一成。最后迫使油行按汉口行情每百斤二十一元的价格抵还押款。这样，整个油行业资金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十三家油行就有八家倒闭。正由于油行业的不景气，带来了各行各业的不景气。

直到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去，各业开始复苏。据《中国实业志》载：这一年“常德城区二十九种主要商业，共有商店八百七十八家，资本总额二百四十七万三千多银元，营业额达九百零二万五千多银元。”

从这一年起至抗日战争前夕，桐油价格特好，每百斤由四十元逐步上升到六十元（银元），从而又推动了各行各业的新发展。牙行已有四百五十家，旅栈有七十家，茶楼酒馆有二十八家，较大的绸布号有十八家。其他如谷米、棉花、茶油、中药材、竹木、牛皮、朱砂、水银等，年营业额就为一

百八十五万八千六百银元。市场之旺可谓盛极一时。

二十九个主要行业的情况表

I.

商业类别	商店 户数	资本额 (银元)	百分比	全年营业额 (银元)	百分比	附注
苏广百货业	65	215,900	8.73%	1,243,500	13.78%	
银楼业	46	58,560	2.37%	600,000	6.65%	
帽业	31	9,300	0.37%	160,000	1.77%	
绸缎匹头	19	142,000	5.74%	2,000,000	22.16%	
针织业	58	130,000	5.26%	350,000	3.88%	
碓槽粮食业	47	125,000	5.05%	310,000	3.43%	
色纸业	20	25,000	1.01%	50,000	0.55%	
谷米业	26	25,000	1.01%	182,000	2.02%	
酱豉磨业	19	5,000	0.22%	145,000	1.61%	
纸烟业	19	55,555	2.24%	150,000	1.66%	
皮毛倍蓬业	18	165,700	6.70%	348,000	3.86%	
丝业	49	50,000	2.02%	140,000	1.55%	
印刷业	39	4,000	0.16%	15,000	0.17%	
膏辣土果业	13	7,500	0.30%	21,400	0.24%	

商业类别	商业户数	资本额 (银元)	百分比	全年营业额 (银元)	百分比	附注
篾业	21	4,5000	1.18%	8,700	0.10%	
油盐烟蜡业	65	250,000	10.11%	600,000	7.09%	
染业	30	160,000	6.47%	400,000	4.43%	
布业	50	148,950	6.02%	500,000	5.54%	
靛青颜料业	7	130,000	5.26%	200,000	2.22%	
南货商业	8	89,000	3.60%	270,000	2.99%	
竹木寿坊业	28	40,000	1.61%	100,000	1.11%	
豆麦业	10	25,000	1.01%	60,000	0.66%	
棉花业	9	12,000	0.49%	74,000	0.82%	
书业	8	20,000	0.81%	30,000	0.33%	
衣业	15	17,000	0.69%	38,000	0.42%	
油行业	10	400,000	16.17%	600,000	6.65%	
杂粮种子业	48	15,000	0.61%	40,000	0.44%	
纱业	13	105,000	4.24%	200,000	3.32%	
酒业	88	38,000	1.54%	50,000	0.55%	

商业类别	商店户数	资本额 (银元)	百分比	全年营业额 (银元)	百分比	附注
29	878	2,473,510		9,025,600		

在这段时期，创办了第一贫民工厂，吸收工人一百四十六人，从事湘绣、线纱袜、藤制品、衣服等生产。较具规模的玻璃、针织、制革、染织、制伞、皮箱、肥皂、湘绣等手工业有了四十六家，年生产总值达三十万元之多。其中，玻璃厂二家，年产玻璃制品两千篓。肥皂厂四家，年产肥皂一万八千八百箱。织布业五家，年产棉布一千六百二十四。毛巾业二家，年产毛巾六千打。针织业十家，年产丝、线袜二万四千八百打。纸伞业六家，年产纸伞一万把。制革业九家，年产皮革三千张。皮箱业六家，年产皮箱七千口。湘绣业三家，年产湘绣品一千四百件。上述产品不仅远销省内外，而且在国外都享有盛誉。如“任和森”皮箱店的产品质量优良，曾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日臻发达的手工业，在最盛时期的民国二十五、二十六年，年产纹布达十万匹，袜子二十万打，皮革底皮七千二百市方尺，棉皮七万五千市方尺。

在此期间，商会历经两次改组。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总商会经国民党常德县党部核准，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程，将总商会改名为“商会”。票选杨少云（常德人）为商会主席。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八月，因任期届满，再次改组，选举王新民（江西人）为商会主席，罗裕培、余辅臣、黄兰甫、殷伯平为常务委员，下辖同业公会三十九个、区商会五个，会员总数为一千七百零七人。

改组后的商会除了应付军差派款，进行各业议价，调解商业债务纠纷外，还举办了“常德商会立维新商业初级职业学校”和商办乞丐收容所。特别是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一年）六月，大雨兼旬，山洪骤发，七至八月又连续淫雨，常德及滨湖各县发生了数十年罕见的大水灾，灾民沿门乞讨，露宿街头，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商会募集捐款，一方面指定银行购进粮食，开展平粜；另一方面，定点施粥，赈济灾民。为了排除城内渍水，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在太平庵修建了抽水机站。

第五章 八年抗战城市毁于战火，工商 业损失惨重，商会陷于瘫痪

第一节 抗战初期 市场的新变化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的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上海、南京失守，武

汉、广州相继沦陷，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数十个大城市和大片国土被敌占领。江浙和武汉一带难民，纷纷取道常德逃往湘西、川黔等地，本市人口一时超过二十万，市场一时出现畸形繁荣。饮食服务行业更为兴旺，仅南站一隅，旅社突增十余家。逃难至此的难民，为谋生计，除经商及小贩外，也有的开作坊；从事小修理、小翻砂、手工卷烟等手工业以及开设机器修理厂、民营汽车运输商行的，犹如雨后春笋，彼彼皆是。抗战前，常德的汽车运输一般只达沅陵，抗战后，因民营汽车增多，则可达贵阳、重庆。水上客运，由于湖北难民筏子来常，开辟了水巷口至茅湾的短途航运。同时，制革、制鞋、染织、针织等业都较前有所增加。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旬，日寇飞机开始轰炸常德，加之武汉沦陷后，长江中下游交通被敌封锁，常德接近战争边缘。全市比较大的行业如油行、绸布、百货、南货、茶叶、金银等业的大户都纷纷疏散下乡，或西迁沅陵、所里，远至贵阳、重庆。居留在城市的，大都是中小商民和日谋生计的贫民。每日黎明即起，徒步远郊，谓之“躲警报”。日暮黄昏，才三三两两转回城市开门营业。因此，工商业中小户增多，大户减少，资金脆弱，业务缩小。整个市场呈现了新的组合和战时变化。

第二节 国难当头商民同仇敌忾

抗战爆发后，常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商会是抗敌后援会的成员之一。在国民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商会发动各业商民慷慨捐输，支援抗日。当芦沟桥枪声打响，即推动各个行业开展“七七献金”和庆祝蒋介石

五十寿辰献金救国活动；为开赴前线抗日的过境部队筹措柴草、募集寒衣；募款购买毛巾、肥皂、香烟、水果、糕点等物品，慰问过境伤员。武汉沦陷后，对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过境难童，进行募款安置，按人按日发给生活费。常德会战前夕，为了配合驻常守军构筑城防工事和封锁河道交通，阻击日寇入侵，商会动员下属的竹木业、铁麻业承担了有关上述军用器材的供应任务。尽管规定按市价付款，但有时拖延太久，法币天天贬值，结果只能收到成本价格的百分之二十，忍受了经济上最大的牺牲，尽到了支援抗战的光荣责任。一九三七年秋，适值抗战军兴，全省三十多县、市大水为灾，“滨湖堤垸，多已溃决”，“灾民遍野，嗷嗷待哺”。商会鉴于岁暮年关，仍有灾民流浪街头，沿门乞讨，乃向各业募款，施放年米，以济灾黎。

第三节 非常时期 商会名存实亡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商会奉令筹备改组，票选郑宗元为主席（江西人）。会址迁青阳阁布业同善堂内。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四月，商会又根据国民党颁布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进行换届选举，票选姚吉阶（常德人）为理事长，并修订了商会章程。但因日机不断袭扰常德，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市区沦于敌手，商会名存实亡。

第四节 抗战时期工商业惨遭损失

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同年十月日寇飞机开始轰炸常德，至一九四三年冬常德会战这一时期，常德城区先后被日

机狂轰滥炸达三十九次之多，大火四起。尤其是在日寇侵入城市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致使全城数万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据一九四六年《常德县商会工作概况报告书》记述：“常德沦陷一星期后，日本侵略军撤走；市民陆续回城，市区惨遭破坏，化为瓦砾，商人物资疏散四乡者，大部丧失殆尽，复业无资者，触目皆是”，“全城货物，直接损失总值为法币八百余亿元”。《湖南大公报》报导：仅常德县（市）一隅，被毁民房约万栋，商家七千余户”，“人民受难程度之深，地方糜烂幅员之广，为抗战七年来各战场、各战役之最”。日寇退却后，少数商民为生活所迫，陆续回城，清除瓦砾，搭棚摆摊，小本经营，勉维生计。

第六章 抗战胜利后的商会动态和民族工商业面临的新摧残

第一节 欢庆八年抗战胜利 工商业户纷纷回城复业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消息传来，全市人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工商界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尽情燃放鞭炮，共庆这一光辉胜利。原来疏散四乡和迁移湘西、川黔一带的各业大中户，又纷纷回城筹备复业。同年十一月，市区有八十个行业得到了恢复，有一千零六十八家先后开了业。资金拥有七千九百七十三万元（法币）。

迄至一九四六年，发展更快。仅据五十个商业行业的统计，商店已发展到二千零二十八户，资金为一亿三千三百三

十六万八千元（法币）。购销活动较为旺盛。可是好景不长，又面临新的灾难。

一九四五年各行业户数、资金数统计表

单位：万元（法币）

业 别	户数	资 金	业 别	户数	资 金
糖 坊	1	5千元	染 业	16	45万元
磨 坊	4	3.4万元	旅 业	29	115.5万元
烘 糕	3	2.5万元	印 刷	11	49.6万元
红纸作坊	1	5千元	木 器	2	51万元
澡 堂	2	13万元	书 业	10	77万元
媒 业	6	42万元	铜 器	11	26.5万元
窑 货	1	4万元	刀 剪	2	6万元
锯 木	6	14万元	算 盘	1	1千元
银 楼	40	296.6万元	绸 布	15	1140万元
百 货	45	148.1万元	镶 牙	5	2.4万元
针 织	26	85万元	电 料	3	11万元
纸 烟	52	352.1万元	喜 轿	2	10万元
化 装	1	5万元	花 粉	1	5千元

业 别	户数	资 金	业 别	户数	资 金
布 业	25	477万元	县 银 行	1	1,000万元
南 货	25	378.5万元	纸 业	8	19万元
伞 鞋	6	6.7万元	饮 食	34	66.3万元
杂 货	54	103.6万元	钟 表	10	13.5万元
粮 食	36	79.5万元	帽 业	20	28.8万元
木 业	27	53万元	麻 线	5	2.9万元
蛋 业	10	13.5万元	西 服	27	98.3万元
新 药	19	112万元	丝 业	19	80.6万元
模 榴	6	4万元	衣 业	50	39.4万元
碱 水	4	9万元	土 纸	8	19万元
土 果	14	49万元	香 业	7	6万元
代 庄	1	40万元	猪 行	1	1万元
卷 花	12	15万元	糟 坊	5	12.5万元
酒 业	8	18万元	制 面	1	5千元
盐 业	20	386万元	酱 鼓	22	283.4万元

业 别	户数	资 本	业 别	户数	资 金
球 纸	3	3.5万元	烟 蜡	25	63万元
山 货	32	120万元	对 联	5	3.1万元
腊 味	10	11.5万元	笔 墨	15	63万元
机 器	2	2万元	瓷 器	12	105万元
镜 箱	10	10.2万元	染 织	3	18万元
五 金	10	77.8万元	棉 花	5	170万元
颜 料	6	150万元	糕 饼	7	5万元
钉 铜	7	20万元	色 纸	14	100.2万元
纱 业	5	18万元	漆 业	2	6万元
茶 叶	17	19.5万元	照 相	5	6.5万元
制 笔	72	152.9万元	肥 皂	3	11万元
油 业	13	872万元	国 药	22	194万元

第二节 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 民族工商 业处于风雨飘摇中

民族工商业刚从日寇八年侵华战争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又面临着新的灾难。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当局不顾国家

利益和人民疾苦，悍然撕毁协议，重新挑起内战，调动一百多万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由于内战军费支出浩大，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这巨额赤字，一九四八年八月拼命发行“金圆券”，妄图挽救经济崩溃的厄运。但事与愿违，不到一个月，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十月中旬，常德市场上出现了抢购物资风潮，华南、合记、亚细亚三家煤油公司每天被抢购者挤得水泄不通，限购量由开始的五斤减到后来的四两，因而抢购的人越来越多。米和猪肉被抢购得只有黑市交易”（载《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在这种币值一落千丈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完全丧失了对国民党政府新货币的信任。在商品交换和工资支付中，都自发改为实物比价折算或公开使用银元，抵制“金圆券”、“银元券”的流通。这种通货恶性膨胀和瞬息万变的上涨物价，使常德工商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困境愈陷愈深；绝大部分商店停业，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一蹶不振，不少的户被迫关门停业；全市民族工商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第三节 商会奉命再次改组 逐步恢复正常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商民陆续回城复业。商会奉国民党县政府指示，再次改组，票选姚吉阶等九人为理事，王义之等三人为监事。姚吉阶再次被选为理事长。改组之初，鉴于全市商民在抗战期间遭受损失奇重，曾呈请湖南省政府给予救济贷款，以扶植工商业发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进行所谓财政收支系统改制，税目增多，加在工商业头上的税负越来越重。一九四七年十月，常德全县营业税奉命追加二亿三千万元，合计全年预征数达六亿元。县政府又拟定一

次捐献附加税三亿八千万元。捐税一加再加，商民无力负担。商会即发动商民联合请求核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第四节 湘西事变影响常德 机关团体窜逃

商民无辜受害

一九四八年，正值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际，国民党政府设置在常德的第十七绥靖公署实行所谓戡乱建国的方针，责令辖区各县将自卫队改编为“戡建大队”，作为反共的军事力量。但结果适得其反，终于一九四九年元、二月间，发生了湘西事变。永顺、桑植、大庸等县的地方武装纠合起来，以汪援华为首，策划要攻打常德，直捣绥署老巢。一时常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市场清淡，商店门可罗雀。而绥靖公署却强逼商民为之购置三百套办公桌椅和床铺，为县自卫队筹粮两千石。不久，汪援华接受改编，被任命为暂编第五师师长，驻扎常德。这伙乌合之众，到处打家劫舍，强买强卖，有些商店特别是一些小商贩不敢营业。四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机关团体眼见大势已去，仓惶逃往常德，商会负责人也远走沅陵、所里。就在绥靖公署窜逃之时，还趁机向商民勒索所谓应变费一万三千银元，使商民受害不浅。自此局面日趋紧张，由于市民未能获得对全面形势的清醒认识，又纷纷疏散下乡，因此市区笼罩着一层战争前的惊恐、沉闷气氛。

第五节 临近解放 国民党领导下的党政机关

群团组织纷纷逃离常德

一九四九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渡过长江，向大西南挺进。七月下旬，直驱常德，当时，国民党守城部队暂编第五师，妄图负隅顽抗，强令市民疏散转移。国民党领导下的党政机关、群团组织都已逃离常德，商会负责人也大都迁往沅陵、所里，较大商店有的疏散湘西一带，一般中小商店和居民，只临时迁往附近农村，市区已处于战争的戒备状态。

七月二十八日，城西北太阳山、花山等地传来阵阵炮声，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临近攻城之势。次日凌晨，战斗的序幕刚一拉开，国民党守军暂编第五师就溃不成军，望风披靡，抢渡沅江，向桃源溃退，随即常德宣告解放。

翌日，商民纷纷回城复工复业，居民回城安居。这时，全市人民与解放军一起，打起锣鼓，扭起秧歌，举行欢庆常德解放大胜利。自此，常德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进入了描绘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附：①常德商会历届负责人名单

②1940年同业公会一览表（50）

团 体 名 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务	任 期	经营商号
常德商务总会	徐寅亮	会 长	1904—1909	
	蔡德潜	会 长	1910—1911	
常德总商会	李宇田	会 长	1912—1913	李亨泰布号老板
常德总商会	蔡梓陶	会 长	1914—1915	××南货店老板
常德总商会	罗紫庵	会 长	1916—1918	
常德总商会	郑莲荪	会 长	1919—1921	晋昌生油行店主
常德总商会	曾春轩	会 长	1922—1926	英商亚细亚洋行经理
常德商民协会	贺凤章	委员长	1926—1927	贺洪泰南货店店主
常德县商会	杨少云	主 席	1930—1931	杨本立碓坊经理
常德县商会	王新民	主 席	1932—1937	丰记绸布号经理
常德县商会	谭祯祥	代主席	1938—1939	慎乃昌百货店经理
常德县商会	郑宗元	主 席	1940—1942	松记绸布号经理
常德县商会	姚吉阶	理 事 长	1943—1949	鼎强棉花行经理

1904年同业公会一览表(50)

绸缎匹头同业公会	油盐业同业公会	粮食同业公会
纱业同业公会	金棠烟同业公会	钉铜同业公会
染织业同业公会	杂粮种子同业公会	黑白炭同业公会
布业同业公会	腊味食品同业公会	制革同业公会
丝织同业公会	帽扇杂货同业公会	衣业同业公会
色纸业同业公会	肥皂同业公会	书业同业公会
油行业同业公会	纸烟同业公会	药业同业公会
南货业同业公会	稻草同业公会	照相同业公会
碓槽业同业公会	球纸业公会	钟表同业公会
弹花业同业公会	屠宰同业公会	百货同业公会
针织业同业公会	制肠业同业公会	酱豉磨业同业公会
会		
棕索业同业公会	瓷窑业同业公会	旅栈同业公会
靴鞋业同业公会	新药业同业公会	煤炭同业公会
皮箱业同业公会	砖瓦石灰业同业工会	戏剧业同业公会
喜轿业同业公会	竹木业同业公会	制刷业同业公会
铜器业同业公会	皮毛倍莲同业公会	钟表业同业公会
银楼业同业公会	膏辣土果同业公会	

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卅五年

1949—1984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工商联的光荣任务

第一节 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步入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乘胜前进，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常德。从此，国民党政府对常德的统治宣告结束，常德市人民进入了改造旧社会、描绘新社会的伟大时代。

在这个历史转变关头，由于国民党的欺骗蒙蔽没有被揭穿，工商业者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对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掠夺极为不满；另方面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发展起来于己不利。因此，常德刚一解放，不少人对经营企业徘徊观望。随后，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城时，露宿街头，不住商店和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感敬佩。特别是看到报纸登载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觉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正确，符合国情民意。接着，常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道生和中共湘西

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方用，在新世纪电影院召开有工商界代表参加的市民大会。会上宣布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号召全市人民搞好生产，安居乐业。从而使工商业者耳目皆新，疑云驱散，陆陆续续回城开工复业，欣喜从三座大山压榨下解脱出来，开始步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第二节 建立临时机构 大力支援前线

常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机关团体逃之夭夭，城市各项工作陷于瘫痪。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进驻常德后，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建立了政府临时办事处，推举知名人士戴修麟为主任。跟着建立了“常德商会临时办事处”。由华法西药房经理何志明任主任，同济堂药号经理熊伯祺任副主任。当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全国财政经济处于严重困难中。面对这一情况，商会临时办事处在军管会和政府临时办事处的领导下，把大力开展支前和帮助国家克服财经困难作为当务之急。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主要办了八件事：一、大力宣传党的工商政策，号召疏散下乡尚未回城的工商业者迅速回城复工、复业。二、动员工商业者为支援前线借款五十六万九千六百元（旧人民币）。三、指定油行、南货、百货、碾米等行业中的大户保证供应军油、军盐、军粮和其他军需用品。四、提供抢修大西门外通往桃源、澧县公路一段道路的器材。五、号召各行各业实行商品明码实价，拒用银元，提高人民币的信誉，稳定金融和物价。六、协助政府用民主协商的办法评议税赋，顺利地完成了一九四九年春夏秋三季工商税二亿九千一百三十六万二千五百元（旧人民币）的纳税任务。七、一九五〇

年夏季，初步整顿了七十个同业公会、十一个小组、十二个直属户。八、协助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财产登记。全市共有五千九百六十六户（包括摊贩及郊区工商户）。其中商业三千九百零六户，工业、手工业二千零六十户。资金共为三百零一亿零三百万（旧人民币），从业人员（包括工人、学徒）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八人（摘自《常德市市场情况的变化》常德市档案馆全宗1号卷号8）

第三节 成立筹委会，推动工商业者投入三大革命运动，並把各项会务工作推向前进

（一）成立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为了适应常德解放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进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一九五〇年元月六日至八日，商会临时办事处在常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指导下，召开了市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二百六十五人。选出筹备委员二十一人，其中国营企业代表九人，私营企业十二人。会议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的组织简则，明确了筹委会的性质和工作任务：一、在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之前，筹委会系常德市工商业户的统一领导机构。二、接管旧商会及经政府指定接管的其他工商团体。三、开展以民主的形式成立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四、整顿常德市工商业同业公会。五、协助政府推行各项政策法令。六、向政府反映工商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供施政参考。七、协助工商各业研究改进技术和业务。八、领导工商业者学习时事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九、协调公私、劳资关系。

会议推定何志明为筹委会主任，熊炳立、熊佑祺、何志雄为副主任，负责主持筹委会的各项工作。

(二) 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一九五〇年，国家为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我市工商界在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欢欣鼓舞的同时，也理解到国家财政方面的困难。当中共常德市委开展认购公债的宣传后，市工商联筹委会立即成立了工商界推销公债委员会，发动各行各业踊跃认购。当时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虽然还不够正常，有些户叫喊困难，但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拥护的。因而不到十天，就认购了二十一万九千八百六十六份折实公债，比计划分配数超过九千八百六十六份，为全市认购公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二。

(三) 支援土地改革

一九五〇年，农村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规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兼有土地者亦按工商业者对待。因此，常德市的工商业者对土地改革基本上是拥护的。但在土改过程中，有一部分兼有土地的工商业者，由于对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精神不够了解，看到有的农民进城直接找兼有土地的工商业者清算退押减租，感到惶惶不安，担心被农民揪往农村批斗，思想混乱，经营消极。为了配合农村土改，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常德市支援土改委员会，吸收了工商界人士参加；既更好地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又保护城市工商业不受侵犯，从而规定了未经政府批准，不得擅自将工商业者揪往农村。与此同时，市工商联筹委会对占有农村土地一万一千八百亩的三百二十二

名工商业者，组织他们学习土地改革法，鼓励他们主动将所有田契和应退租以及不合理剥削交还农民。这样，兼有土地的工商业者才比较顺利地过了“土改关”，切断了与农村封建土地制度的联系，提高了经营工商业的积极性。

（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并派飞机、军舰侵略我国领空、领海，企图扼杀我国新生政权。在此关键时刻，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为了推动全市工商界人士积极投入这个运动，消除某些人中存在的“恐美”、“崇美”思想，市工商联筹委会广泛地组织所有工商业者进行了时事政策学习，印发了《常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发动四千九百多名工商业者参加拥护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各行各业的工商户纷纷订立以增加生产，积极经营，遵守政府法令，不偷漏国家税收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国庆节前夕，共募款二十二亿六千九百零四万多元（旧人民币），捐献了“常德工商号”战斗机一架，另外，还与其他各界联合捐献了“常德人民号”飞机一架。同时写了五百多封慰问信，购买了一千五百多册人民解放军文艺画报，寄往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表达了对志愿军的热爱。

（五）投入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国民经济恢复的顺利进行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这个运动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在常德市大张旗鼓地展开。中共常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事先经过与市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政治协商，决定在三月十三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阐明镇压反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方针政策，印发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三·一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市工商联筹委会根据这个决议精神，及时向全市工商业者发出了关于学习“决议”的通知。以行业为单位，组织全体从业人员分早晚班学习，帮助他们明确政策，提高认识，划清界线，消除顾虑，积极投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通过学习宣传，在政策的感召下，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成员都主动地向组织作了交待，并与广大工商业者一起，积极检举揭发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广大工商业者对人民政府依法判处工商界中三名反革命分子的极刑极表拥护。

（六）劝募寒衣，救济四省灾民。

一九四九年，皖北、苏北、山东、河北等省区的不少地方受灾很重。其他地区的个别地方，也有灾情。全国统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有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五万亩，灾民共约四千万人。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市工商联筹委会响应“皖北、苏北、河北、河南四省灾民寒衣劝募总会”的号召，印发了“为皖北、河南、河北、苏北灾民劝募寒衣告工商界同胞书”，成立了工商界劝募寒衣委员会。由于发扬了一处受灾，各方支援的互助友爱精神，仅仅工作十天，共劝募寒衣九千一百四十八套，交由本市劝募寒衣总会及时转送四省灾区。

（七）筹建人民商场

一九五〇年元月，全市共有摊贩八百零一户。市工商联筹委会为了协助政府整顿市容，维护城市交通秩序，实行摊贩集中营业，成立了“常德市人民商场筹建委员会”。选择原长郡会馆作为商场地址（现高山街菜场前后）。商场以公私合营名义招募股金，每股定为大米二百斤，政府投资一百股，私营企业八户（吉春堂药号，瑞隆、福源、义瑞三家油行、民众轮船公司、刘义茂钱厂、群益土纸行）投资一百三十九股，公私共投资二百三十九股，总共折米四万七千八百斤。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动工，一九五一年三月竣工，可容二百五十二户摊贩。同年四月，在摊贩业同业公会的配合下，启发摊贩，积极搬迁，十月正式开业。开业后，随即成立了常德市人民商场管理委员会，由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熊炳立兼商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八）举办工商会计讲习班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市工商联筹委会为辅导私营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健全财会制度，举办了“工商会计讲习班”，聘请肖谭时、肖道槎、李灝芬、杨郁萱、王临轩五人担任专职教员，市人民政府秘书李如陵兼政治教员，工商联筹委会派干部刘家桢、晏子风等二人负责行政事务工作。从开办起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结束为止，先后开办了六期，共培训财会人员五百八十五名。不仅为全市私营企业的建帐、建票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本市合作总社、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造就了人才。

（九）适应经济改组推动私营企业联营

一九五〇年初至一九五一年，本市旧的经济结构处在改组、新的经济秩序正在建立之中。由于虚假购买力消失，销

售对象起了变化，加以季节性影响等原因，私营工商业遇到了新的困难。为了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市工商联筹委会协助中共常德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牙行管理办法”，对本市油行、代庄、山货等行业作为重点进行了整顿。如油行业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了在国营油脂公司领导下的“油行业联营处”，规定“不准场外成交”，“按需要比例数购进”。同年七月，在市人民政府工商局领导下，又成立了“常德市植物油交易所”，取代了“油行业联营处”的业务职能。从而油行业大多数户自然歇业，少数户与一部分歇业户中的私营工商业者合并起来，成立大地、建新、元大三家土产贸易行。这期间，还成立了“粮食交易所”、“棉花交易所”，分别对粮食、棉花、绸布、南货、煤炭、蛋业、屠宰等二十二个行业进行了初步整顿和改组。根据全市工业中小手工业占百分之八十的特点，为使个体生产逐渐走向集体生产，以便加工订货、联购分产和联购分销，将针织业一百一十九户，分别组成“前进”、“六一”两家针织厂。烟作业中的“协记日新”、“荣太和”、“新一昌”联营定名为“联新制烟厂”。这些企业改组联营后，改善了经营管理，发展了生产，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四节 进行组织建设 推动各项工作

（一）正式成立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首届工商界代表大会，总结市工商联筹委会一年多来的工作，选举产生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二百

四十六人，其中公营企业代表十二人，私营行业代表一百六十七人，工商界有贡献的开明人士老人，特邀代表三十六人。通过会议，熊炳立、燕春舫、何志勋等二十八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谈宗华、周孜纯等七人为监察委员。

九月二十三日，召开首届一次执、监委联席会议，推选熊炳立为主主任委员，张志诚（国营企业）、燕春舫、何志雄、吕介人为副主任委员，何志明为秘书长，谈宗华为监委主任，郝慎吾（国营企业）为监委副主任。这次会议调整健全了办事机构，委员会下设“一室四课”和“十个专门委员会”（即：秘书室，组织课、宣教课、辅导课、总务课，建帐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税收联评委员会，物资交流委员会、工商债务调解委员会、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公私关系调整委员会、劳资协商委员会、人民商场管理委员会、推销公债委员会）。

新建立的工商业联合会，在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方面与旧商会迥然不同。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后，它在中共常德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领导全市工商业者学习和遵守《共同纲领》，协助政府推行法令和政策，同时为会员服务，指导经营，教育工商业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进行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报告团莅临本市，受到常德市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常德地、市领导机关举行了欢迎大会，并请团长窦少毅作了“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志愿军战士英雄事迹的报告。”市工商联组织全市工商业者与全市人民一起听取了这个报告。散会后，进行了讨论。纷纷反映这个报告非常感人，它大长了中国人民

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使大家进一步消除了“恐美”思想，增强了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

当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离开常德返回前线时，全市工商业户家家燃放鞭炮，夹道欢送，以表示对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崇高的敬仰和无限的钦佩！

（三）开展“五反”斗争，促进思想改造

经过一九五〇年调整工商业，加上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业丰收，人民购买力提高，城乡经济异常活跃，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物价稳定，私营工商业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但他们中很多人并不以此感到满足，唯利是图的本性又恶性发作。采用“行贿”、“偷工减料”、“偷漏税收”、“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来牟取非法利润。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党和国家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起，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接着于一九五二年元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五反”运动。市工商联在市“五反”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召开了首届二次代表会议，到会二百多人。中共常德市委负责同志在会上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意义、目的和步骤方法，要求全市工商业者认清形势，提高认识，主动坦白，大胆揭发，积极投入运动。会后，市工商联组织全市工商业者按行业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学习，结合进行自己交待，相互检举，定案退赃。运动后期，党和政府根据本市运动重点应在于“反偷税、漏税、欠税”的基本精神，没有对私营工商户进行“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的划分定案。

在“五反”高潮中，虽然发生过斗争而过宽和互相包庇现

象，但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基本上都得到了纠正。经过运动，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店员参与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制度，为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创造了前提。运动刚一结束，市工商联副主任燕春舫作为常德市工商界代表光荣地去北京参加了一九五二年国庆观礼。

（四）协调公私、劳资关系，组织物资交流

“五反”以后，私营商业营业额显著下降，除了经济改组的合理因素外，私营工商业者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产生怀疑，经营消极是一个重要原因。加以国营商业有些同志对私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认识不足，滋长了盲目冒进的“左”倾情绪，也是重要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活跃初级市场的“六项措施”，重申和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接着，中共常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和工商界发出了“搞生产，搞好生产”的号召。这个时候，市工商联一方面加强公私、劳资两个调整委员会的工作，向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私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协助政府协调公私、劳资关系。另方面积极推动私营工商业参加各种物资交流会，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其主要措施是：1、国营商业扩大批零差价，提高批发起点，以便私商经营零售业务有利可图；2、调整国营企业经营范围，一些国营公司和合作社，让出部分商品零售业务给私营商业经营；3、人民银行降低放款利息，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数额；4、召开劳资协商会议，工人主动团结资方，资方主动想办法搞好生产经营；5、组织常德代表团参加中南区和杭州的物资交流大会，由工商联辅导课课长

谢海泉任团长。在交流会上与东北地区签订了销售十万双（件）皮鞋、皮箱，二十多吨桐油，还有秀油……的交易合同，为活跃本市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6、组织常德市县城乡物资交流会，鼓励正当的私营工商业积极经营。如国营油脂公司要购进桐油，首先让私商购买。国营畜产公司为照顾手工业生产，就供应一部分牛皮革给制革业作加工材料，并给予分期付款、分期交货的优惠待遇。国营花纱布公司还与怡农染织厂订立了包原料供应、包产品销售的“双包合同”。通过这些措施，据绸布、百货、文具三个行业统计，八、九两个月的营业额比“五反”前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三，其他行业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四左右。怡农染织厂原来几乎陷于停产状态，由此不仅生产搞活了，而且积极添置机器设备，厂子有了新的起色。全市不少面临破产歇业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

第五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从一九四九年常德解放，至一九五二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营经济已在常德市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已经建立并有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初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个别企业如华晶玻璃厂实行了公私合营。一些原来从事居间剥削、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私营行业，如油行、银行、花行、金号、银楼、钱庄、代庄等由于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新的商品渠道逐渐形成等原因，自然受到淘汰。还有锡箔、香烛、球纸、花轿、人力车、裱糊、茶馆等行业，由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也逐渐自行没落。但上述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国家“统筹兼顾，各得其

所”的方针指引下，有的转入到工业或手工业，有的转入到文化部门，有的被国营企业吸收为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得到了合理安排。整个市场的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经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这三股势力支配的、以投机倒把和掠取小生产者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发展生产和服务于人民生活为目的的市场了。

第二章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迎接 “改造高潮”的到来

第一节 改选新的领导机构，整顿基展商业公会， 重新办理工商登记

一九五二年，国家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全国工农业生产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从一九五三年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迎接这一新形势的到来，一九五三年元月，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之规定，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的代表共二百二十人。

会议期间，常德市私营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孙书琴、常德专署工商科科长张和民分别作了有关形势和政策的报告、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熊炳立作了“工商联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选举了第二届委员会组成人员，计执委三十四人、监委七人。熊炳立连选连任主任委员，张桂清（国营）、张志

诚（国营）、燕春舫、吕介人等当选为副主任委员，白殿芳为秘书长，何志明为副秘书长。谈宗华、郑木彬为监察委员会正副主任。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一）继续学习和遵守《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深入贯彻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活跃初级市场的六项措施”，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常德市场；（三）进行思想改造和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四）整顿同业公会组织，加强团结合作四项重大决议。

会议闭幕之后，立即开展了整顿同业公会，健全基层组织和协助市工商局办理第三次工商登记工作。根据（1）凡业务性质相近的行业，予以合并；（2）因历史习惯，情况特殊者，维持现状不变；（3）业务性质不相同，予以分开，与其他行业合并，或单独成立组织三条原则。把原有七十二个同业公会、十一个同业小组，调整为三十四个行业，一个同业小组和三个郊区分会。比原有基层组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六。全市私营工商业户通过这次登记，总数为三千零一十一户，从业人员（包括工人、学徒）九千零六十人，资金总额共二百六十八亿三千一百五十七万元（旧人民币）。

这一年市场情况是：淡季不淡，旺季提早到来，私营工商业较为活跃。常德市工商贸易代表团参加常德地区一九五三年春季物资交流大会，完成购销总额五十七亿二千三百六十多万元，其中私营工商业就完成四十三亿八千八百六十多万元，占百分之七十六。全市一至五月，参加各地区物资交流大会，共实际完成购销总值一百四十亿零四千八百五十多万元，其中国营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合作社占百分之二点

五，公私合营占百分之十三点一，私营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一。但由于对市场发展情况估计不足，出现了某些商品脱销的现象。为了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安排好市场商品供应，市工商联于九月四日至七日，举行执、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三百五十八人，包括全体执、监委员、各同业公会主任、一部分私营工商户、国营企业代表、市场工作委员会干部、工商联干部。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市长孙怀珍在会上讲了话，对私营工商业搞好经营给予了表扬。通过会议，进一步鼓舞了私营工商业经营的积极性，为迎接旺季市场的到来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节 广泛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一九五二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路线一公布，私营工商业者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如一般小户认为“自己资金少，怕腿短路长走不到，耽心进不了社会主义”，一些大中户“怕成革命对象，耽心进了社会主义，工作无望，生活无靠”，比较普遍地赞叹“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有的还认为“商不如工，小不如大”，“工业能走，商业不能走”，“大的可以走，小的走不上”；有的盲目急躁只愿转工业，有的只想丢包袱，企图把困难转嫁给国家；也有的随大流，等待观望等等。为了帮助工商业者提高认

识，端正态度，消除顾虑，积极经营，创造条件，争取早日走公私合营的道路，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工商联采取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全市工商业者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一次“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学习。为了使这次学习收到预期效果，在工商联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四个基本骨干学习组，吸收较大的厂、店的厂长、经理参加，实行自学文件，领导辅导，集中讨论。对于一般从业人员，则按行业布置定期早晚学习，由工商联学习委员会委员分工下行业辅导。

学习开展之前，市工商联召开了二届三次执、监委联席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共四百人，除了全体执、监委员外，还邀请了中、小厂、店的厂长、经理以及工商界青年参加。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长李三平作了题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市工商联副主任燕春舫传达了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决议和省工商联筹委扩大会议精神。由此通过近五个月的学习讨论，基本上端正了广大工商业者的认识，大家心情比较舒畅，经营积极性又得到发挥，大中厂店纷纷拟定渡过淡季的计划和措施，分别参加了十九个地区的物资交流大会，还清缴了历年来的欠税六亿元，继续推动一千七百七十七户建立了帐册，比一九五二年建帐的一千一百六十九户，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一。

通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商界大多数人认识到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为以后各项具体政策的贯彻，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 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推动私营工商 业接受“加工订货”、“经销代销”

为了有效地保障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消除私人资本主义经营的无政府状态，有利于物价稳定和促进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九五三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五四年九月，国家先后实行了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统购统销政策。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市工商联及时地组织饮食、服务行业的私营工商业者及熟食商贩学习统购统销政策，做到计划用粮、用油，既要搞好市场供应，又不能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抽调了四名工商联干部协助市粮食局、商业局进行粮食定额摸底工作。同时还集中主要精力，协助政府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从各业客户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多种办法，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改组。

1、领导私营工商户转业。全市经营粮食业务的共十四户，除马怡丰一户尚有流动资金约三千多万元外，有六户只有几十万至两百万元资金，有七户完全没有资金。根据这个情况，一九五四年元月，对他们进行了处理：（1）马怡丰一户暂时维持现状，继续经营统购统销外的杂粮业务；（2）聚兴、兴记两户转为国营粮食公司代销；（3）福森祥、友馀、永茂昌、同泰四户准予歇业，从业人员由政府统一安排；（4）其他七户或早已从事其他小本经营，或自愿参加社会劳动，只办理歇业手续。由源来油行、代庄改组合而成的元大、大地、聚川（即前建新改组换牌）三家土产贸易行，其资金和人员分别转入文锋剧院（即现常德剧院）、求

进造纸厂、力新伞厂、德山瓷厂。福生永山货行、王洪发香烟号、大源青布庄、美华绸布号、义孚（代庄）转到怡农织布厂。

2、停止批发业务，专搞零售。如吉春堂药号由原批零兼售，转为全部代销。

3、参加公私合营企业。如信义药材行转入公私合营的常德饭店。

4、接受国营企业加工订货。如怡农染织厂、六一、前进两家织袜厂、强民面粉厂、同利、协丰、太成生三家酱园都与有关国营企业签订了全部或部分产品的加工订货协议。

5、接受国营企业经销代销。如经本会报请审批与有关国营公司签订代销协议的有百货业的春记福、美纹、鑫昌、时新、华中、协盛六户，有绸布业的久昌、安昌、新昌、力华、五丰、九源六户。上述两个行业的摊贩和肩贩也与花纱布公司和百货公司建立了经销关系。屠宰业十七户座商全部为国营食品公司常德经营处建立了九个经销店。

通过上述形式，到一九五五年，全市私营工商业初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共有二百九十六户，从业人员九百五十一人，分别占私营工商业户和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七和百分之十八点六六。其中公私合营三户，代销店三十一户，经销店八十二户，小商贩统负盈亏的合作商店三户，经营小组二十七个。所有这些，为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既在工商界中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又积累了一些经验。

第四节 适应儿童入学急需，举办新中小学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为了协助政府解决适龄儿童入学困

难的问题，市工商联决定举办新中小学一所，推选了热心教育事业的熊炳立、吕介人、马文藻、盛孝农、聂庆钧、兼春舫、谈宗华、何志明、何鑫敏、黄梁臣、谢海泉、张俊涛、孙桂中、陈述伟等十五人组成校董会。并推熊炳立、吕介人、马文藻、盛孝农、聂庆钧五人为常务董事。指定工商联宣教课课长张俊涛兼任新中小学校长，原同善堂小学校长黄德华（女）任副校长。学校系民办公助性质，由大中行业的厂店资助，开办费三千九百四十八万七千七百元（旧人民币），将原集体毛巾厂厂址（现烈士街小学校址）作为总校校舍，另由市人民政府在城东、城西分别拨给一栋平房（现东门外贺八巷小学校址，原城西西蜀小学校址），作为两个分校校舍。学校老师、工友共十六人，有十一位教师系市文教科调来的，另一位老师、一位总务和三位工友，是在工商联的干部和工友中选调的。老师工友的工资全部由文教科支付，办公费、添置费则由工商联按月报销。总校设有五年一期和一年一期各一班，两个分校只招收一年一期学生。每班招收学生五十名，每期招收学生二百名。

这所学校自开办起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止，整整办了四年，共招收高、初小学生一千八百名。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市文教科规定所有私立小学要改为公办，所以新中小学就停办了，后更名为常德市烈士街小学。

第五节 认购国家建设公债，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一九五四年，为了保持第一个五年计划财政收支的平衡，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市工商联成立了推销国家建设公债委员会，经过宣传发动，全市私营企业三千七百三十七

户（包括两家公私合营企业和南站、德山、苏家渡三个分会在内），认购一十三亿零七百零六万元（旧人民币）；另外，资方从业人员二千零一十七人，以个人名义认购六亿八千七百四十六万元，企业与个人合计购买公债一十九亿九千四百六十二万元（旧人民币）。占全市各界认购公债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五九。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又购买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三十八万零五百四十六元（新人民币）。

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个春节期间，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及其家属的热爱与敬意，市工商联开展了隆重地拥军优属活动。各行业会员户自动捐献拥军优属经费一千四百三十六万三千一百元，共买猪肉一千三百斤、香烟二百条、柑桔一万八千二百斤，会同各机关团体组织慰问队，分赴专区各医院进行慰问。春节期间，工商联还推动绸布、百货、国药、新药、南货、油盐等业，实行九五折优待烈军属。同时还举办了盛大的文娱联欢晚会，邀请了驻常解放军、公安部队、荣军、休养员和烈军属一千三百多人参观了工商联的文艺演出。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全行业公私合营

第一节 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充分作好全行业 公私合营的思想准备

常德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工商行政部门、国营企业、工商联等组织以及私

营企业中的职工和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协同努力下，私营工商业者不但对国民经济恢复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且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了较大进步，思想觉悟也有较大提高，为迅速走向全行业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

为了迎接高潮的到来，市工商联于一九五六年元月二日至十三日举行了第三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因市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执委扩大会议休会六天），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体执、监委、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负责人、工商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共四百零三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主席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五百多人座谈时，指出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看清祖国前途和个人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传达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毅在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委会上先后作的关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统筹安排、全面规划等措施的报告精神。会上，中共常德市委书记孙怀珍、市长葛敬、统战部长任锡琥、省工商联副秘书长彭六安等都在会上讲了话。通过会议，大家对党和国家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表示衷心拥护，决心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伟大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朝着党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这次会议既是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前奏曲，更是私营工商业走向公私合营的巨大推动力。从此开始至一九五五年四月，市工商联先后举办了两期资方从业人员轮流训练班。学习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国家对资改造政策，《农业发展纲要》、《论人的阶级性》、《社会发展史》等。学习共分四个单元进行，时间一个月左右，采取了临时脱产，集中训练的方法。参加学习的共有八

十一人。通过举办训练班，为私营工商业接受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节 敲锣打鼓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从首都北京开始的。一九五六年元旦，首都工商界首先向国家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后，几十万工商业者和企业职工，在天安门前热烈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就大大推动了全国各个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一九五六年元月八日，市工商联召开第三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尚未结束时，本市私营工商业就有六百八十六户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当市人民政府首先批准棉布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传出后，接着全市所有私营工商业都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要求。一月九日，四百多名私营工商业者组织报喜队，打起锣鼓，鸣放鞭炮，向正在举行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喜。第二天，市工商联组织了五百多人会同各界人士分别向被批准公私合营的户表示祝贺。这样就在全市工商界中掀起了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

一月十七日，市工商联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十四个行业的资方从业人员庆祝大会。会上，市长葛敬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向全市人民庄严宣布：“从今天起，常德市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并接受全市工商业者的请求，批准了四十三个行业八百一十四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此时全市工商业者欢欣鼓舞，心情振奋，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同庆这一伟大的胜利。接着由工商联主任熊炳立率领一千五百多人，高举红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抬着报喜牌，举行庆祝游行。中

共常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在市政府门前热情接见了游行队伍。在此激励、感人的情景鼓舞下，从元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有九十六户私营工商业、一百一十七人，自愿拿出现金五千四百六十八元、公债八千一百一十六元、黄金六十九两五钱、银元四百零三元、房屋三十三栋，增加在公私合营企业的投资。

这一年年底，市工商联主任熊炳立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后，接着出席了毛主席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全市工商业者均以此感到莫大的荣幸。在此之前，本市工商界家属赵淑华、胡文英、马宗绪、工商青年孙桂中、陈超群（女）、曾遐龄等还分别出席了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工商界家属代表大会和工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第三节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后期工作

一、清产核资，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市工商联配合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进行了清产核资的政策宣传教育，发动工商界中的积极分子投入全面的清产核资工作。在职工群众的监督帮助下，实行由工商业者自己清点、估价和填报，经过同业清产核资小组评议，互相审查，最后由主管部门核准。对于少数偏低偏高的情况进行了核实调整，对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按“从宽从了”的原则，作了一次性处理。这样做既是对工商业者的信任，又是对他们的考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全市清产核资工作，仅一个月时间，就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最后核全市公私合营企业定股资金总额为一百二十七万九千一百七十二元，私方人员有定股资金的共九百三十五人，其中定股在万元以上的三人，二

千元以上的六十二人，五百至二千元的一百四十三人，五百元以下的七百二十七人。在职私方三百八十八人，定股资金为七十八万一千五百零九元；不在职的私方五百四十七人，定股资金为四十九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所有股金都作了定息。

定息七年不变（原定七年，以后又延长三年），从一九五六年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三季度为止，按年利息五厘分季发放，既照顾了工商业者的生活，又有利于他们的改造，当年七月发放第一次定息，工商业者无不感到喜出望外。

二、妥善安排人事。公私合营时，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原来就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称为在职私方人员；另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只拥有股权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国家给予安排的，主要是前者，对于后者只发定股凭证，作为领取定息的依据，在人事上不作安排。对于需作安排的人员，根据“量才使用，辅以必要照顾”和以企业为基地进行安排的原则，首先由市工商联酝酿讨论，提出安排意见，再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最后由政府批准。通过上述程序，在职私方人员三百八十八人中，对于富有经营管理工作经验的人员，安排在市属单位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有一百五十二人。其中：担任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一人，市商业局副局长一人，工厂副厂长八人，国营公司副经理三人，国营公司科股长二人，国营公司零售贸易管理处副主任九人，基层商店经理、柜长一百三十二人。其余二百三十六人，都根据各自的专长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此外，对于一部分在工商界具有政治影响的代表人物，还安排了社会荣誉职务。即：省人民代

表一人、省政协委员二人、省工商联委员二人、市人民委员三人、市人民代表十三人、市政协委员十一人。

同时还对一些家庭负担较重，生活确有实际困难，或因市场变化、企业调整改组而失业的私方实职人员，则根据需要与可能的原则，作了照顾性的安排：1、饮食业安排家属在企业工作的六十四人；2、原企业因改组而失业，这次重新安排工作的三十一人；3、原系行商因转业而失业，这次予以安排的十五人。

三、妥善安排工商联及所属同业公会办事员的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三月开始，工商联及所属同业公会的办事员由工商联统一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同业公会不复存在。通过全面规划，所有办事员都得到了妥善安排，有的调到合作社，有的调到商业系统。工商联的在职人员，全部转为国家干部。通过人事安排，进一步体现了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方针的正确性。广大工商业者纷纷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四、对小商小贩进行安排改造

小商小贩是个体劳动者，对待他们的改造与对待工商业者的改造有着原则的区别，党和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团结、教育和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三月，市工商联协助政府将理发、蔬菜、饮食、鲜鱼、水果五个行业的小商小贩，共二百八十六人，资金共四千八百五十九元，先后组成二十三个合作商店。其中：理发店十四个，蔬菜店六个，水果、鲜鱼、饮食

店各一个。水果和鲜鱼各设两个分店。

合作商店规定实行统一核算，共负盈亏，保留股金分红或股金计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合作商店都实行了工资制度。其形式有“固定工资”、“固定工资加奖励”、“死分活值”、“计件工资”以及“分成”等多种形式。具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性质。

合作商店的收入除流通费用和工资外，还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公益金用于成员福利，公积金由国营公司合作股掌握，经过批准可以用于弥补亏损和企业扩大经营。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曾经出现向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过渡”，其人员和资金都全部“过渡”去了。一九六一年调整国民经济，贯彻“八字”方针时，又才恢复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商业形式。

第四章 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变革了的新形势

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第一节 组织政治理论和文化学习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为了巩固这一伟大成果，推动私方人员积极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使工商联工作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市工商联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召开了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改造新的领导机构。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一百九十一名。其中国营企业代表

二十七名，合作社代表四名，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代表一百一十四名，小商贩代表三十九名，特邀代表七名。此外，工商界家属十五名，也列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产生市工商联新的领导班子，继续帮助私营工商业者进一步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祖国的伟大前途，掌握好自己的命运。

会议期间，听取和讨论了市长葛敬、市委统战部部长任锡琥的讲话。选举了熊炳立为主任委员，刘长治（国营）、燕春舫、吕介人、谢海泉为副主任委员，孙桂中为秘书长。会议决定举办各种类型的政治学习班，业余文化学校，帮助他们在步入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根据这次会议决定，同年三月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市工商联采取脱产学习和业余学习相结合、学习政治理论与学习文化相结合、自办政治讲习班与输送学员到专区工商联政治学习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先后组织工商业者（包括小商贩）二千一百八十人，集中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农业发展纲要》、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原则》、《论人的阶级性》、《政治常识读本》……。通过学习，私方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大有提高，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自己的光明前途，从而为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配合这次学习，市工商联于十一月召开了全市工商界积极分子表扬大会，对二百七十二名先进人物给予了充分

肯定。其中有在生产经营上做出了成绩，获得所在公司奖励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一百九十人；有一贯在同业公会积极工作，热心为会员服务的积极分子七十四人；有认真领导工商业者学习和工商界家属积极分子八人。一九五七年二月，市工商联还推选了文国佑、李玉琴（女）、刘焕星、陈述伟、黄仁济、彭雨廷、~~廖~~建业、余天福、刘永清、王银科、胡建武、马文葆十二人，出席了省工商联召开的全省工商界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第二节 举办工商界互助储金会

为了增进工商界团结互助的精神，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解决困难，藉以提高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自觉性。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常德市委的关怀和赞助下，市工商联成立了工商界互助储金管理委员会。推定熊炳立为主主任，刘长治、谢海泉、吴岳甫为副主任，聂庆钧、张俊涛等二十九人为委员。互助储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同业公会互助储金小组，具体负责开展这个工作。

互助储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以及政府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中工作的私方人员，按本人每月实际工资的百分之一缴纳互助金，行业互助储金管理小组作为会员临时性借款使用。此项互助储金，如本人死亡、患病或调离本市，可以退回本人。二是根据会章规定，工商业者领取的定息金额扣缴百分之十，作为工商界困难补助费。

工商界互助储金会，从开办到一九八四年，历时二十八载，其间因文化大革命停办了十年。在这个较长的岁月里，通过互助储金活动，起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那

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能够安下心来，努力工作，积极接受改造。三是增强了广大工商业者团结互助的精神。四是进一步密切了工商联与成员的关系，使他们体会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第三节 创办“育苗幼儿园”

一九五七年，省工商联召开全省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本市工商界家属丁师孟、杨兰芬、宛秀珍、欧阳子奉、胡文英、杜美雯、熊锦秀、郑金秀、朱培德、赵淑华、朱长华、唐金仙十二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很受教育和鼓舞。返回常德后，立即向市工商联和市妇联作了汇报，并提出举办托儿所的设想，工商联领导当即表示赞同。在市妇联的协助下，于十一月间，确定由工商联家属委员会主任丁师孟、委员朱培德、朱长华三人着手筹备，首先在兴街口办起了托儿站。翌年，由于家庭妇女纷纷参加社会劳动，双职工骤然增多，要求将孩子入托的也愈来愈多，于是工商联拨款九百元，添置床、桌、椅、蚊帐、席子、风琴等设备，将兴街口托儿站发展为幼儿园，取名“育苗幼儿园”。入园儿童由原来十八名增加到一百一十名，设有大小三个班，除半托外，还收全托。育苗幼儿园贯彻了勤俭办园的方针，儿童教具、玩具几乎都是自行设计制作。一九五九年“六一”儿童节，市妇联、文教科、文化馆联合举办青少年与老师的文艺创作展览会，育苗幼儿园的文艺创作被评为甲等优胜单位，获得了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的奖状。然而，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干扰，工商联被迫停办这所幼儿园后转为街道接管。

第四节 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同志提出两类社会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为此提出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和广泛的自由，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五月十五日发出指示，决定进行反击，这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

常德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从六月中旬揭开序幕，开始对章乃器、向德的言论，进而对孙桂中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陆续进行所谓批判。十月二十四日，工商联成立工商界整风领导小组，此时，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工商界人士，由市民建筹备委员、工商联委员扩大到行业中的骨干共三百九十九人。在运动中，经过反复动员启发，不少人出于对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爱护和关心，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倾吐“肺腑之言”的心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但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都被错误地认定是向党进攻而发射的一支支毒箭。经过半年之久的无数次大小会批斗，把工商界中二十一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工商联秘书长一人、工商联委员四人、同业公会主任、组长八人、公私合营企业私方经理、股长二人、一般工商业者四

人、工商联干部二人。他们都受到了降薪、降级、撤职和劳动教养等不公正的处理，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虽然一部分“右派分子”陆续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没有真正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甄别，以致造成了不良后果。

第五节 开展“交心”与“双献”活动

一九五八年二月，本市工商界在反右斗争和企业整风运动之后，接着开展了一个以“继续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一般整风运动，也叫“交心运动”。这次运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自我教育，是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风细雨的方法、自我交心与相互送“礼”的形式进行的。

参加这次交心的有三百三十四人，共贴出大字报五千八百四十张，交心材料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多条。从交心材料中归纳出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开展了所谓专题大辩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三个：一是要不要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二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通过辩论，工商业者修订了个人思想改造规划，并表示在企业开展的增产节约、技术革新运动中争作贡献。

这场整风运动，从交心材料来看，确有一部分虚假现象，这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毕竟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它为推动工商业者继续接受改造，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工人阶级的监督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六节 在工商界中开展内部肃反

一九五八年秋，本市开展内部肃反工作，市工商联在中共常德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工商界三人肃反领导小组”，组长熊炳立，组员聂庆钧（兼办公室主任）、盛孝农，配合公安机关在审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内部肃反斗争。

为了做到肃反、生产两不误，坚持了白天工作，晚上集中学习。整个运动共分四个步骤进行。（1）学习文件，领会政策精神，动员坦白交待；（2）背靠背的检举，内外结合调查核对；（3）大会批判、小组斗争；（4）核实材料，定案处理。

整个运动历时三个月。通过这次内部肃反斗争，对全市工商业者的政治历史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底子，对清查出来的历史反革命，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宣布戴帽管制的三人，免予处分的一人。

第七节 组织和推动工商业者参加劳动锻炼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接着在全国各条战线上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潮。面临这一形势，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体成员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企业改造为基地，把服务与改造紧密结合起来，为加速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此，市工商联推动全市工商业者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锻炼。

(1) 突击性劳动：主要是参加大炼钢铁、修筑德山马路、修建斗姆湖飞机场和万金障农场；

(2) 定期定点劳动：即按定点、定期参加车间、上柜台等企业内部的劳动；

(3) 短期劳动：主要是下乡支援农村“双抢”（抢收抢插）以及到万头猪场打草喂猪；

(4) 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主要是工商业者家属，参加街道开荒种菜和街道企业的生产劳动。

参加各种劳动的有六百八十二人（包括工商业者四百七十四人，工商业者家属二百零八人）。他们通过较长时间的劳动锻炼，在思想感情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认识到劳动光荣，剥削可耻，而且还同工人、农民建立起团结互助的关系。

第八节 传达贯彻“两会”中央代表会议精神， 教育工商业者“顾一头”、“一边倒”

由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此时期，不少工商业者产生动摇和不安。为了使他们稳定情绪，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全国工商联第三、民建中央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二千多人，市工商联胡建武、封志鹏、郑丽屏（女）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开了六十六天。会议始终贯彻“和风细雨、细致说理”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方针原则，即所谓“神仙

会”。

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毅、李先念、谭震林、李维汉等接见了全体代表。接见之前，刘少奇副主席在同“两会”中央负责人谈话中，就有关工商界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的政策，重申了党对工商业者负责到底和照顾到底的方针。并着重教导工商界人士要一心一意奔社会主义的一头，“顾一头”、“一边倒”，不要三心二意为个人利益分心，还指出，“两会”组织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工作，推动工商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同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三日，市工商联会同市民建采用上述“神仙会”的方针，召开了市“两会”委员联席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和贯彻“两会”中央代表大会精神，帮助成员端正态度，稳定情绪。通过会议，一致表示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根本改造，踏实的工作，逐步向光荣的劳动者过渡，争取早日参加工人阶级的队伍。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工商业者一百一十三人，小商贩代表九人，工商界家属代表八人。

一九六一年，为了传达贯彻“两会”中央常委第四次会议（西安会议）和省“两会”委员联席扩大会议精神，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于同年四月召开委员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采用读书会和业余政治学习相结合的方法，贯彻“三自”、“三不”（不戴政治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方针，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着重解决所谓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动摇及对当时困难的抱怨等问题。会后，为了如实反映工商界的情况，对（一）一九

五八年“大跃进”，工商界家庭经济发生的变化情况和工商业者的生活情况；（二）公私共事关系及安排使用情况；（三）子女就业就学情况；（四）领取定息情况等问题，分别在棉布、百货、糖业烟酒、酱园、生资、针织和兴街口工商业者家属小组，开展了一次专题调查，为党和政府贯彻政策、调整关系，提供了参考资料。

第九节 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四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近几年来的工作成就，对工商界和知识界的进步状况作了肯定和估价，指出“工商界大有进步”，又指出“在大有进步中还有问题”。要求工商界人士全面改变观点、立场和方法，即改变世界观。并且强调改变世界观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据这个精神，市工商联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对于工商界的骨干分子和有阅读能力的一般私方人员，采用办短期训练班的方法，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一九六五年五月，再次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在全市工商界中普遍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安排每个星期一至星期六早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三十分为学习时间。这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长达五年半之久，虽然在学习中不免受到“左”的影响，但总的来看，工商业者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方法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接受党的领导，改善公私共事关系，搞好生产经营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十节 “大反复”的来源与错误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引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是自上而下的刮起了一阵风，说是工商界存在“大反复”。一九六三年七月，“两会”中央召开十四省八大市两会主管宣教工作的负责人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把某些工商业者一些正常的思想反映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硬说近年来工商界在国内外阶级斗争风浪中发生了“又一次大反复”。市工商联和市民建跟着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前前后后持续近一年。反复批判成员中的所谓“大反复”。把成员当时对国内外形势、“三面红旗”、自由市场等方面的一些正确的思想认识，都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无限上纲，横加批判，说它是“复辟性的大反复”，是资产阶级本性在一定气候下的又一次“大暴露”、“大发作”。

由于这个错误作法，在工商界中造成了思想混乱，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直到一九八一年，李维汉同志在“两会”中央举行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对“大反复”的问题才作了否定，但是，它对常德市“两会”来说，教训也是深刻的。

第五章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血雨腥风，惊涛骇浪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引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揭开，市工商联组织全市工商业者学习所谓批判“三家村”的文件时，工商界的思想是比较平静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事，与己无关。兹后，各报刊连续登载恶意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两部电影以及《海瑞罢官》、《二月提纲》的文章，风声越来越紧。工商业者预感到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所谓阶级斗争即将来临。这时不少工商业者坐立不安起来。面对这一情况，工商联又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要求大家不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要经受住这场运动的考验。是年八月，全市红卫兵纷纷出动，大破所谓“四旧”，工商界首当其冲，家家户户被搜查，翻箱倒柜，挖地敲壁，所有金银手饰、现金储蓄、古董玩器、名画对联、较好的衣服衣料……统统被当作“四旧”加以破坏和劫空。有些工商业者被挂上“反动资本家”的黑牌，游街

示众，挨批挨斗。

八月下旬，市工商联的大门前贴上了两张大字报，标题是：“工商联是牛鬼蛇神的黑窝”、“是资本家的老巢”。

九月，造反派一个战斗队进驻工商联机关。这时，工商联和民建机关内部也开始紧张起来，秩序混乱，被迫停止办公。

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口号下，多数工商业者都从原有的工作岗位上撤下来，勒令下车间、柜、组参加劳动，拉板车，干重活，以示惩罚。站柜台的工商业者，佩带白符号，列为专政对象，进行人格上的侮辱。有的工资被扣减，有的还被无故押回原籍批斗、折磨、摧残、丑化，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六八年底，造反派又在所谓“纯洁城市”、“建立无敌城”、学习什么“江西经验”的口号下，将工商业者一棍子赶下农村，全家下放，接受毫无意义的“再教育”。

一九七一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又将下放农村的数十名工商业者喊回城市，实行逼、供、讯、诱，搞禁闭检查，制造冤假贪污案。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不幸逝世，不准工商业者戴黑纱，不让他们参加追悼活动。总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一些原工商业者，真是处于是非颠倒之中，无有申冤雪屈之地。不仅本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凌辱和折磨，而且株连了后代，子女被打入“另册”，升学无门，招工无份，长期下放农村接受所谓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尽管如此，他们一开始就对这场所谓“大革命”产生怀疑。因此运动之中，个个坚守工作岗位，不参加任何一派造反组织，也不介入“文化大革命”。认为现实的一些做法，绝对不是党的政

策。始终没有动摇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在此时期，工商联和民建机关的几位负责人，虽然机关被迫停止办公，本人及家属下放农村，但从未间断与成员的联系，经常勉励原工商业者要坚信党的政策，乌云是永远遮不住太阳的。这对当时稳定工商业者的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节 大地回春，重见光明

一九七六年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粉碎了，举国欢欣鼓舞，额手称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从危难中挽救了革命，使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九七七年初，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开始恢复组织活动。年底，两会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叶剑英副主席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我国各民主党派和许多爱国人士在取得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方面所作的贡献，重申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求把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九七八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又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乌兰夫部长就落实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八项政策作了解释：（1）工商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房应该发还；（2）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3）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4）人事安排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5）为了调动积极性，应当组织他们和职工一起参加劳动竞赛评

比；（6）对于他们的病假工资，根据实际情况发给百分之五十至七十；（7）医疗待遇按照职工的待遇办法办理；（8）对于他们的子女入党、入团、升学、招工等问题，要坚持“重在表现”的原则，不得歧视。

一九七七年二月，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当时市委统战部尚未恢复）举行各界爱国人士春节联欢晚会，会上，中共常德市委再次重申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党的统战政策的继续贯彻，使原工商业者重见光明。为工商联恢复机构，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所有这些，全市工商业者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深感寒冬过去，春满人间。

第六章 坚定不移跟党走

奔向新的里程碑

第一节 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市工商界代表一百多人座谈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统战政策的严重罪行后郑重声明，他们在爱国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制造的所有冤、假、错案，都必须平反、纠正和昭雪。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关八项政策要落实好。翌年三月，中共常德市委统战部组成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的领导班子，并抽调原工商联、民建的负责人谢海泉、胡建武、聂庆钧、张俊涛等四位同志参加这一工作。从一九七九年三月起到一九八〇年五月，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

工作。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农村的原工商业者的二百九十四人，已全部收回城市，恢复公职，随同下放的家属子女二百二十一人，迁回户口。二、“文化大革命”中占用原工商业者的私人房屋，共二十四户，计四百八十五平方米，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了落实。1、退回原房；2、退还原房确有困难的，进行折价处理，另行安排住处。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三十一名原工商业者被查抄了财物，本人有据，核实无讹，已作价退回或退回了原物，退赔金额共七万七千四百七十五元。四、“文化大革命”中，有二十六名原工商业者被扣减了工资，已全部补发，计金额二万七千六百四十四元。五、按政策应补发原工商业者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前的定息，共一千二百三十人，总金额十七万六千四百二十元。其中自愿领取的有六百六十六人，定息金额六万零四百八十四元，都已全部补发。其余均系自己愿意放弃。六、“文化大革命”前，定股在两千元以上的原工商业者，一般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自粉碎“四人帮”以后，已与其他职工一样，全部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七、二十四名有干籍的原工商业者，“文革”期间被取消了干籍，不仅已经全部恢复，而且还从原工商业者中新提拔了四名干部。八、纠正了“文革”期间的四起假案和“文革”前的四起错案。九、“文革”前，不应精简的四名原工商业者已全部收回，按退休和退养的办法，作了妥善处理。十、原工商业者和工商联的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的二十一名右派分子，已全部改正。十一、原工商业者八百一十八人中，属于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六百四十四人已全部区分，由常德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三小”证明书。十二、对守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

女，党中央重申要坚持重在个人表现，不唯成份论。在入党、入团、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能歧视他们。全市各级党委都作了大力宣传贯彻，纠正了“文革”期间那些不合理的现象。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他们感激党的恩情，缅怀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进一步体会到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纷纷表示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第二节 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服务改造的新起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召开，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拨乱反正的方针。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邓小平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接着在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作为阶级的地主、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这个喜讯在常德市工商界中传开之际，真是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好象精神上卸下了枷锁，思想上放下了包袱。不仅工商业者本人愉快，家属子女

也感到格外高兴。众口同声地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真是来之不易，是党和毛主席谆谆教导和坚持“听、跟、走”的结果。人人表示要把这个喜讯作为服务四化的新动力，作为自我改造的新起点，写好晚年的新篇章。

正在这个令人兴奋、喜悦的时刻，原市工商联的领导成员会同市民建临时领导小组，在中共常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市委统战部的具体帮助下，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在常德饭店首次召开了“两会”成员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同年十月，原市工商联负责人谢海泉、陈述伟出席了“两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会员代表大会。

第三节 召开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恢复组织活动

随着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各条战线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根据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恢复我省十市一县工商业联合会的通知”和中共常德市委“关于恢复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了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一百三十一人（原工商业者代表七十五人、工商界妇女十人、国营企业代表十七人、特邀代表二十九人）。

会议期间，由上届委员会副主任谢海泉作了第六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胡建武传达了民建湖南省委员会、省工商联第二次委员联席扩大会议精神。中共常德市委副书记张让伯到会祝贺并讲了话，充分肯定了市“两会”成员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成绩与贡献，阐述了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政策，对大家提出了真挚、诚恳的希望。市总工会副主席裴先秋也在会上讲了话。

与会代表在讨论恢复工商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常德市工商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由执行委员十九人组成，推选谢海泉为主任委员，熊志飞、胡建武、陈述伟、张俊涛为副主任委员，蒋运华为秘书长。随之制定了开展活动的计划，建立了退休老年和妇女学习组。自此工商联正式恢复组织，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一九八一年三月，孙桂中代表常德市“两会”组织，出席了“两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介绍了本市“两会”广开门路，协助安置待业青年，开展工商专业培训，提供经济咨询服务的作法和经验。

第四节 工工商联的工作转轨，服务经济建设中心

一、加强宣传工作与政治思想教育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工商联从四个方面开展了新时期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

1、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形势与变化，使成员的思想适应时代的需要，明确认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我国已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内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要求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

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干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有关政策和成就。要求原工商业者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和衷共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2、宣扬原工商业者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增强他们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光荣感。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原工商业者“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严重，看不到自己的作用。加上某些部门不大重视他们的技术专长和经营管理经验，致使他们深感自己无用武之地。针对这种情况，工商联一方面利用各种会议和一切有利时机，请党委和政府领导人在干部、群众中，宣传我国民族工商业者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土生土长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夹缝中生存过来的，因此它保留了我国民族经济的许多好传统，使各界了解和重视他们的作用，在工作中发挥他们的长处，使其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鼓励和教育原工商业者做出成绩，并通过召开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来改变外界对他们的观感，又启发他们开拓为四化服务的多种途径。

3、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使各界懂得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建、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仍然具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求

成员自尊、自信、自强，主动积极地投身于四化建设，为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4、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对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是围绕党的中心，组织成员进行形势、政策学习，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二是采取小型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取长补短，互相提高；三是表彰先进，推动服务；四是代表成员的合法权益，关心成员的生活，对体力不适合现行工种的三十二名成员，建议有关单位进行了调整。对生活上有困难的原工商业者和已去世者的遗孀，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止，进行了慰问、补助的共一百九十五人次，支出费用共三千四百三十多元。

通过上述工作，使原工商业者提高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进一步奠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决心与意愿。

二、举办为四化服务成果展览

为了检阅“两会”成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成果，宣传新时期党的统战政策的巨大威力，市工商联在民建的配合下，于一九八二年三月首次举办了常德市“两会”成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成果展览。展览内容：用八十六块板面、五幅图表、七十四张照片、一百二十四件实物、产品，编成五个部分：（一）《落实政策，精神振奋》、（二）《四化征途，贡献力量》、（三）《发挥所长，培训人才》、（四）《“三胞”联络，蓓蕾初放》、（五）《维护国家利益，拒绝贿赂》，分别介绍了三十九名成员的先进事迹。中共常德市委、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及直属机关的负责同志均参观了展出，对“两会”成员为四化服务的一片热忱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它对成员也是一次生动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教育。有的成员看了展览后，抒怀感慨：“看今天，气象更新形势好，睹展览，党的政策暖人心，想未来，四化功成万户乐，问自己，续尽全力献一才”。有的还写道：“枯树叶凋根犹健，春来枝嫩换新颜，春蚕将死丝勤吐，苦学苦干再十年，人老体弱心犹壮，四化征途我添砖”。通过展览，收到了“展列光荣事迹，促进经验交流，相互启发帮助，激励鞭策前进”的效果。在常德市展览之后，将展览图表、实物送往湖南省各民主党派为四化服务成果展览厅展出，受到了省里有关领导同志的赞扬。

三、围绕党的建设中心，开展经济咨询服务

市工商联从恢复活动起，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优势，组成了一支七十五人的咨询服务队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服务活动。一是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献智献力；二是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查，提供系统的改进方案；三是派出成员参加省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的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团，为有关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四是加强与各地“两会”大协作，为发展本市地方经济尽力。截至一九八四年，共提供咨询建议一千三百四十多条，被采纳的有一千二百三十五条。承接咨询项目八十五个。通过提供经济咨询，使本市一个工厂扭亏转盈、二十六个工厂、商店增产增收，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四个单位受益。如一九八二年，工商联会同市民建组织一部分原工商业者，针对中药行业的加工泡制、点药配方、药物保管、成品包装、操作规程、青工培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四十三条建议，还就全面改进中药业务整理了一份建议书，受到了

国家医药总局的重视与称赞。一九八三年，德山玻璃总厂出现严重亏损局面，“两会”组织力量进行十五天的调查，提出六项改进方案，有效地促进了德玻总厂扭亏转盈。同年三月，“两会”又承受市二鞋厂提高铸模、植带、造型技术的培训咨询，通过与上海市“两会”的联系，培训了三个工种的技术人员，使该厂提高了维修能力和设计水平。并由“两会”牵线搭桥在河南安阳购买了一台车床，改变了过去零配件需要外地加工的局面，不仅全年可以节省加工费和材料消耗一万多元，而且使生产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四。经济咨询服务的开展，为工商联的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四、结合需要与可能，推动工商专业培训

从一九八〇年九月开始至一九八四年年底，根据“两会”中央提出的“扬长避短，拾遗补缺，稳步前进，讲求实效”的培训方针。市工商联和市民建组织了十九人的教师队伍，面对本市存在的“六难”（记帐难、打印难、做衣难、五机修理难、中药材识别真伪难、幼儿入托难），自办了一所“育才会计学校”，协助市五交化公司、市医药公司、市总工会、市电子学会、地区卫生学校等单位先后举办了五个培训班，接受湖南省劳动人事厅与省“两会”的委托，办了一个全省性的“五机”修理师资学习班。此外，还推行了由企业提供培训场所，实行以老带新、岗位带学徒的培训方法。在职业技术教育上，由于采取了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方法，先后开办了三十六个班次，共培训工商财会、“五机”修理、中药材业务、缝纫、烹调、打印、幼师等各种专业人才九百六十八名。在培训过程中，采用了直观教学、着重实践操作，课堂讲授与课外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较好地收到

了短期速成，学以致用，切合需要的效果。例如：育才会计学校在一九八三年以前培训的二百七十五名商业会计学员，结业回到工作单位后，有七人担任了商店经理，七十九人担任了主办会计，一百八十一人担任了一般会计。对口安排的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五。通过培训会计人员，大大地充实了全市财贸系统和乡镇企业的财会力量。本市副食品总店下属二十三个基层商店，原来只有三个会计人员，平均每个会计要管七家店子的记帐，以后增加到二十名会计，新增的十七名会计都是育才会计学校毕业的学员。由于帮助企业提高了财会人员的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也得到了加强与改善。据市商业局调查，一九八三年与一九八〇年相比，全市商业系统所属基层单位的费用水平，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利润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一一，资金周转加快了三十二点八天。省商业厅特为此向全省商业系统行文推荐。由于贯彻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为一部分待业青年创造了优先安排的条件。这几年育才会计学校先后培训的一百一十六名待业青年，有一百一十二名优先安排就业。

一九八四年受省劳动人事厅和省“两会”委托举办的“五机”修理师资培训班，由省内九个专区三十四个市县劳动部门调来培训的五十四名学员，在主讲老师、本会成员吴德鉴的精心培育下，收效也很快。毕业考试时经过技术评比，有三十名学员已符合无线电修理二级工的标准，有十四名达到了一级工的修理水平。大庸县两名学员结业回去后，就在本县城关镇邀集三个待业青年办起了“梅乐电视机修理店”，填补了该县修理电视机的空白。

由于市工商联面向社会办学，注重办学质量，坚持以校

养校的方针，不要国家花一分钱，从而赢得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受到了社会的称赞。一九八三年，出席了“两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培训工作经验交流和表彰大会，一九八四年，育才会计学校被评为全省民主党派、工商联办学的先进集体，育才会计学校教务组长、民建会员王佑轩出席了全省职业技术培训先进表彰会。

五、举办经济实体，安排城镇待业青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四化建设中，国家面临着一个劳动就业问题。为了广开就业门路，协助政府更多的安置待业青年，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常会于一九八〇年四月邀集了两省八市“两会”负责人就协助安置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举行了座谈会，提出了推进这项工作的意见。一九八一年八月，“两会”中央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下达了《关于各地劳动服务公司和民建会、工商联密切配合广开门路，搞活经济，扩大城乡就业的通知》。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乡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责成各地有关部门和民建会、工商联在统筹规划下协同工作，为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

为了贯彻上述指示精神，市工商联和民建会一方面推动工商联的妇女骨干，协助城北办事处在一九八〇年办起了“建民印刷厂”，先后安置待业青年七十人。另方面，采取自办和联办的形式，于一九八〇年三月兴办了“百花服装厂”，一九八四年开办了“工商贸易服务公司”和“兴中打印服务部”，这三个经济实体共安排待业青年五十二名，截止一九八四年年底，三家企业共盈利积累十五万二千元；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减轻了国家在安置工作上的负担。

六、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创建“新蕾幼儿园”

一九八四年五月，市工商联和民建会鉴于本市战备桥新建的三个居民村，居住着两千多户人家，有五百多个儿童入托难。为了帮助群众解除“后顾之忧”，拟在新一村一块空坪隙地上创办一所幼儿园，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拨款六万六千元修建园地。“两会”妇女骨干和工商界人士也自动资助五千二百八十元，另由工商联所办的三个集体企业在提取的咨询服务费中拨款一万五千元，用作内部装修、购置儿童教具、绿化园地、添建娱乐设备。并以“两会”妇女骨干为主，组成幼儿园管理委员会。该园取名“新蕾幼儿园”，设园长一人，总务一人，幼师、保育员八人，炊事、勤杂二人。同年九月一日正式开园入托，招收了一百九十二名儿童，设大、中、小四个班。从而为临近居民解决了一部分幼儿入托难的问题。

七、加强“三胞”联络，整理文史资料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市工商联不断组织工商界有关成员座谈，并串门走访，大力宣传党和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帮助“三胞”亲属消除疑虑，积极沟通与自己亲人的联系。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在工商界已有十一户与长期分居在港、澳、台和国外的三十七位亲友互通了信件。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间，有五人先后回国来常探亲访友。市工商联对他们千里迢迢回到祖国，进行了热情的接待，为他们住宿、参观、旅游以及需要家乡土特产品等提供了一切方便。

美籍华人、化学博士丁时范和高级工程师胡彬彩在常德探亲时，市工商联和民建会还邀请他们分别为本市科技界、教育界和“两会”成员作了有关化学、电脑等方面的专题学术报告。丁时范博士返美后，还将回国探亲时的见闻制成幻灯片，在美国宾夕法西亚州大学放映，向学校师生和亲友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变化和喜人成就。一九八三年，工商联副主任陈述伟的岳母王简从香港回常探亲之后，看到党和国家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祖国形势越来越好，于是决意将其夫胡祥阶生前分给内地五个儿女的遗产，折合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全部汇回。

工商史料是研究我国民族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就组织力量，成立了文史工作组，由张俊涛、胡建武两人负责收集整理。截止一九八四年，已编写工商史料二十篇，约十一万多字。其中，《百年老店吉春堂药号》已在湖南日报发表；《常德牙行史话》在《湖南地方志通讯》上转载后，引起了中商部、供销总社的重视，指出这是搞活流通和改革经济体制，古为今用的一篇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史料。另外，《商办乞丐收容所》、《常德商民协会与贺凤章》、《八年抗战中常德植物油业的处境与遭遇》都分别在《湖南工商文史选刊》和市政协主办的《常德文史资料》中予以登载。这些史料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解放前常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面貌。

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历届负责人名单

届别	职 务 姓 名	任 期	单位名称与职务
筹 备 委 员 会	主任委员何志明	1950·1—1951·8	私营华法西药房经理
	副主任委员熊炳立	" "	私营大孚绸布号经理
	副主任委员熊伯祺	" "	私营同济堂药号经理
	副主任委员何志雄	" "	私营何顺记香烟店经理
	常务委员邹文元	" "	常德专区工商局业务科长
	常务委员刘华甫	" "	常德市供销社负责人
	常务委员解元庭	" "	私营解云记南货号经理
	常务委员谈宗华	" "	私营璇宫旅社经理
	常务委员谢开元	" "	私营同兴酱园经理
第一 届 委 员 会	主任委员熊炳立	1951·9—1952·12	私营大孚绸布号经理
	副主任委员张志诚	" "	国营百货公司常德分公司经理
	副主任委员燕春舫	" "	私营春记福百货号经理
	副主任委员何志雄	" "	私营何顺记香烟店经理
	副主任委员吕介人	" "	私营柏记针织厂经理
	秘 书 长何志明	" "	私营华法西药房经理

常务委员	赵广田	1951·9—1952·12	人民银行常德市支行经理
常务委员	马文葆	" "	私营大中书店经理
常务委员	谢海泉	" "	私营信义药材批发号经理
常务委员	熊伯祺	" "	私营同济堂药号经理
常务委员	周达武	" "	私营大新香烟号经理
监察委员会主任	谈宗华	" "	私营璇宫旅社经理
副主任委员	解元庭	" "	私营解云记南货号经理
主任委员	熊炳立	1953·1—1954·5	私营大孚绸布号经理
第二届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张桂清	国营盐业公司常德分公司经理
	副主任委员	燕春舫	私营春记福百货号经理
	副主任委员	张志诚	国营百货公司常德分公司经理
	副主任委员	吕介人	私营前进针织厂经理
	秘书长	白殿芳	专职秘书长(中共党员)
	副秘书长	何志明	私营华法西药房经理
	常务委员	孙桂申	私营怡农染织厂经理
	常务委员	谢海泉	私营信义药材批发号经理
	常务委员	张俊涛	私营信泰昌烟号经理
	常务委员	盛孝农	公私合营汇沅企业公司副总经理

第三 届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马文葆	1953·1—1954·5	私营大中书店经理
	常 务 委 员	胡建武	" " "	私营太成生酱园经理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	谈宗华	" " "	私营璇宫旅社经理
	副 主 任 委 员	郑木彬	" " "	国营工矿公司负责人
	第 一 主 任 委 员	熊炳立	1954·6—1956·7	私营大孚绸布号经理
	副 主 任 委 员	刘国璞	" " "	国营常德百货公司经理
	副 主 任 委 员	武继春	" " "	人民银行常德市支行营业部副主任
	副 主 任 委 员	燕春舫	" " "	私营春记福百货号经理
	副 主 任 委 员	吕介人	" " "	私营前进针织厂经理
	副 主 任 委 员	谢海泉	" " "	公私合营常德饭店副经理
	秘 书 长	刘志达	1954年下半年调离	专职秘书长(中共党员)
	秘 书 长	刘润泉	刘志达调走后由其接任	专职秘书长(中共党员)
	常 务 委 员	李全有	1954·6—1956·7	地方国营建民织布厂厂长
	常 务 委 员	李泽民	" " "	私营三兴斋南货号经理
	常 务 委 员	何志明	" " "	私营华法西药房经理
	常 务 委 员	胡建武	" " "	私营太成生酱园经理
	常 务 委 员	孙桂中	" " "	私营怡农染织厂厂长
	常 务 委 员	马文葆	" " "	私营大中书店经理

第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	陈述伟	1954·6—1956·7	私营吉春堂药号经理
	常务委员	张光达	"	公私合营华晶玻璃厂经理
	常务委员	盛孝农	"	公私合营汇沅企业公司经理
	常务委员	黄梁臣	"	私营安昌绸布号经理
	常务委员	张俊涛	"	私营信泰昌烟号经理
	常务委员	童利生	"	私营新常服装店经理
	常务委员	谈宗华	"	私营璇宫旅社经理
	常务委员	聂庆钧	"	私营聂振茂药号副经理
	常务委员	詹之勉	"	私营詹文成茶号经理
	主任委员	熊炳立	1956·7—1957·8	常德市副市长(兼)
	副主任委员	刘长治	"	国营中国百货公司
	副主任委员	吕介人	"	常德市公公司副经理
	副主任委员	谢海泉	"	公私合营常德市针织厂第二厂厂长
	副主任委员	燕春舫	"	国营福利公司副经理
	秘书长	孙桂中	"	国营百货公司常德市公司副经理
	常务委员	张俊涛	"	公私合营常德市针织厂第二厂厂长
	常务委员	张光达	"	国营烟酒专卖公司零管处副主任
	常务委员	李泽民	"	地方国营常德市印刷厂厂长
				国营常德市贸易公司零管处副主任

第五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	易正文	1956·7—1957·8	公私合营华晶玻璃厂副经理
	常务委员	胡建武	"	公私合营太成生酱园经理
	常务委员	吴岳甫	"	私营力成杂货店店主
	常务委员	马文葆	"	公私合营文华文化用品店第二经理
	常务委员	聂庆钧	"	公私合营聂振茂药店副经理
	常务委员	黄梁臣	"	国营纺织品公司零贸易管理处副主任
	常务委员	盛孝农	"	国营常德市福利公司副经理
	常务委员	詹之勉	"	公私合营詹文成茶号第二经理
	主任委员	熊炳立	1957·9—1962·1	常德市副市长(兼)
	副主任委员	燕春筋	"	国营常德市百货公司副经理
	副主任委员	谢海泉	"	国营常德市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
	副主任委员	胡建武	"	国营常德市食杂总店副经理
	副主任委员	刘长治	"	国营常德市通用机械厂厂长
	常务委员	盛孝农	"	国营常德市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
	常务委员	张俊涛	"	国营副食品总店副经理
	常务委员	张钟堂	"	饮食合作商店经理
	常务委员	李泽民	"	国营常德市饮食公司副经理
	常务委员	封志鹏	"	国营常德市日杂公司副经理

第六 届 委 员 会	常务委员	聂庆钧	1957·9—1962·1	民建常德市筹委会 组织科科长
	主任委员	熊炳立	1962·2—1982·4	常德市副市长(兼)
	副主任委员	谢海泉	" "	专职副主任
	副主任委员	胡建武	" "	常德市商业局副局长(兼)
	副主任委员	陈述伟	" "	国营吉春堂总店副经理
	秘书 长	黄明德	" "	中共党员，未到职
	副 秘 书 长	张俊涛	" "	国营常德市糖业烟酒公司副经理
	常 务 委 员	陈鸿文	" "	国营常德市糖业烟酒公司经理
	常 务 委 员	卜松柏	" "	国营常德市百货公司副经理
	常 务 委 员	盛孝农	" "	国营常德市服务公司副经理
	常 务 委 员	李泽民	" "	国营常德市饮食公司副经理
	常 务 委 员	封志鹏	" "	国营常德市日杂公司副经理
	常 务 委 员	易正文	" "	公私合营华晶玻璃厂副厂长
	常 务 委 员	黄梁臣	" "	国营纺织品公司副经理兼安昌棉布店经理
	常 务 委 员	刘忠明	" "	常德市工商联合作分会主任
	常 务 委 员	丁师孟	" "	工商联家属委员会主任、育苗幼儿园副主任
	常 务 委 员	聂庆钧	" "	民建常德市筹委会组织科长

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谢海泉	1982·4—1984·	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
	副主任委员	熊志飞	"	常德市商业局副局长(中共党员)
	副主任委员	张俊涛	"	本会专职副主任
	副主任委员	陈述伟	"	国营吉春堂药店副经理
	副主任委员	胡建武	"	常德市商业局副局长
	秘书长	蒋运华	"	专职(中共党员)
	常务委员	易正文	"	国营德山玻璃总厂副厂长
	常务委员	张启生	"	工商联工作人员
	常务委员	刘永清	"	常德市人民医院行政股副股长

典当业的兴衰

张俊涛

(一) 典当业的发生、发展与消亡

典当，是旧中国一种高利贷形式。它是按借款人提供质押品的价值打折扣，贷放现款，定期收回本金和利息。旧称质库、解库，后称典铺、当铺。

“典当”二字最早见于《后汉书·刘虞传》。《南史·褚渊传》和《南史·甄法崇传》中已有寺院兼营典当放款的记载。唐朝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皇帝一个文诰中说，“朝列衣冠”“代承华胄”以及“清途”（士绅）们都“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全唐文》卷七十八）。历代贵族大官僚亦多经营典当，清代和绅就拥有当铺七十五家，资本银三千万两。

常德市典当业在清末民初至南北军阀混战之前，先后开设有如下八家当铺：

典当业资金较为雄厚，最多的户如山西邦的“乾丰益”、“益昌恒”，江西邦的“瑞兴当”，各拥有资金四至六万银元左右，其余的户都有一至二万银元上下。如果遇有大宗质押物质，本身资金一时无法应付，并可向“票号”临时借款（月息为一分六厘）。此业资金之多居全市各业之首。

“当铺”经营质押业务。在旧社会，由于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穷苦百姓、破落商贾和失意官宦，藉糊生计或解决一时急需，不得不将自己的衣物、古玩、字画、金银首饰等贵重物资向“当铺”典押。金銀质押八折，估衣质押五成甚至三、四成不等，质押月息三分，“当期”一年，超期两月“死当”。尽管这是一种高利贷形式，但穷苦农民和市民，却认为典押月息，比之向地主“卖青苗”和借“打钱”的利息要轻。同时，在“死当”期前，如无钱赎质押品，还可以“转当”，即交纳原当期的利息后，再延长一年当期。因而愿意将自己的衣物等拿到“当铺”典押。夏当秋衣，冬当夏衣，春当秋赎（即上半年将衣物典押，秋收后将当物赎回）。由于上述原因，典当业也与其他业一样，具有“七死、八活、九翻身”的季节规律性。在此时期，典当的人很多，“死当”的人也不少，业务极为兴旺，店主获利颇多，这是当铺的繁盛时期。

一九一八年南北军阀混战时，湖南督军谭延闿被北洋军阀汤芗铭的部队赶跑之后，原发行的湖南省银行货币，已经不能流通，造成市场经济混乱。后驻军冯玉祥（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兼湘西镇守使）悬牌公告，规定湖南省银行的纸币一律两折收回。这样，凡持有湖南省银行纸币的人受害非浅，当铺损失更为惨重，全行业被迫倒闭。

一九二〇年后，由于社会的需要，又有人发起恢复这行业务，并改名为“押铺”。“押铺”与“当铺”性质相同，但具体经营方式有些不同，表现在：一、利息：“押铺”高于“当铺”。当铺典押月息为三，押铺典押月息为五分。二、典当期：“押铺”短于“当铺”。“当铺”规定“当期”为

一年，超期两个月“死当”，“押铺”规定“押期”只有十个月，超期两个月“死当”。三、典当范围：“押铺”宽于“当铺”。“当铺”规定只典当衣服、古玩、字画、金银首饰等贵重物件。“押铺”除了质押上述物件外，还收押家具、器皿、赌具、鞋帽、铜锡铁器等。由于“押铺”收押的范围扩大，押息增高，因而开“押铺”的人又逐步增多。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全市又先后开设有“厚生德”、“福同永”、“志成”、“春和福”、“同发长”、“广福”、“公仁”、“公平”、“公余”、“泰丰生”、“瑞半恒”、“同福永”、“义生永”、“裕兴”、“恒达永”、“通融”、“裕泰”、“裕顺长”、“积成”等二十四家押铺。一九三一年以后，因官僚资本主义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设在常德的分支机构也插手其间，开办小额质押业务，加之质押上述物件的日渐减少，以及“押铺”原来赖以销售“死当”物件的自设估衣店和外业衣庄从事改旧卖新的业务，因而典当业趋于衰落，逐年歇业。到一九三五年，全市就只剩“公平”一家押铺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公平押铺”忙承担不起战争破坏的责任，也关门歇了业。从此常德市典当业的历史就宣告结束。

（二）特殊的行业，特殊的管理

典当行业开业前，必须向县知事衙门呈报备案，请领牙帖（牙帖费二至三百银元），求得保障后方可营业。由于质押的物件五花八门，古今什陈，没有固定的模板、标样可比，因此收押、保管、退回等各个环节，必须认真细致，制度必须严格，手续必须健全，所以在管理上同其他行业有其

不同的特点。

在安全措施与赔偿责任方面：1、雇有“更夫”夜间巡逻，防火防盗。2、柜台高达八尺，防止坏人偷抢闹事。3、每收一笔典押物品，给质押人一张“当票”，作为“起当”（即赎回的意思）时的凭据。“当票”上书写物品名称、数量的字体别具一格，只有同业人员才能识别，防止冒领冒赎。4、“当票”上面注明“兵灾人祸，虫伤鼠咬，邻近火烧，概不赔偿，店内被盗和起火，才照价折赔。”“当票”式样如下面：

在规章制度方面：1、典押物资入库后，件件吊有标签，注明姓名、品名、成色、典当日期、典当金额、死当年月、货号。2、发货时，如发生张冠李戴的差错，其造成的损失，全由掌柜先生赔偿。3、店员、工人不准嫖妓，不得扒窃，没有家属的店员、工人不得外宿，老板经常突击查铺，违者当即开除。4、店员、工人、学徒都得请具铺保，铺保的责任是负责被保人不偷盗、不亏店款。如发生上述违章情事，唯保人是问。

在店员的去留与工资福利方面：1、工资：店员、工人除在店里吃饭不计算现金工资外，月工资最高的可拿十六块银元，最低的（即出师的学徒）可拿六至七块银元，学徒只供给伙食不给工资。2、“外水”：指每月固定工资以外可以分得的其他收入。一种是叫“提成外水”，即“死当”的衣物，卖给估衣店所得的价款，提成六分，作为店员、工人的“外水”；二种是翻晒和放箱保管较好的衣物如皮袍皮袄、绫罗绸缎等的工钱；三种是“人力红”。这三种收入的总和划分若干股，再按店员占一股、学徒占半股，进行分配。

3、没有结婚的店员、工人住店，自备铺盖。外地店员每三年给探亲假一次，时间是六个月。家住常德农村的店员一年给假两次，即插秧和检茶籽期间，每次一个月。凡属假期，工资照发，“外水”照分。4、一般店员、工人、学徒的去留与否，在每年农历正月初八这一天，由老板召集个别谈话决定。要留用的，由学徒将老板事先写好的留用条子，用茶盘送给被留用的本人；不予留用的，老板即以所谓“去年生意不好，今年缩小范围，另请高就，今后为生意需要人，再来借重大驾”等套话将其辞退。因此，每逢正月初八的到来，店员、工人们就诚惶诚恐，担心“两个山字起垛（即出的意思），饭票子过河”，不得不另谋生路。

利	濟	當	字	號	件(注)
今將自己					
當本光洋	壹拾元零貳角				
兵災人禍、虫傷鼠咬、鄰近火燒，非人力所能抵抗的本店不負賠 償責任，如因保管不善、被盜或店內起火照價折賠。					
年	月	日			

注：今將自己破青蘭花白布洋 女 男 汗褲挂棉袄身捌件

钱庄的兴起与变迁

胡建武

清乾隆时期，各省商人陆续来常德经商者，大都各擅一业，江西籍商人善于经营药材、金银首饰，安徽籍商人长于经营笔墨茶叶，河南籍商人多从事皮毛成衣生意，湖北籍商人则从业于纸张印刷。而山西籍商人大抵以经营“票号”为多，专司银两票兑业务，为省内外埠际之间的贸易服务，一般不直接对商人贷款，只对“钱庄”贷放款项。“票号”的收入主要来源有：一是汇水；二是存放款利率上的差异；三是“压平擦色”，即利用当时各地区间银两平色上的不统一，在换算时所取得的利润。由于汇兑比“镖局”（明清时代的汇兑机构）运送现银了结算既安全又取费较少，因此，“票号”业务发展很快。

据传“票号”成立最早的一家是清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的日升昌颜料庄。它在北京、天津、重庆、汉口等地设有分庄，因兼营汇兑，获利甚丰，便改称日升昌票庄。其后，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商人经营“票号”者日益增多，形成了三帮，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常德的山西商人来常开设“票号”，盖源于此。后来，“票号”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代办官款的存放和借垫，起着为清朝政府经理库银的作用。辛亥革命后，这

项业务随同清朝政府的覆灭而消失，大多数票号随之倒闭。

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开放，常德进出口贸易扩大，金融挹注活跃，为钱庄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清末民初，常德银钱业一时颇有蓬勃气象，全市钱庄计有卅家之多，官钱局有二家，一为湖南官钱局，一为裕宁官钱局”。官钱局当时发行一串文纸币流通市面，嗣后改为铜元票。民国肇建，官钱局更名为湖南银行，与实业银行、矿业银行适成为常德鼎足而立之三银行，各行均有串文纸币发行。各钱庄亦纷起效尤，大有纸币满街飞，现金无觅处之慨。据《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载：“钱票，常德一埠受祸尤烈，常德谓纸币为花票。裕通恒、刘隆庆、恒庆、义源泰，各钱庄出钱票数十百万串，季亨泰、蒋万新等布号亦出钱票数十万串，上至云贵，旁通川鄂，颇著信用。继因勒兑铜元（府县示谕□遵），金融停滞，各种商务一落千丈，持票入市者不能得到现钱，行商小民苦之。因而一时挤兑之风盛行，各大钱庄无力应付而倒闭，如刘隆庆、源庆亏款百数十万纸币。府县亲往清查，竟无票根，引为诧异。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后，因挤兑宣告破产之钱庄不计其数，常德金融业遂陷于极端的混乱状态中。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以后，钱庄又渐有恢复，陆续开业的有：吉庆裕、义厚成、慎吉祥、春和福、裕大、利商、元昌、德顺、厚余、协通、同益、新安、志大、光裕长、恒得、德昌源、益市、兴记、义孚十九家之多。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基础薄弱，发展不稳定，加以银行业兴起，因之，钱庄的地位也不巩固。到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据《常德县之工商业现况》调查记载：“常德钱庄现存者计有德昌源、光裕

长、兴记、同益、厚余、志大、义孚、德顺八家。资本总额为十八万二千银元，每家资本平均在二万三千银元左右”。其中以光裕长资力较厚，约有六万银元，他若义孚资本一万二千银元，为该地钱庄资本之最小者，德顺钱庄本身资本有四万银元，还有“附存”（股东长期存入钱庄计息的存款）四万银元，实际拥有资本八万银元。由于资金雄厚，崇尚信誉，该庄放款竟达五、六十万银元的架子。”

常德钱庄业务较为单纯，除同益、厚余、德顺、兴记等兼营棉纱外，其余都专营存放款及汇兑。存款又分本地及外埠两种：外埠存款，在银行方面，可说绝迹，钱庄方面则有之，此乃钱庄之特色。钱庄均属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又分长期（附存）定期两种。放款主要是信用放款一种，各商户是其最大主顾，无工业投资和农业放款。商业放款以木业、绸缎业为最多，次为布业、百货、油行、金银首饰等业。对油行除信用贷款外，兼做抵押放款。同时，钱庄还办理企业之间的“比期”转帐结算业务。

常德钱庄通汇地点，以申（上海）、汉（汉口）、省（长沙）汇最多，还有少量渝（重庆）汇。钱庄设有钱业同业公会，会址在大河街财神殿，每日各钱庄业务人员都集中在此议定“拆息”（放款利息）和申、汉、省汇行情。汇价上落无定，拆息有高有低。钱庄经常利用银根紧弛和物价起落，互相欺诈，投机牟利。因此，每逢月之十五、三十为两个结算比期，有的钱庄获得暴利，有的则因投机失利或发生挤兑而倒闭。

常德钱庄，由于历史悠久，资力雄厚，业务灵活，手续简便，为商业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钱庄受到官僚金融垄断资本的压制，业务日趋衰退。至抗日战争时期，因敌机轰炸，市场停滞，常德所有钱庄均先后歇业。抗战胜利后，原有钱庄店主，鉴于币值不稳，心存观望，不敢重操旧业，遂无正式钱庄。但从一九四八年至解放前夕，一部分商人，欲图吸收游资，扩充商业资本，投机牟利，全市地下钱庄如雨后春笋，普遍开设。资力较大者有大生盐号、大孚、怡福、正记、远成等布号，恒福、益农、浮丰、建业等油号，以及同德纱号、华丰金号共十家。但由于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通货恶性膨胀，结果亦难保本生存，随着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结束，常德钱庄也成为历史往事。

粮 食 业 的 往 昔

胡建武

常德粮食业，由谷米行、豆麦行、杂粮种子行、粮食运销商和零售豆类、大米、杂粮的小商户（俗称“架户”）所组成。清末民初，较大的谷米行有恒丰昌、永兴昌、丰泰祥、姜洪泰、厚康、义厚福、刘景昌、裕太昌、李鼎元、广成发泰顺祥、德福昌、兴盛太、惠茂、同新、新顺十六家。共有资金五千银元，年营业额约三十五万三千银元。当时这些谷米行资本微薄，纯系代客买卖，只要有少量本钱，领一牙贴，即可营业。因便于粮食装卸、利于客商，谷米行大都集中在大河街一带。

随着农业生产的丰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粮食业商户亦有增有减，业务有升有降。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常德市区主要牙行网点调查》，本市谷米行已增至二十六家、豆麦行十家、杂粮种子行四十八家。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常德县工商业现况》记载：“常德谷米行共有二百多家”。后因谷价低落，买卖衰颓，“营斯业者较前大有减少”；另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大欺客，客大压行”，一般小粮行渐被兼并或淘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常德会战后，商会登记粮食行时就只有三十七户了，资

本约三十四万二千元（法币）。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又上升为四十四户，资本共二百八十六万元（法币）。

常德是滨湖各县粮食集散中心，每年出口数量很大。据一九三六年《湖南年鉴》载：本市“出口谷米五十万担，金额一百二十万元（法币）”。一九四八年常德商会清理文卷记载：“谷米年成交额达五百万担”。

粮食业中还有“河行”、“坡行”之称，两者经营范围也各不相同。集中在大河街一带的谷米、豆麦行，统称“河行”。其经营谷米、豆麦大多来自南县、华容、安乡、汉寿等滨湖地区。东门、大西门、小西门、北门外的粮食行，其货源大都来自本市郊区和邻县丘陵区，由旱路挑运或用独轮车以及从内河船运来常德，故称“坡行”。而大西门外的“坡行”又以经营豆麦、杂粮为主；东门外的“坡行”则主要经营杂粮种子。但大宗的稻谷、大米、豆麦、杂粮交易，仍集中于大河街的“河行”进行。

“河行”经营业务，主要靠“跑河”（业务人员之称）登船取样，兜揽船主，招引顾客为买卖双方说合成交。“河行”按货值百分之三抽取得行佣，计量以担为单位，每担四斛，每斛二斗五升，每升只按零点九八升折算。“坡行”经营业务，则靠“站场”（业务人员之称）看货、过斛、报场、议价，小至斗升豆麦，大至船运大米，过斛起坡均由“站场”人经手。

此外，粮食业还有分布在市区内外的零售商店，主营豆类、杂粮、糯米，一般属于个体商户，称为“架户”。对供应市民和饮食店的需求甚称方便。粮食业的较大户，资本比较雄厚，自运自销豆麦、杂粮的有翦质记、马乾记、黄华

记、聚兴、有余等户，其中翦质记拥有资金五万银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谷米行以大河街的赵兴昌粮食行的业务最大，店主赵春霖号称本市“谷米大王”，经销谷米日以千担百计，又包揽地方田赋谷物进出，承办军粮交接，交游广阔，可谓煊赫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常德市粮食业尚有六十八户，资金为二千零八十五万元，一九五一年以后，在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指引下，私营粮商大部分转业或歇业，直到一九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时为止，粮食行实际只剩下三户，这时所有店主、职工均安排到国营粮食部门工作，发挥所长，各得其所。

机杼之声话土布

胡建武

常德土布（土产白布），俗称“家机布”，是常德、桃源、临澧三县农村副业产品。据清嘉庆十三年（1808）《常德府志》载：“居民务本，勤于耕织，自崇德以来，制锦绣为业，其色鲜妍不减成都锦官”。曾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农家男女农事之余，多从事纺织。织布机户散居于常德县的石公桥、镇德桥；桃源县的漆家河、盘龙桥；临澧县的鳌山、朱日桥等地。机杼之声，昼夜相闻，所产土布，除自给外，多余的布均售于常德县城布店，因此该县遂形成了大批土布之集散市场。经营土布、棉纱的商店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

常德土布因系农村副业产品，不计工缴，售价低廉，布质厚实，着之温暖，又能抗炎爽汗，深受劳动人民所喜爱，它不仅在滨湖各县享有盛誉，还远销省外。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湖南统计月刊《常德县调查记》报导：“……属于手工业者，有大布、皮箱等物，而以大布（土布）销售区域为最广，曾及于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五省”。清末民初“洋布”（机制细布）未投入市场之前，土布外销量最盛时年达三百万匹以上。川东之秀山、龙潭；贵州省会贵

阳市；滇东之盘县均成为常德土布的集散中心。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湖南工商半月刊》载：“常德每年出口大布300,000匹，总值600,000元（银），销路贵州、四川”。

常德土布在匹头充斥市场之后，滨湖各县销售市场大为缩减，但在湘西各县和川黔远境仍有一定的市场。抗日战争爆发后，沪汉沦陷，匹头、棉纱来源断绝，我省纱厂亦西迁，此时土布、土纱的生产又暂趋活跃，国民党军政部被服厂也来常德采购土布，以充军需，销路有所复苏，可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机制布、机制省青布、国产龙头细布充斥市场后，土布市场逐渐归于淘汰。

常德土布的纺织，纯系手工操作，如纺纱、浆纱、导丝、牵纱、织布等。每天一座木机可织布一匹。成品分“毛布”和“光布”两种。其中又有“全机”（全是机纺棉纱织成的），“全棉”（全是手纺棉纱织成的），“机经棉纬”（经纱系机纺纱，纬纱是手纺棉纱织成的）。“毛布”是指从织机上取下的胚布，“光布”是经过人工捶整，使其光滑美观的土布。由于系用手纺棉纱织成，因纱支粗细不匀，织布密度不一，每匹布的幅度和重量也有差异。漆河布的规格每匹长度为四丈四尺（市尺），宽为一尺四寸，重量在两斤之间，故质量方面又有上、中、下等级的区别。均由布店收购人员（俗称“看庄”）鉴定议价购进。

县城土布店的经营以外销为主。为保持商业信誉，致力竞争，“看庄”人员将收购的土布，凉干后（以防霉变），再由“拼庄”（按土布质量进行搭配）人员，分三级拼庄打卷，每卷50匹，每匹布上盖有价码，附有码单，标明等级，

以保“货真价实”的信誉。

外销土布，统称“卷布”。又分“顶尖”（系光布），“提尖”（次于顶尖的光布），“毛尖”（系胚布）。较大的土布店自设有染坊，将土布加工染色出售，一般布店则委托染坊（染布手工作坊）加工。其中：“顶尖”土布都染成“苏蓝布”（本县永康布店的“天官牌”苏蓝布还远销广东），“提尖”土布染印花布；“毛尖”土布印染“毛蓝布”。这三种布各有用途，“顶尖”用以做内衣裤；染色后可以做外衣敞穿，它的色泽鲜艳，布面滑整；印花布做床单包被，特别用以制作女旗袍，三十年代曾风行一时。“提尖”多染绿布，“毛蓝布”用做包头巾或围腰等。上述色布的特点是：先用牛胶处理后再用土靛染色，扎实繁厚，经久耐磨。嗣后改用进口染料，虽有革新，但面目全非，后因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匹头色艳美观，人们需要日益提高，染色土布的市场也日渐消失。

绸布业百年史略

张俊涛

常德绸布业是在清末民初新兴的一个行业，又是常德较大行业之一。

远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闭关自守，经济落后，人民穿着多用土布，少数人所穿绫罗绸缎，均购自苏杭或四川。

当时，布店以经营土布为主，货源来自桃源、临澧、常德等县的农家机户，品种单调，业务不甚发达。

鸦片战争（1840年）后，海禁大开，英国尼绒纷纷进口，日商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不仅向华倾销匹头，而且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纺织、印染工厂。面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情况，我国爱国人士和工商界同仁，基于民族利益和自身图存，倡议“振兴实业，誓雪国耻，自办纺织工业，制造匹头，抵制洋货，提倡经销国货。”于是，我国纺织工业逐渐兴起，国产绸缎匹头普销全国，市场供销情况急剧变化，匹头销售额约占60%，绸缎销售占30%，土布销售仅占10%左右，自此，绸布业应运而生。

清末民初常德新兴的绸布业为两大邦口，即本邦——常德邦，自运邦——江西邦。本邦十三家（李亨泰、蒋万新、林义发、盛昌、永康、恒丰庆、义庆长、裕丰厚、张春发、

仁记、李元祥、蒋怡顺、蒋谦和)是经营土布的老布店;自运邦十八家(义丰泰、吉泰祥、吉和祥、怡大祥、同大美、怡太生、泰丰裕、谦记、乾裕协、民德昌、长和成、可泰祥、丰记、义孚信、晋大生、太丰恒、泰德昌、瑞兴和)专营绸缎匹头,均为江西籍人,故又称“西邦”。民国八年(1919)以后,绸缎匹头店效法申、汉,在经营上有很大改进,业务上有很大发展。

第一,经营形式多样。十八家专营绸缎匹头店,其中专营批发者三家,批零兼营者有十五家。这十五家中,又有四户开辟了“代庄”信托业务。

第二,资金运用灵活,一是充分运用资金雄厚的优势,扩大外销业务;二是争取外地厂商先货后款(如绸缎期款四十五天,匹头期款十五天),与往来客户定额赊销,千方百计把生意做活,三是利用钱庄信用贷款和招收私人积蓄存款,以及股东的“附存”(股东存入企业的计息不分红利的长期存款)。上述三项资金在该业合计约有三百六十万银元。按当时市价折算,贮存量有分类匹头二万八千八百匹、绸缎七万七千匹、土布二十四万匹。货源以上海为主,汉口、苏杭、长沙为辅。贮备充实,应市远销,绰有余裕。

第三,竞争措施有方。各店大都注重门面装饰,安装传统故事活动的人物,吸引过往行人;变店堂长柜为四方宝笼玻璃货柜,陈列商品,敞开供应,任凭顾客挑选;设顾客招待室,一般买主待以烟茶,较有来往的顾主或挑脚客贩,供餐留宿。以及做纪念,搞赠品,或放盘放尺,重视广告宣传,推介各类商品,招揽远近客商。

第四,财源茂盛有道,为了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能力，除了采取深购远销之外，还开拓“信托”、“代庄”业务，为外地客商采购百货、匹头、土布、陶瓷、南杂、食盐、铁麻……原船装载“回头货”。立足批发为主，扎根门市销售，因而业务大为发展。年销售量竟达一千一百万银元。其中批发外埠的约占百分之七十，门市零售的占百分之三十。匹头销售八十万匹，绸缎二十二万匹，土布七十万匹，从业人员共达四百五十人左右。店店有盈利，个别店获利更丰。如成德绸布店就有“百万富人”之称。

民国廿六年（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我国，该业货源中断，各号原有营运资金，均需偿还，库存大减，业务开始下降。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湘北危急。同年十月，日机首次空袭石门桥机场。是时，裕丰、久昌、美纶、祥纶、成记、义源等店自行歇业。成德、绮华、大新、介昌、松记、五丰等店分别西迁沅陵、贵阳、辰溪、茶洞、晃县、贵阳等地，保留货底，另图经营。不料，五丰绸布店疏散至沅陵途中，货船遭敌机炸毁，接着全家又在泸溪被劫。新昌绸布店也在疏散途中，遭遇匪抢。其余留常八户，由于日机轮番轰炸，房屋、货物、家具损失惨重，元气丧尽，濒于绝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湘北战局略趋稳定，常德地临前线，敌机时来袭扰。原有店主、股伙不敢回城复业，只有部分失业店员，为谋生计，冒着危险，筹措少量资金，在瓦砾中摆摊搭棚，开设了祥新、太和、九隆、惠丰、安昌、百维、集义七户布店，共有资金约十五万元（法币）左右，货贮量仅有抗战前的百分之零点六，货源仰求于衡阳、湘潭、韶关、长沙、津市等地，销路限于近县农村。全年营

业额约五万元（法币），仅及抗战前夕的百分之四点五。

一九四三年冬，常德沦陷，城区更遭浩劫，在敌人退却后，仍有少数人为生活所迫，陆续回城，清除瓦砾，摆摊设担，销售残货，以维生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抗战胜利声中，绸布业从业人员陆续回城的有十六户（安昌、大孚、福新、力华、鼎丰、一元、九源、新昌、绮华、德昌、新新、惠丰、大丰、五丰、九昌、竟成永）资金为一千一百四十万元（法币），货贮量为抗战前的百分之四点二。由于战争的原因，给常德绸布业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致使销路大大缩小，澧水流域的商户已改向津市进货；滨湖各县和川黔鄂边区，都直接转向长沙、武汉采购；沅水上游及邻近县城也只在常德添配少量商品，营业已远不及战前的繁荣兴旺。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国家利益和人民疾苦，悍然发动内战，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各绸布店每况愈下，备受摧残。据一九四九年端午节结算，绸布业十六家，皆告亏损。如绮华、福新、鼎丰等店都贴出“拍卖残货，实行结束”的歇业启事，其余各户也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

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九日常德解放，商民绝处逢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感召下，该业的工商业者，陆续将转往外地经营和疏散各地的物资，运回常德重新复业。户数由原来十六户增至二十五户，资本总额为三十六亿八千八百五十四万七千元（旧人民币），店员二百七十五

人，学徒七十人，工人四十人，共计三百八十五人。

一九五三年，国家对粮食和其他主要日用消费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自由市场逐渐缩小，计划市场不断扩大，绸布业在政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过程中，原来以批发为主的大户逐步转业，一部分中小户则为国营花纱布公司经销，代销商品。一九五六年元月，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深入，市人民政府根据绸布业的请求，首先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民族工商业者也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迎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常德解放前的电力工业

刘元惕

常德这座城市，清末民初夜间照明，比较普遍的是用桐油灯、煤油灯和蜡烛，只是大商店或群众婚丧喜庆日子，才用上煤气灯。这种落后的照明状况，与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日益显得不相适应。因此要求兴办电力工业的呼声遍及四处。

一九一七年九月，由胡鼎珊、罗北鼎等人集股银十一万两，报经常德县知事呈请首署立案获准，在常德城外太古码头地址，创办“朗朗电灯公司”。当时仅有一台美国慎昌出产的一百千瓦蒸汽引擎发电机组，只能供商业照明之用。嗣后，市区人口渐增，手工业有所发展。公司于一九一八年又扩建了一台同样型号的发电机组，一九二一年，因街邻失火，“朗朗电灯公司”的厂房、机器设备全被烧坏，无力修复而停办。

“朗朗电灯公司”被焚停办后，市区无电供应，商民多感不便。一九二二年四月，由常德商界蒋伟丞、李季洪、余罗生等二十二人发起，呈报省批准立案筹办“鼎新电灯公司”，确定公司法定资本二十万银元，作为二百整股但实际只收十七万七千九百银元。厂址座落在大西门外龙王庙石

柜，事务所设在北观音巷。当时厂内雇有工人十八名，每月工资支出共计五百三十一块银元，职员十五人，每月薪资支出共六百五十九块银元，膳食均由职员工人自理。在设备方面，购有美国制造的蒸汽引擎两部、德国制造的柴油引擎一部。前者马力为四百五十匹，后者为五百匹。发电机三部，抽水机三台。发电机的发电能力为六百九十一瓩罗瓦特，每年实际供电约六十万度。电压为二千二百伏，输电、配电亦为二千二百伏。供电时间一般在每天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六时。到了一九三三年，常德县政府为了抗洪排渍，在城北低洼处安装了两台四十五匹马力的抽水机，故在多雨季节，便在二十四小时连续发电。从此，不仅供应商店营业和群众照明用电的需要，而且还担负着城区排渍和制革、碾米等工业用电的供应。

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国实业志（湖南省）》载：常德市所装电灯总数为二千零八十八盏，表五十四万度（另有电力表六千度），电灯用户二千一百零九户。其中属于工厂用电三户，家庭用电八百二十八户，商店用电一千一百零二户，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住宅用电一百七十六户，路灯四百二十三盏（只收半价）。工厂、商店、家庭三种用户中，装电表者为五百零八户，包灯者计有一千四百二十五户。

该厂每年用煤六百吨，总值六千六百四十元，柴油二百五十斤，总值三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元。煤炭系由本省泸溪县舟运来常，售与公司，柴油则由驻常美孚洋行卖给，公司全年收入计九万八千四百七十二元。公司创办初期，营业情况甚好。一九二五年川军入常，横征暴敛，市面萧条，公司营

业额逐年减少，入不敷出。至一九三〇年，累计亏损达五万元。此时，公司共有职工六十多名，经理王相清、协理李季洪、主任技术员杨湘曜。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厂务决策由董事会负责，经理、协理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下设工程、营业、会计、材料、调查、机务、文书七股。一九四〇年，侵华日军南下，公司将三四四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卖给了常德专员公署，转运四川安装；余下的两台机组继续发电。一九四二年，湘北战局吃紧，日机不断空袭常德，又抢拆一部机组运往沅陵安装，少数员工随机组西迁。另一台机组被炸毁。这时大部分职工被遣散。经营二十年的鼎新电灯公司，不得不宣告歇业。一九四三年冬常德沦陷，直至一九四六年五月以前，因为战争关系，常德没有建立新的发电厂。

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经部分私人集资，分别组办了“光明”、“群力”、“启明”、“新德”、“民主”、“德新”六家小电厂。每家电厂只有经理、大车、副手、会计、出纳、收费员六人。发电为汽车引擎。解放后不久，国营常德电厂建立，这六家小电厂就先后停业转移、转产或歇业。以上是解放前常德电力工业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简况。

常德之信托、保险、堆栈、囤船之概述

胡建武

常德信托事业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激增，民元以来，从事斯业者已有萌芽。最初以土布店、棉花行及山货行为顾客“代庄”，受托购销业务；经营保险事业者，始自外资，国人随后，堆栈及囤船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亦应运而生。

常德之“代庄”。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月《常德县之工商业现况》调查：民国四年（1915），常德“谦记”布店，就已从事信托“代庄”业务，为沅水上游各县往来商号，代理货物购销。以后，民国十四年（1925），又有咸昌、永康；民国十七年（1928）有义泰顺、丰记、逢发祥；民国十九年（1930）有集丰恒等户专营或兼营代庄业务。

代庄性质。系代卖湘西各县及黔边境客商贩运来常德的桐油和山货等土特产，同时，为之代办上运商品，如匹头、百货、南杂、食盐、瓷陶铁麻等日用品，交原船运回各地。

代庄以布号、花行、山货行兼营者为多，专营者少。其资格之取得亦较易，只需得产地客商之信任，一经委托即可。

代庄之交易手续，至为简单，每日由经营牙行的“上街”（购销业务人员）到庄问货。评价既妥，立即成交，或

庄客、行家集中议价、作出“公盘”（公议行情），分户成交。所受委托人（代庄）之报酬，则颇不一致，有由委托人酌情出具酬金者；有因交情过厚而代庄却酬者；有因委托人向代庄购货而免酬金者。但一般均提代卖货值百分之一，作为酬金，名曰“笔资”。代庄对委托人平日须作详细之市场信息报告，名曰“卯信”。如有特殊情况，即以电报联系，买卖货物，价格须要绝对真实，并受委托人之信电指挥。如遇倒帐情事，由委托人自行承受，代庄只代为处理，不负损失责任，“天灾人祸，各安天命”。

代庄资力雄厚者，有时自行囤集客货，或卖空买空，盗卖客货，弄虚作假，从中渔利者亦有之。此业延续到一九五一年，各类农副产品及土特产，已由国营企业及供销社统一收购后，较大代庄合并集中组成土产贸易商行。自营购销，在党和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宣告结束。

兹将一九三五年前，代售桐油干件以上之代庄，列表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七月，聚兴诚银行在常德举办五种业务：代客买卖、代理保险、代办转运、代客保管、自设堆栈。该行可垫用资金，代客保管，则须先经客家之委托，此为常德正式信托事业之嚆矢。

保险事业。常德之有保险事业，自民国四年（1915）始，其时，英商安利英洋行来常办理进出口货物，附带兼营保险业；以后，太古（英），瑞成（德），先施（华），永安（华）等公司先后来常德办理保险。当时，投保者为数不多，一为商人尚无保险之习惯。二因保费过昂，感于负担过重。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常德工商业之现状调查》，是

庄名	经理	营业性质	资本估计 (银元)	每年代售桐油量估计(件)
咸昌	邹惠卿	布店兼营	20,000元	30,000
永康	殷伯平	" "	10,000元	25,000
兼记	刘厚安	绸缎号兼营	10,000元	20,000
义泰顺	庄小敬	花行兼营	10,000元	25,000
仁记	罗裕培	布店兼营	21,000元	20,000
恒新协	何辛臣	山货行兼营	5,000元	15,000
成昌和	黄子玉	" "	3,000元	12,000
德昌锦	刘锦泉	专营	不祥	10,000
裕记	李明海	山货行兼营	" "	6,000
立兴和	黄咏轩	纸号兼营	" "	8,000
代礼记	代少臣	专营	" "	5,000
祥丰和	单春霖	" "	10,000元	5,000
鼎顺长	钱少华	布号兼营	5,000元	3,000
福森祥	宋春甫	纱号兼营	10,000元	1,000

时经营保险业务者，有十二家之多，营业方面，竞争大起，只图取得保险回佣，不问保户情况，因而纵火图赔者亦有。

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常德保险同业，共收得保险费三万六千余元（银元），而同年度各家赔款却在八万银元以上，得不偿失，因而各公司遂有加价限保之共同决议。保险种类，分火险、水险、人寿三种。

兹就常德经理各公司保险业者的情况，列表如下：

公司名称	国 稷	设立年月	每年保费收入 (银元)	保险种类
安利英	英	民国四年	30,000元	水火、险险
太古	英		4,000元	" "
先施	华		2,500元	火 险
永安	华		2,000元	" "
华太平	华		5,000元	" "
英太平	英	民二十二年	2,000元	" "
宝丰	英	民二十一年	2,000元	" "
鼎新	英、美		8,000元	" "
北美洲	美	民二十二年	3,000元	水险,火险
联泰	华		2,000元	火 险
中 国	华	民二十一年	2,500元.	" "
华 安	华	民二十二年	500元	人寿险
总 计			36,500元	

堆栈业，有资可考者常德堆栈业。自民国十一年（1922）新新堆栈（独资）开业后，方有经营此业者。由于经营管理不严，曾有盗卖客货、私出栈单等有损信誉事故发生，一般商人具有戒心。后经商会、会同同业，陆续加以整顿，制定栈规，积弊渐改。以后，聚兴诚银行于民国十八年（1929），先后附设了一、二、三、四号堆栈，信誉昭著，对其它堆栈改善经营管理，起了促进作用。

兹将一九三四年常德各堆栈，列表如下：

堆栈名称	性 质	设立年月	栈房容量	资本 (银元)
聚行第一货栈	总行附设	民国十八年三月	谷一万石、棉纱五百包	
聚行第二货栈	" "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	油类三千桶	
聚行第三货栈	" "	" 六月	各货四千件	
聚行第四货栈	" "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	油类三千桶	
申记堆栈	独 资	民 二十 年 秋	谷三万石、杂货三百件	3,000元
新新堆栈	" "	民国十一年	谷 四 万 石	2,000元
同茂堆栈	合 资	民 二十一年秋	谷米三万石	2,000元
双美堆栈	独 资	民 二十二年秋	谷米一万石	2,000元
恒丰栈	集泰恒油行开设	民国二十年	谷五千石、油千三件	

除上列九家外，尚有寿记、恒泰、吉和、四海四家以及戴荣庆纱号自建的堆栈。

兹就其栈租分别列下：

一、谷米每石仓租洋二分；（银元）

二、油类每件仓租洋六分；

三、棉纱每件仓租洋一角；

四、倍子山货药材每件洋一角；

五、香烟每箱仓租洋一角；

六、肥皂、火柴、杂货等小件洋二分。

存入堆栈各货主，如欲提货时，先须缴验仓单，付清栈租，方可出货，此项栈租每月计算一次，至于上栈手续，货物进栈、栈方须先验明货物数量和质量，发给栈单为凭。货主如遇资金周转不灵时，可将栈单的银行押款。货物存栈上下力资，油类每件洋四分大件洋一角，贵重物每一件角，米每石五分。所谓大件，系指倍子药材、山货等件；所谓贵重物者，系指香烟、棉纱、布匹等类。

囤船。资金雄厚，经营范围较大的常德油行、山货行、药材行以及棉纱、匹头商号，为了方便在河下之过载交易，节省货物上下力资，均自行购置囤船、租贷给驳货船主管理使用。货主堆存水运货物，则按月付给船租。囤船客量可囤棉纱五、六百件，但船租则高于栈租，如棉纱每件月租洋三角，此类囤船沿河岸停泊者，约二十余艘。过路客商，亦有租存货物以待转运者，日久所有囤船船主，多作价转让给驳货船主，独自经营。抗日战争爆发后，常德迭遭日机轰炸，尤其一九四三年常德会战，多艘囤船，毁于战火。以后亦无经营斯业者。

百年老店吉春堂

胡建武

常德吉春堂药店，创业于清光绪二年（1876），民国十九年（1930）原业主以三万银元顶给城区有“朱砂大王”之称的胡祥阶药商。百余年来，以重视商誉，选料认真，善于经营，敢于创新，驰名城乡。

该店早年以朱砂拼庄配好、夹片多，深得顾客信任，创立了远销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名牌朱砂。对门市售药，选料认真，如天麻要色白透明、黄氏采用内蒙古的正路货，药物处理、糖制、酒砂等均古泡制，保证疗效，一丝不苟。在经营上别开新貌，兴建三层牌楼的石库门面，橱窗柜台商品陈列琳琅满目，又配以风物说明，新颖动人，店堂内安置铁笼关有活虎，更壮观瞻，每年冬季当众宰杀活驴、活鹿（炖胶），取信顾客。在成药方面，创新“防疫丹”，广为推销。如民国二十年，滨湖洪水成灾，时疫流行，该店派出店员，深入灾区散发“防疫丹”，又送给各慈善堂代发，分文不取，以资宣传。还把本市同行“葆泰”、“开源”两家药店所经营的参茸名贵药材买来摆在本店玻璃柜台内，对照陈列，标明价格，写着“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的招贴，开展业务竞争，在商品质量上以优取胜。同时，

在经营上敢于创新，打破药店不设坐堂医师的行规旧习，礼聘名老中医坐堂应诊，方便病友，增加营业。在商品包装方面，力求革新，如高级滋补药品，则用上海定制的精美铁盒。门诊配方药品，零包纸上则印有药名和药物功效解说，检对核算，责任到人，严格防止差错事故，并随药赠送滤药器一个，深受病家欢迎。为了掌握市场情况，在各地委有代庄或自设专庄，信息灵通，得心应手，不仅本店药物齐全，而且能在药材市场上调剂有无，从而居奇获利。建国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一九五六年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既继承了过去的优良传统，又开拓了服务的新门路，如配制验方，代客煎药，增设眼科门诊，服务周到，可谓又是一代新风。

春记福百货号与燕春舫

胡建武 张俊涛

(一)

燕春舫，桃源县人，一九〇五年生，幼年家境贫寒，民国初年随父来常德。一九二〇年十五岁时，在本市南洋西药房学徒。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先后在裕顺昌、张恒昌百货店当店员。后来，由于穷途潦倒，屡遭厄运，只得自谋生路。先经人介绍在一家烟蜡店赊购丝烟，贩卖。以后，又改卖针棉小百货，如毛巾、袜子等，手提篮子，串街走巷，沿途叫卖，除维持生活外，稍有积蓄。

一九三四年以后，燕春舫便与人合伙先后在常清街开设介湘、衡德、新胜等百货店。一九三六年，独资经营“燕春记叫卖店”，别开生面的用白布书写招牌，还用白布扯起过街横幅，上书“买卖不吹牛”五个绿色大字。燕春舫本人则经常站在店门口，大声叫喊着“都来买呀，这里的货最便宜”。他所卖的大部分是些小百货、儿童玩具。售价一般确低于同行业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左右。薄利多销，摆摊叫卖，招来了顾客，达到了生意兴隆，获利亦丰的目的。

一九三九年，佃王恒茂帽店地皮，修建铺面，将“燕春

记叫卖店”改牌为“春记福百货号”，扩大业务，批零兼售。到一九四五年，已积累资金二万八千多银元，黄金一百五十二两，购置田产近两百亩。雇用店员二十四人，学徒七人，并在长沙设有专庄，与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百货行业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购销活跃，成为常德市百货行业中具有较大声誉的企业。

建国后，于一九五一年，燕春舫响应党和政府关于搞好生产的号召，自动拿出黄金五十两扩大经营。由于他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工商界中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因此被选为湖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常德市工商联副主任，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春记福百货号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燕春舫担任了国营常德市百纺公司副经理。

(二)

燕春舫能在灾难重重的旧社会里，以较短的时间，发财致富，成为本市百货行业中的佼佼者，是费尽了一番心血的。他在经营管理上，表现的特点是：

第一，重视商品推介，便利顾客挑选。燕春舫在经营叫卖店时，用门板摆设商品，敞开销售。并利用叫卖吸引顾客，使顾客听得清、看得明，商品俯拾即得，买主感到满意。他在营经春记福百货号后，虽然业务扩展到批零兼售，但仍重视门市零售。在铺面、柜台、货架的设置上，仍然采取敞开供应的方法。商品陈列醒目新颖，明码标价公平，一切便于顾客挑选。有时并在店铺门前竖立招牌，书写“某某商品大

减价”、“某某商品大拍卖”，藉以推介商品，以广招来。

第二，薄利多销，实惠顾客。燕春舫在开设叫卖店时，即以商品价格低于同行业去争取顾客。经营春记福百货号后，仍以薄利多销，减价出售，实惠顾客，去战胜同行，赢得顾客信任。有一次，同行业一家百货店雇请乐队，吹吹打打，卖券开彩，争揽业务。对中彩者当众给予奖金或奖品，一时迎合了顾客的好奇和侥幸心理，引来了顾客盈门，生意随之兴隆起来。这时燕春舫即采取对策，声称：“他摇彩，我减价”。于是也打起洋鼓，吹起洋号，悬牌“大减价”、“大放盘”，用红绿纸条在货物上标明价格，写着“八八折收款”，号召顾客比质比价。这样不到半月，又战胜了对手。从此，春记福百货号的信誉越来越高，生意越做越兴旺。加以批零兼营，货源充实，购销渠道宽广，商品不仅畅销本市，而且远销湘西和滨湖各县。每天门市零售额达到五、六百银元。

第三，注重调查研究，讲求服务质量。燕春舫在经营上，一方面提倡“和为贵、礼为先，买卖不成仁义在，新老主顾要兼顾”的经营作风；另方面，细心观察店员在接待顾客时是否热情周到，生意是否成交。每当一笔生意没有做成时，他就追迹查访。如果发现顾客在别家店里买了本店的同样商品，回店就与店员共同分析原因，查找答案，改进工作。并告诫店员在接待业务中，一定要遵守“礼为先，和为贵，既要热情接待老顾客，更不可怠慢新顾客”的服务规章。

第四，尊重店员，善于用人。燕春舫常说，企业的兴衰，实有赖对企业全体同仁。因此，他重金聘请百货业的行家、采购能手郭霖为其坐镇长沙，分向申、汉、穗、杭等埠联系，

组织调运商品。为了使郭安心工作。还为他在长沙租佃一间住房，将郭的妻子也送往长沙与之团居，并提供膳食费用，以解除郭霖眷念家小之情。当郭每次回常时，燕必亲往车站迎接。郭受到燕的优厚待遇与尊重，感燕以德，更卖力为春记福多方组织货源，购进大批商品，为春记福的资金周转和业务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在职工薪资待遇上，按照各个人能力的大小，分等定额，实行有功则赏，一般待遇都略高于同行业。年终结算盈利，还发给每人一份“分等红利”。这些做法，对于鼓励店员为店效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聂振茂药号的兴衰历程

聂庆钧

常德聂振茂药号从开始创业到一九四九年常德解放时为止，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企业规模不仅在常德首屈一指，而且在湖南也算是最大的药店之一。我是聂振茂药号创业始初的第七代后裔，一九四七年任新记聂振茂药号董事会董事，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任副经理。对于聂振茂药号的创业史，因为年岁久远，缺乏资料记载，很难叙述详尽。只能就与前輩人交谈中得知的点滴、片断情况，作一介绍。聂振茂药号是一个具有浓郁封建色彩的家族资本主义企业，一百多年的兴衰变化，正是民族工商业在腐朽没落的制度下，走向覆灭的一个缩影，它所经历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创业到清同治年间是由发展而达全盛的时期

聂振茂药号的创业者聂承宗，系江西省丰城县人，继承外祖家遗业，在常德东门外二铺街开设聂元泰药店，店小资

微，亦未雇工，以自制销售“八宝眼药”、“附桂紫金膏”为主要业务。由于药物疗效好，颇得患者赞赏，因此生意兴隆，获利很丰。

为了扩大经营，聂承宗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本市水巷口创设聂振茂药号，主营饮片丸散，兼营药材小批发，雇有职工六七人。清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克常德，药业各户几乎均遭兵毁，唯独聂振茂幸存，一家独揽斯业，生意越做越大，职工也日益增加。至清同治年间（1852年至1874年），先后在江西樟树、湖北汉口、湖南湘潭等药材主要集散地开设“茂记”药号，并在广州、重庆、宁波、营口、祁州（现河南安国县）、禹州（现河南禹县）等药材集中产区设置专庄。这时年销售额高达一百多万银元，可获纯利二十万银元之巨，资金积累已达纹银百万两，仅常德一地，店员就有一百二十余人之多。此时声誉鹊起，为聂振茂药号的鼎盛时期。

二、从清同治末年到光绪年间为稳定时期

聂承宗在艰辛创业、苦心经营中深知，一个企业创业不易，巩固更难，要想把聂振茂药号这块金字招牌源远流长，延续发展下去，必须讲求生财之道。因此，聂振茂药号店堂内高悬“天人共鉴”、“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金字匾额和对联。昭示着经营之道，着重信誉。欲重信誉，关键在于保证商品质量。人称药店是“黑漆门路”，意思是说药品质量优劣难测，而利润又达高峰。而聂振茂药号自制的青丹丸散，始终不渝地坚持“遵古炮制”，恪守传统处方

配制，一丝不苟。如以参茸丸为例，配方系用“高丽野参”和“关东鹿茸”，比其他药店用“石柱参”、“西党参”和“南茸”、“西茸”配制的参茸丸，固然在原料价格要高出五至十倍左右，但疗效就显然大不相同。在其他丸散的配方上，也同样坚持不用伪次药材，而采用道地药材碎片、头尾，既无损丸散质量，又为门市饮片提高了质量。再如，创制名牌产品“聂振茂虎骨酒”亦颇费尽心机。在制作中不仅选料认真，而且将虎骨熬膏，然后用汾酒浸泡。汾酒购自汉口的最大酒坊“李大有酒号”。“李大有酒号”在清末之年，几将濒于破产，聂振茂药号为了取得专利特权，慨然贷给该号纹银万两，使其重整旗鼓，恢复营业。其交换条件是：“李大有酒号”卖给聂振茂药号的汾酒，酒质必须比售给其他药店的酒高十度。“李大有酒号”为了感恩图报，子孙相沿从不背弃诺言，因此聂振茂的虎骨酒，驰名湘黔，有口皆碑，成为以广招来的优质产品，同时还为其他商品如参茸丸、全鹿丸、大补丸，附桂紫金膏、八宝眼药等提高了声誉，使之畅销于滨湖各县、沅水流域，远至四川、云贵等省。由于药物质量好，疗效高，不仅丸散销售量大，而且饮片销量亦居本市同业首位，此其一。

其二，广布网络，深购远销。这样货物来源购自产地，减少了中间运转环节，就能达到耳目灵，成本低，在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的目的。药材中销售量最大的参、术、苓、草、归、芎、芍、地八大类主要商品，其中以销售最多的党参而言，均系购自西北、四川产区，较之在汉口、湘潭进货的价格要便宜得多。因而聂振茂药号的商品批发价格虽比同业要低，然利润又比同业要高。加以拣拆认真，质级分明，以致

湘西、川黔一带的药材商人常销售土产药材和采购外地药物的购销业务，无不集中在聂振茂药号进行。业务之广，已执常德药业之牛耳，每年批发销售金额约四十万银元，获利约七八万银元之谱。门市饮片、丸散膏丹，每月营业额亦在万元以上，年利润也可获得四万元左右。

聂振茂药号收购土产药材远销外地，称为做“下货”生意。喻之为生财的“摇钱树”，看作是发家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全盛时期的“下货”生意，相当于批零营业总额的一倍以上（年均约一百万元），获利不下十万元。主要商品是：湘西、川黔的特产朱砂、水银、吴萸、虎骨、穿山甲、麝香、杜仲等中和常德地区出产的半夏、桃仁、夏枯草、金银花、龟板、鳖甲之类的土药材。货源来自上述地区的往来商户和本市药材行、山货行以及本号栈房（仓库）所设的收货点。清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每年从湘西、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和本市药材行购进的朱砂达四百担左右。“上庄”拣选净货标上“聂振茂”牌名，运销广东、宁波出口，“中庄”牌名“永茂”、“下庄”牌名“裕记”，主要销往华北地区。在经营“下货”中，为了垄断市场，牟取厚利，有时也不择手段。如清宣统年间，当时店主聂启谦就自恃资金雄厚，动用现金数万元，趁“桃仁”新货上市之时，在滨湖、湘西、湖北、川黔一带，抬价大量收购，几乎把大片产区的“桃仁”全部收光，造成市场的紧俏局面。接着又借故惜售，乘机高价出卖，仅此一项生意就获利数万元。

其三，任人唯贤，管理严格。聂振茂药号在企业管理、员工福利等方面，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严明制度，因之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巩固。在雇用店员、工人方面，有“六不

用”：同宗族人不用；亲戚不用；带有家眷在城的不用；无殷实保人的不用；非江西同乡不用（厨工不受此限）；被别店解雇的不用。还有“六不准”：不准有偷盗行为，不准挪用公款公物，不准“犯夜”（宿娼）赌博，不准得罪顾客，不准擅离工作岗位，不准不听从安排。除此之外，还要品德好，无不良嗜好，业务能力强，忠于职守。对店员、工人的监督考核也是极其严格的。店规的执行，除经理外，主要依靠各部的“掌柜”（批发部门的负责人），“头儿”（制药间、仓库的负责人）。这些人都是在工作中俯首效力获得经理信任的人物，是经理监视考察店员、工人勤惰的忠实耳目。

同时给予店员、工人的薪俸和福利待遇也高于同行业。一般月薪为十二至十六元（银元下同）。高于同行业一般员工月薪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掌柜”、“头儿”的月薪为三十至四十元，对学徒每月也给二至四元零用钱（同行业对学徒只供膳食）。除月薪外，还允许店员做“小货”生意，贩卖一些非本店经营的商品，如颜料、切药刀、水烟袋、香云纱、荔枝、桂元等。资金由店里借，采购由“庄客”（本店坐庄的采购员）办，“小货”还可以同店里的药材一道装运，并且不计运输费用。所得利润按职工的工作表现、业务能力、职务等级进行分配。一般年景，店员每年所分得的“小货”利润，不低于本人薪俸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表现好的学徒也可分得一小部分“小货”钱。每年年终结算，店里在纯利中提取百分之五作为红利，按资历、职务、能力分给全体店员、工人，名曰“酒钱”。批发部门和“栈房”的员工，还有按货值价款向买主收取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的“包药钱”。

“店规”还规定员工除直系亲属死亡、子女婚嫁之外，三年内不得请假回籍。三年期满，给假三个月（包括旅途往返）回原籍探亲，工资按月照发，并另给三个月的实际工资，作为“满期俸”，以资奖励和关怀。员工膳食全由企业供给，每月有“牙祭”两次，改善生活。逢年过节特摆酒席相待。为了使员工安心工作，还安排有专为员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采买”，员工有何需求，可由本人写出条子，交给“采买”上街代为购买。店里长年雇有“裁缝”、“理发员”，专为员工服务，所有开支均由店里负责，其目的是使员工不致为日常生活琐事而耽误店事。

聂振茂药号解雇员工的原则是以“店规”为准绳，违反者轻则不加年薪，重则不再留用。每年农历正月初四，经理召集各部门的“掌柜”、“头儿”密议，其名曰“讲生意”，实际上是决定开年员工的去留问题。一经确定之后，于次日清晨，即以出“红榜”方式，对留用者的姓名写上“红榜”，注明来年薪俸、职务和工作项目；对解雇者，则榜上无名，张贴示知。榜末还写明：“有名者请赐红圈一个，无名者另请高就”。被留用的员工如仍愿工作，就在自己姓名上划一个圈，表示服从安排，接受留用；无名者就算解雇。这一年度的“讲生意”，一般商店通称“讲话”，是员工们忧心忡忡，极为担心的时刻。有人说“聂振茂的铁门槛有三尺高”，说明在聂振茂工作，很不容易，确实不为过份。

其四，有一个宗族的决策机构——“渊源堂”。聂振茂历经一百多年，拥有过百万资财，其经营决策和人事更替的主宰，都受命于江西原籍丰城县墩厚村的“渊源堂”。创业人聂承宗生有五子，称为“五大房”《聂振茂药号注册商标

“五老图即含此意）。以后人丁日增，“五大房”到清末繁衍为“十八家”。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世代相传到了第八代子孙，发展到“四十八户”，人口达二百八十多人。

“渊源堂”是为纪念创业人聂承宗而修建的“承宗公祠”的堂名。祠堂门首贴有巨幅楹联，“承先隆享祀”、“宗旨重伦常”的训示。聂振茂药号（包括各地的分设机构）的派选，均沿袭由“渊源堂”深孚族望，处事公正的尊长辈主持任命，子孙辈只能俯首听命，不得违抗。否则就视为目无尊长，不守家规。其对子孙派选的条件是：一要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不挪用公款；二要有经营管理能力，懂业务，有经验；三要处事公正，不徇私作弊。一般任期三年，如果称职可以继续留任。如果不符上述条件，即行撤换，调回原籍训斥，轻则扣发年薪，重则永不录用，株守家园，从事劳务。未派出参加企业工作的男丁，均在籍从事农事，妇女在家勤于纺织。子孙要恪守“孝悌为本，勤俭持家”的祖训，谁也不能违背。

这段时期，由于至高无上的宗族权力的控制支配，封建礼教在子孙辈中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创业精神尚未泯没，思想也还比较统一，因此，聂振茂药号的业务和声誉得以稳定达三四十年之久。

三、从清末民初到解放时为衰退时期

聂振茂药号是一个封建型的家族资本主义企业。又是众多家族人口的衣食主要来源。清末民初，由于家族人口日增，意见分歧，加以社会民主风气的影响，礼教的“家法”，严

格的“店规”受到践踏，“渊源堂”尊长辈的权威逐渐动摇，以致家族中不少人挥霍浪费、嫖赌逍遥、吸毒纳妾、生活糜烂，有的人竟挪用企业资金达万元（银元）之多，其他各房股东也按此数要求企业给自己补齐，这样共抽走资金数万元，加以开支无限度的扩大，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经营实力，成为企业由盛转衰、终归陷于窘境的致命伤。

经营上陷于盲目性和管理上松驰，造成了企业严重损失。如民国初年，湖南军阀为搜刮民财，大肆发行“省票”以充军饷。当时聂振茂值年经理妄想获得横财，投机致富，对此种行将倒闭的“省票”，擅自作主大量收购，不久“省票”终成废纸，损失二十余万银元，致使聂振茂药号资力大为减弱。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湘潭“茂记药号”，店主对企业管理放任自流，使企业倒闭，也给常德聂振茂药号增添了困难。

战争给聂振茂加剧了摧残。二十年代中期，聂振茂为了重振家业，誓与本市同业“吉春堂”进行竞争。聂振茂凭借自己的牌子老、信誉好的优势，在城内常清街“吉春堂”对面开设分店，营业伊始，生意尚佳，夺取了吉春堂的部分门市业务。但好景不长，一九三七年六月开张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仅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分店遭日机炸毁，无力复业。一九四三年冬，日军攻陷常德，聂振茂百分之八十的货物毁于战火。日军撤退后，仅以疏散所抢救出的两船货物为复业基础，所值尚不过三万银元。而且，早在抗战初期，樟树“茂记药号”遭匪抢劫，损失惨重，迭连之灾，更使聂振茂大丧元气，资力更感不足。

抗战胜利后，股东内讧加剧，使企业处在苟延残喘、岌

岌可危的境地。为了挽救残局，经过族人反复酝酿，决定将长辈的权力，改为由“五大房”各推一人集体协商族务的办法。聂振茂药号经理人选问题，由尊长辈指派改为由“五大房”每届各派一人任经理和副经理，任期改为两年，轮流任职。这种轮流任职的制度，延至一九四七年因内讧加剧而告结束。同年因部分股东退股，改组为“新记聂振茂”，并在原籍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打破“五大房”各推一人的界限，投票选举董事五人，互推董事长。这一制度实行到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后废止。

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导致企业衰落的内在根源。常德聂振茂是“渊源堂”创业发迹之所，其资金约占渊源堂总资金的三分之一（约30—35万银元），樟树、湘潭两地“茂记”药号和汉口“聂振茂药号”约占三分之二。广东、宁波、重庆、营口等地专庄，均属派出的购销网点，并无固定资金，其活动资本视实际需要由内部调用，盈亏年终结算。股东的分配，主要仰给于常德聂振茂和樟树茂记药号两处。以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一段时期为例，渊源堂四十八户股东的分配有下列几项名目：

1、生活费。凡年满十六岁的男丁，每年按季领取生活费，其规定是：十六岁至二十岁的每年六十元（银元下同）；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的每年一百五十元；二十六岁至三十岁的每年二百五十元；三十一岁至三十五岁的每年三百元；三十六岁至四十岁的每年四百元；四十一岁以上的每年四百八十元。生活费用按季由渊源堂照发，作为股东的正常生活开支。全年所发金额在一万二千元至一万四千元之间。

2、月规钱。是给股东作为日常零星开支之用。按男丁

人口占50%，股份占50%，男丁人口多的，股份大的每月可分得20—30元；男丁人口少，股份小的每月也可分得5—10元。以四十八户平均计算，每月所发金额约七百多元，全年支出在八千多元以上。

3、年终分红。在各地药号年终结算的总纯利中提取百分之十作为股东红利，按各户男丁人口，股份金额各占50%的比例进行分配，全体股东每年可分得红利约两万元，以四十八户平均，每户可得四百多元。

上列三项固定分配的总金额数，约在四万元之谱，四十八户股东平均每户所得可达八百多元。这仅是正常的固定开支。此外，股东如有男婚、女嫁、丧葬等红白喜庆，平时可向樟树“茂记”药号预借500—1000元，自订计划逐年在红利分配项下扣除。

为了培养子弟，鼓励后辈读书，家乡还办有“渊源小学”，股东子弟入校，每年只缴学杂费10元，膳食、制服、课本等一切文具，均由学校供给，学校全年开支约五千元，全向常德聂振茂和樟树茂记药号索取。并规定子弟读初中的每年津贴一百元；读高中的每年津贴二百元；读大学的每年津贴四百元，出国留学的每年津贴八百元作为助学金。这项支出每年在二千元以上，尽管如此鼓励，但“渊源堂”子弟读书上进的，却屈指可数，截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止，只有大学毕业生一人，出国到日本读了一年补习学校，领取留学助学金八百元的一人，初中毕业的子弟也是寥寥无几。此外，“承宗公祠”每年清明、冬至都要举行极为隆重的祭典，还有四月十八日的“药王会”也需集中男丁恭诚朝拜，并大摆宴席，聚众吃喝，一年花费也需两、三千元。

聂振茂股东各家，由于收入宽裕，养尊处优，吃喝玩乐，已司空见惯。祖训“勤俭持家”早已丧尽，宠大的股东家用开支，不仅大大的削弱了企业的资力，加速了企业崩溃的危机，更为严重的是促使渊源堂这四十八家股东子弟养成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过着寄生虫的堕落生活，这是聂振茂所以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植下，聂振茂得到了多方照顾，勉强维持，延至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劳资双方从业人员仅四十余人，企业合股资金仅人民币五千多元，但由于职工群众当家作主努力工作，在店从业资方人员接受党的教育，废除了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虽然资金短缺，仍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光明大道，得到了新生。聂振茂的子孙在党的培养下，也抛弃了腐朽糜烂的寄生剥削生活，一个个走向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道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遍布全国各地，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力。在文化程度上，新旧对比变化很大，仅就散居在湖南长沙、湘潭和常德地区的十户“聂振茂”子孙统计，截至一九八五年止大学毕业的有九人，文化程度较之解放前大大提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城乡驰名的刘义茂线号

胡建武 刘元惕

刘义茂线号创业于民国元年（1912年），数十年以品质优良，用户信任，驰名城乡，为常德一家颇有声誉的丝线店。

刘义茂线店的创始人刘培厚，原籍陕西，其祖父刘文运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来常德为县吏，因而落户常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刘培厚学徒于皮货店，后因此店倒闭回家，跟随其父刘翰章经营“刘义茂布伞修理铺”。辛亥革命后，外国缝纫机输入我国，当时缝纫机适用的线，国内尚少生产，机制棉纱线（俗称洋线）已经代替手工棉线。是时，刘培厚的两个儿子，一名元恺、一名元惇，均已自立。父子商议，认为修理布伞，固然能够维持生计，但无发展前途，如果经营制线，前程未可限量。于是经求亲友资助，遂将修伞铺改为“刘义茂线店”（店址在本市武陵路），生产蚕丝制线，以供缝纫机用。同时，又加工机制棉线，供手工缝纫之用。由于全家动手，认真制作，勤俭办店，苦心经营，迄民国十年（1921年），常年棉纱线日销量平均达到三千二百只（需用三十二支棉纱半件，计二十它），经营就压倒同业，并顶买了毗邻“吴天昌线店”的

全部资产，就近购置了住屋，增设了染坊。

刘义茂的店堂里挂着一块“一言堂”三个金字的横匾，顾客进门从不拣货问价。该店也从来没有以“大减价”或“买一送一”等方式而张灯结彩，吹吹打打来招揽生意。刘义茂生产的线之所以经营不衰，成为城乡用户有口皆碑的名牌货，关键在于“货真价实”，赢得了顾客的信赖。为了做到“货真价实”，名不虚传，着重把好“三关”。

首先是“原料关”。制丝线所用的原料——蚕丝，本地所产价格虽廉，但条粗、不匀、质劣，不予采用。而是购自产丝名地，如湖北沙市、广东顺德、浙江杭州等地的缫丝厂。棉纱线的原料，全是用的上海“金城”、“松鹿”等名牌棉纱。

其次是“工艺关”。刘义茂的线一向以“胚子好、捻度紧、拉力强、根数足、无背股、不发脆、色泽鲜”等二十一个字著称。为了保持这个优点，特地委托上海“华昌棉纺厂”严格按照规格要求，进行半成品加工。抗战兴起，上海半成品来源中断，乃改道从汉口、长沙采购棉纱，发包给本市郊区农户木机加工并线，但一律要求并两道。质量不合要求的应予返工，验收标准一丝不苟。在染色方面也极为重视。次子刘元惇亲自掌握操作，做到下料标准，施工细致。所染绣花线，色彩缤纷，光艳夺目，为各贩卖商店和城乡妇女所喜爱。

再次是“成本关”。要达到“货真价实”，除了选料要精，质量要好之外，还要尽量降低成本，这样才有竞争力。因此，他们派遣三子刘元怡，四子刘元惕分别座庄上海和汉口，采购制线原材料，并兼购缝纫机的零配件、进口和国产缝

纫针、木纱线以及手工用针、各种纽扣、画粉，样样齐全，以方便群众。由于这些商品直接购自上海，未经中间转手，因而降低了商品成本，为薄利多销创造了条件。故刘义茂的线，不仅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价格上也较同行商店低廉。以致同业十余家均难于抗衡，只好放弃制线生意，专营丝头巾（俗称包头）业务。

刘义茂的线，由于“货真价实”，质量过得硬，顾客信得过，因此，一年四季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当时地方报纸评论称：“刘义茂鹤立鸡群，独占鳌头”。

刘义茂线店系独资经营，三代同堂全恃“家人班”手工作坊起家，是煞费苦心的。创业有五子一女，其中四子（元恺、元惇、元怡、元惕）均先后协助其父经营此店。所雇店员和工人亦沾亲带故。因而又有“齐家治店”的传统，家训严明，店规亦谨。子弟不染骄奢淫逸恶习，生活朴实，持家勤俭。对从业亲友，均视如家人，和睦相处，爱店如家，彼此信任。

由于经营得法，治店有方，即使在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时期，货币一再贬值的情况下，刘义茂线店不仅赚钱而且还赚了货。在日寇飞机轰炸常德城区时，该店将资财疏散下乡，经过清点店存物资，有棉纱二百件（每件四十它）、蚕丝五十担、缝纫针十二箱以及颜料等约值十万银元。在农村还购置有田产千亩以上。

建国后，在人民政府的鼓励和扶植下，刘义茂线号的生产进一步有了发展，积极从上海购置了两台并线电机，四台木纱机，实现了电机生产。一九五五年，先期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定名“义茂线厂”，一九五八年组成“常德市制线厂”。

华晶玻璃厂的经历与变迁

易正文

我父亲易筱秋、伯父易筱阳、叔父易筱奇、继伯父聂美臣（与父亲同母异父），都是以经营玻璃工业起家的。曾先后在长沙、常德两地合资开办玻璃厂三家，其中以我父亲主持经营的常德华晶玻璃厂较为出色。我是一九四四年继承父业的。华晶玻璃厂从一九三〇年由我父亲开始经营，到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公私合营，从公私合营至一九八四年，前后达五十四年时间，经历了两代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变化是巨大的。现就回忆所及，谨述其梗概如下：

一、由学徒到老板

我父亲生于一九〇四年，一家五口全靠祖父做裁缝维持生活，家境十分贫困。年幼的父亲，想外出谋生，苦于无门。十二岁时，得知姨妹在长沙替宝华玻璃厂当佣人，经她求情东家肖丽生，介绍入麓山玻璃厂学徒，经过八年时间的勤学苦练，成了一名出色的玻璃吹制工人，这时不仅解决了温饱，兄弟三人还积攒了三百银元。一九二四年，得悉长沙宝湘玻璃厂招股，便将这笔积蓄投入该厂，我父亲也随即由麓山玻璃厂转

入宝湘玻璃厂工作。从此，他不仅对玻璃制造的配方，熔化、吹制、退火等全部工艺过程有了进一步钻研，而且还逐渐学到了工厂经营管理的一些知识。于是立下了自己办厂的志向。

一九二九年，常德华晶玻璃厂因原业主不善经营，连年亏损，几乎濒临倒闭边缘。业主眼见景气不佳，自愿将厂子出顶。我父亲得此消息后，立刻在长沙邀股集资五千银元，其中我父亲与继伯父占股金一千三百银元，于一九三〇年顶下了这个厂子。从此，我父亲成了华晶玻璃厂的主要股东老板，并负责全厂的经营管理工作。

二、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

我父亲顶下华晶玻璃厂时，常德还有一家德山玻璃厂，规模与华晶玻璃厂基本相等。主要产品有煤油灯具、玻璃糖缸、玻璃花瓶、玻璃贮瓶、玻璃茶杯等五大类四十个品种。两厂势均力敌，竞争激烈。为了力争图存，我父亲运筹帷幄，在生产经营上作了不断改进。

一是深入调查研究，生产适销品种，实行工商兼营。华晶玻璃厂原来生产的玻璃器皿，只有糖缸、花瓶、煤油灯具等十来个品种，且绝大部分销往农村。因其品种不全，业务得不到发展。我父亲操业之后，通过在市场上仔细查访；发现玻璃器皿的零售业务，主要集中在东门城内各玻璃商店。这些商店既经销玻璃器皿，又经销和加工各类玻璃镜屏、梳妆镜盒、各式玻璃镜子、明瓦、平板玻璃；而且还利用平板玻璃的边角废料，代客裁划“宁波床”上的各式异形玻璃。因此生意做得很活。

为了打开销售局面，我父亲当机立断，决定①延揽人才，适应业务发展需要。他亲赴武汉，高薪聘请绘花技工戴宝书、镀光技工李松林。②根据各类产品的不同要求，选配材料。如平板玻璃，经过挑选，没有纹、泡、砂和水波浪的就镀光，以提高镜片质量。另外，还代客裁划门、窗玻璃，边角废料用于裁划“宁波床”上小块异形玻璃。这样做，既可因材施用，提高质量，又可降低成本，增加盈利。③迎合用户心理，精心设计顾客喜爱的各式图案。如农民结婚后都希望生一个男孩，故加工的镜屏上，画上各式公鸡图，很受农民欢迎。④更新产品，增加花色品种，招引顾客。如将彩绘镜屏，改良为刻花镜屏，既美观又经久。增加的新品种有专璃瓷坛、时新梳头镜、平板玻璃、明瓦等七十多个品种，比原来增加了若干倍。以后还兼营其他连带性商品。如搪瓷面盆、口杯、家用瓷器等。⑤开展工商兼营、批零兼售，实行前店后厂，设立门市部，陈列自产玻璃制品。由于产品与玻费者、外地商店直接见面，减少了中间转手环节，不仅能够及时了解各地用户的需求情况，而且价格也较其他玻璃商店便利，使用户得到实惠，加以经营作风端正，老少无欺，深真价实，花色品种齐全，任凭顾客挑选，因此，业务显著上升；企业发展很快。到抗日战争前夕，不仅挤垮了德山玻璃厂，而且零售业务为全市玻璃行业之冠，拥有资金八万多元，产品销售于沅、澧两水流域各城镇。

二是亲自配料把关，加强工资核算，注重勤俭办厂。华晶玻璃厂一共五十多名职工，管理人员只有两人。一名专职会计，一名管事。管事负责全厂业务外，还兼管批发、接待、开票等工作。我父亲则掌管生产配料等主要技术工序。

每月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作技术指导，对于制作难度较大的品种，如“荷叶灯盖”、“玻璃花瓶”等，即进行示范操作，励行节约，杜绝浪费，数十年坚持不懈。如熔炉清出未能燃尽的煤渣，均明确普工回收，用以烧水煮饭。对于技术超群的工人，他们年终分得的红利，可转为厂里股本，使之同工厂的利益挂起勾来。

玻璃生产是高温作业，连续性的生产工艺，又是易损产品，非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单独生产成品的。每件产品须经过选料、配料、熔化、制造、退火等生产过程，不论那一道工序出问题，都会影响产品的质量，甚至会使产品全部报废。为了加强每道工序工人的责任，在工资问题上，采取了“集体计件工资制”，即厂方按实际入库产品产值的百分之十计算制造工序工人的工资，按月由领班师傅与工人推选的会计与厂方结算领取工资。伙食由工人民主管理，集体开餐，伙食费用在整个工资发放前扣除，剩下工资再按各人底分分配。底分最高的为三十六元，最低的（学徒）为四元，一般可得底分的二至三“关”（即加一至二倍）。熔炉工人按制造工序计件总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二，由厂方另付。所有工序工种的底分，一年或半年由领班师傅和老工人根据每个工人的技术情况研究调整一次，同时提出工人去留的参考意见，最后由厂里定夺。实行这样的分配形式和做法，不仅能够促使每个工人、学徒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去关心生产，钻研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注重产品质量。同时还为厂里节省了管理人员，对厂里资本积累起到了有利的作用。

三是保证质量，信守商德，挽回利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誓雪国耻，反日浪潮席卷

各地。我父亲为了抵制日货，立即将原来经销的日产碟茶杯全部打碎，不予以售。同时，为抵制外商美孚洋行的煤油灯罩，决心改进工艺操作，将本厂生产的煤油灯罩、玻璃茶杯等由磨口改烧口，增加耐热度，减少破损，延长使用寿命。为了严格质量检验制度，责成专人把关，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已销产品，凡属出现纹、砂、泡、炸等现象，一概负责包退包换。这样，经营不到十年，生产速速发展，业务蒸蒸日上，最高年值为十七万六千多银元，销售金额为三十余银元，在全省玻璃制造行业中颇具盛名。

六

三、战争造成的不幸及其后

我父亲顶下华晶玻璃厂以后，经过几年苦心经营，生产业务方兴未艾。不料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九年四月常德惨遭日机轰炸，全城厂、店大部被炸毁，人心惶惶，生产面临困难。在此时刻，我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发出“前方抗战，后方生产”的号召下，出于爱国热忱和自身图存，一方面将烟囱披上伪装，同时，安装直通电话，与防空指挥部时刻保持联系，以便敌机来袭时，及时停止生产，疏散人员，敌机逃遁后再来开工，以保障军需民用。另方面，将货物疏散，近至郊区，远至沅陵等地。同时还拿出一部分资金，在桃源陬市购买了三千多立方米木材，期待着抗战胜利，再展鸿猷。然而，这一切打算，在后来都变成了泡影。运往沅陵的货物，在敌机轰炸中，化为灰烬，仅剩下几百担玻璃渣，几千立方米木材被洪水冲走，流入洞庭湖后被抢一空。一九四三年冬，日寇攻陷常德，华晶玻璃厂所有厂房、生产设备

以及储备物资亦全部毁于战火。我父亲在疏散途中，行至常德南岸拐堤时，被日军所俘，惨遭杀害。真是壮志未酬身先卒，先人事业枉费心。弄得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母亲和我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暂住长沙伯父家，这年我才十五岁。

一九四四年春，战争局势稍有好转。华晶玻璃厂已往是由我父亲主持当家，父亲去世后，股东中没有适合的人选能够顶起这副担子，故要我和母亲返回常德，由我继承先父事业。这样在继伯父、华晶玻璃厂的大股东聂美臣、华晶玻璃厂的管事黎效田等诸长辈的支持下，重建厂房，筹划尽快恢复生产。不料正在紧张施工中，烟囱刚砌出屋顶，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藉口防空为重，不准在城内建筑高层烟囱。因此建厂工程被迫暂停。经过多方探听，才知道事情的真象是：原已垮台的德山玻璃厂的部分人员，见华晶玻璃厂被毁，估计暂时无力复工，便乘机东山再起，从事小规模的生产。后来他们听说华晶玻璃厂重建厂房恢复生产，感到对己极为不利，于是便许以二百银元的干股和每月另给报酬贿赂这位官员，阻止华晶复厂复工。对此，我们正准备以华晶曾报国民党经济部备案，发有开厂证明，必须坚持“前方抗战，后方生产，支援前线”为由提出上诉。他们明知事情不妙，便又托人出面调解，即不再阻挠华晶修建烟囱，华晶也不上诉，自此这场风波方告平息。

直到一九四四年底，华晶玻璃厂恢复生产时，长沙还陷于敌手。当时全省生产玻璃器皿的企业惟独本厂一家，因此生意兴隆。为了满足市场需要，改季节性生产为常年生产，企业一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致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苛

捐杂税层出不穷，过境军队强征恶要，弄得工商凋零，民不聊生。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华晶玻璃厂的工人为了使自己的基本生活不为货币贬值而受大的影响，提出按实物计算工资的要求，经过劳资双方协商，一致赞成比例定为十比一，即生产十个产品，工人得一个。发放工资时，按当日产品牌价进行换算。由于当时早晚物价不同，工人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吃亏不少。加以国民党乱抓壮丁，适龄青年惶惶惊恐，无处安身。不少工人不安心生产，纷纷离厂回家，厂里生产遇到很大困难，延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不得不宣布停产。这时我携带全家老小以及部分残货迁往沅陵，等待解放。

四、企业走上了新生路之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常德解放，我立即从沅陵赶回常德。次日，一位解放军的师首长来到我厂，见面就说：“你们回来了，我们欢迎你。”并向我宣讲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希望我马上召集工人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特别指出：“你们如有困难，随时可以找我们，我们一定支持你。”态度和蔼，诚挚可亲。在他们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筹备工作，“华晶迅速恢复了生产，职工们干劲倍增。我除主持全厂的生产外，还主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担任了民主建政工作组的大组长。

一九五一年夏，我正在武汉采购物资时，突然接到厂里的电话，告知政府将与我合营，我兴奋的表示同意。返回途中与长沙股友商议，都表赞同。回常德后，在政府代表李焕英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迅速组成了“常德市公私合营华晶玻

璃厂股份有限公司”，我被任命为经理，李焕英同志为副经理，（公方代表），原业务负责人黎效田同志（私方代表）为副经理。同年八月二十日在假圣公会的教堂正式举行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常德市市长牛迪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宣布从当日起，华晶玻璃厂正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自此，“华晶”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工人成了企业的主人，我们原工商业者也成了半公家人，并逐步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华晶玻璃厂从一九五一年公私合营到一九八四年改名为国营德山玻璃总厂（我调离该厂为止），这三十三年中，生产发展之快，厂貌改变之新，是令人惊异的。现已完全由手工操作发展为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职工人数、产值、利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一年，年产值三十三万九千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职工六十人，厂房面积七千八百三十平方米。一九八四年，产值为八百九十六万元，为一九五一年的二十六点八二倍；职工八百三十人，为一九五一年的十三点八三倍，厂房面积十万平方米，为一九五一年的十二点七七倍。解放前，华晶最高年利润二万六千多元，一九八一年华晶玻璃厂的利润高达九十六万元，为原有华晶玻璃厂最高年利润额的三十六点三倍，并完全改变了私营时期工人老、残无人管、病了无钱治的凄凉景象。现在老有所养，病有所治，生、老、死、葬全部由企业包下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回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父艰苦创业，挣扎图存，用心良苦，但人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财产毁于战火。而今天我们全家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

政治上，党给我以莫大的荣誉，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市政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在生活上，合家六口，都得到妥善安排，过着舒适幸福的日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再也不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和压迫，作为我们原工商业者，对此莫不感到扬眉吐气，感到国家民族前途光明，大有希望！

抗战时期的计口授盐

刘元惕 张俊涛

食盐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与粮食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过去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说话：“宁可一月无油，不可一日无盐”，可见食盐的重要性了。

常德食盐的供应，原来仰赖于沿海地区的闽盐、淮盐，即所谓“海盐”。抗战时期，由于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沿海城市相继沦陷，“海盐”来源中断，市场无盐销售。少数商店将剩余的少量食盐收藏起来，以每斤七角至一元（银元）的高价出售，比原零售价格高达七、八倍，牟取暴利。由于市场食盐供应奇缺，城乡喧嚷一片盐荒声，农村里出现了“石谷换斤盐”的奇怪现象。这时，农村里还有人开办土法制盐厂，利用屋基土、稻草提炼硝盐出售，不但产量低、价格贵，而且涩口，也无济于事。

为了缓解民用食盐，常德县政府便从四川和广西调拨食盐采取配售措施：一、在城区三镇分设食盐公卖店。启明镇食盐公卖店设在东门外二铺街；沅安镇食盐公卖店设在汉寿街；长庚镇食盐公卖店设在上南门原戴荣庆纱号内。食盐公卖店非企业性质，系镇公所临时觅择的一间铺面作为售盐

处。也没有固定人员的编制，由镇公所临时指派一名经济主任或民政主任和两名干事具体负责：①先找各保筹垫一笔食盐周转基金，作为调拨食盐之用；②食盐公卖时，主持处理一切供应事宜；③卖盐期间，临时从油盐南货店雇请三至四名店员到公卖店司秤卖盐，工薪按日计算，每天给报酬一元。

二、实行“定点、定量、计口授盐、按月供应”的办法。每月每日供应食盐三两，由各保、甲按户造具“丁口册”（即居民、商店的花名册），由镇公所填发“计口授盐证”，交由居民、商户作为购盐凭证。由于人们对“计口授盐”普遍存在着怕买不到的心理，因此当公卖店通知各户持证前往购证时，彼此争相挤购，互不相让，有的人鞋子被挤掉，衣服被撕破，有的扯皮打架，秩序相当混乱。后来，每逢公卖店售盐时，镇公所不得不派镇警维持秩序。在实行“计口授盐”办法中，乡镇保长营私舞弊之情，几乎到处可闻，群众怨声载道。他们一般地采取多造“丁口册”，从而虚报冒领，私分倒卖，中饱私囊。当时群众中普遍流行着一首民谣：“甲长吃夹盐，保长吃饱盐，乡镇长吃盐不花钱”，以揭露他们的卑劣丑恶行径。

一九三九年秋季，川盐南运已通。四川的云阳盐，锅巴盐，经重庆水运至宜昌三斗坪，再经旱路挑运津市、常德。这时原来经营食盐的一些商店，又纷纷购进销售，从此食盐公卖店就宣告结束。

商办乞丐收容所史话

张俊涛

解放前，旧中国在帝、官、封三座大山压榨摧残的年代里，军阀割据，内战频繁，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工业凋零、商业不振、农村衰落，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少农民、工人、市民忍痛背井离乡，被迫乞讨街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常德商会（前称常德总商会），自民国五年——民国二十六年（1916——1937），为了整顿市容，维护社会秩序，征得商界人士的同意，对城市乞丐采取“收容供应”与“收容学艺”的方法。（即对老弱、残乞丐，予以收容供养；对儿童、少年以及年轻力壮的乞丐，予以收容习艺）举办慈善福利事业，创办既富有救济性又具有生产性的“常德商办乞丐收容所”。

“常德商办乞丐收容所”的前身为“常德工艺局”，始于民国五年（1916年），李宇田任常德会会长阶段。前时规模不大，收容乞丐只有20—30人左右，民国十九年八月（1930年），常德总商会依法改组为“常德商会”，票选杨少云为商会主席后，“常德工艺局”乃更名为“常德商办乞丐收容所”，所址位于四街巷内，悬有“常德商办乞丐收容所”长牌。先后收容乞丐共达120—180人左右，其中40%左右的乞

丐系老、弱、残，由收容所收容起来，供养膳食、衣着、丝烟；45%是12—20岁能干活的青少年乞丐，15%左右系儿童。儿童和青少年乞丐，通过一段时间的看管和供养，视其体质、性格、爱好、表现、再行分配有关管科学徒习艺，变消费者为生产者。

二十多年来，该所贯彻“救济与生产相结合”、“供养与学艺相结合”方针，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诚如该所二厅中门两侧悬挂的对联所云：“因材授艺，化莠为良”，群众称颂商会为常德做了一桩大好事。时至今日还在不少人们闲谈中，传为历史的佳话。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市场萧条慌乱，商贾巨富纷纷疏散下乡或西迁，商会处于半瘫痪状态。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商会采取紧急措施，收回清兑原“常德商办乞丐收容所”发行的1—3角纸币，遣散收容乞丐（接路途远近，每个乞丐发给1—3元的遣散费），自此，常德商办乞丐收容所的历史，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结束。

常德办乞丐收容所，经费来源于又具有多样性：

一是劝募基金：开办时，由常德九大行业即卷布、油行、花纱、靛碱、百货、匹头、钱庄、金银、油盐南货等店户一次性筹捐开办基金；

二是按月征收月捐：大户按月缴纳月捐1—2元，中户每月缴纳月捐2—3角，小户不出钱（指一般夫妻店），此项来源，一般只作为办事人员的工资和老、弱、残乞丐的供养支出；

三是发行“常德商办乞丐收容所”1—3角的纸币。

(传说发行额两万银元)专作生产费用的周转金;

四是营业收入：一部分投入再生产，一部分提成为生产人员的应发工资；

经费来源较充裕，生产、办公、供养支出并不困难。正由此如此，因而在即将结束阶段，(1937年上半年)仅用三天时间就收回兑换了的原发行1—3角的票币。

为抓好乞丐收容所的生产与管理，它有一套相应的管理机构。并配有一定的管理人员，聘请了一部分技术骨干。

组织结构：商办乞丐收容所下设办公室“两所”“四科”“一校”。两所即男女看守所；

四科为毛巾科：在师傅的帮教下，学习生产“面巾”和“浴巾”。

纸盒科：学习生产鞋盒、食品盒、蚊烟香等。

吹仙科：学本地乐器。

西乐科：学西方乐器(俗称音乐队)，是为红白喜事的居民户、大商店做纪念、影剧院散发戏单等服务。

启蒙夜校：由一位医生兼教员，每周星期五的晚上上课。使他们初识文字。

小天华科班：传授汉剧技艺，培养汉剧人才。

他们的待遇，总的说来，与当时市区其他企业相比，基本相等，有的略高，生产、工作一般稳妥可靠。因而多数乞丐习艺成人后，宁愿在所工作，不愿离所外流，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乞丐收容所宣告结束，他们全部被遣散。

同善堂创办始末

刘元惕 张俊涛

同善堂是常德商办的慈善事业单位，始于清嘉庆十三年（1809年），邑人黄元英、戴辑明、杨德川三人报请常德府县，劝各布店在交易时每匹布买卖双方各捐银一钱，举办慈善事业，借以解决贫苦百姓的疾苦，深获布业同仁赞同。

同善堂开始设立在小西门外，清道光七年（1828年）迁移北门外正街。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再迁至青阳阁（现豆腐社和建新小学地址）。先由黄元英、戴辑明、杨德川三人主管同善堂一切事务。光绪末年（1885年）改由林义发布庄老板林玉山（光绪年间拔贡）任同善堂老总。民国元年至抗日战争前，先后由常德商会常务理事罗裕培、监察理事孙少琨兼任同善堂老总，负责同善堂的堂务工作。

同善堂内部设秘书一人、司帐一人、收租员四人、守门兼司药一人、熬药两人。

同善堂的基金来源比较广泛，主要有四个方面：①清朝末年，按每匹土布成交买卖双方各捐银一钱。民初，改由每个季度由布店按交易总额每匹布收取捐款二十文铜元，作为同善堂的基础基金。②有的富户、客商后继无人，将自己所有的不动产全部赠给同善堂作为积德行善之用。③还有一些

富贾因湖田过多，十年九涝，租谷难收，自愿将产业赠给同善堂以扬名后世。④根据需要，向土布店临时募捐，等等。自一八二八年到一八八五年的五十七年间，上述商贾巨富赠给同善堂的房屋有一百多栋、田地有一千多亩。

同善堂举办的慈善事业也较多，如：①施舍义木。对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死后没有棺木安葬者，凭布业会员的证明，同善堂即发给一副匣子予以安埋。②举办义渡。由同善堂购买渡船、雇请船工在本市陡码头、德山苏家渡以及前乡、后河的湖汊、港口设立义渡，凡是来往行人一律免费过渡。③举办义塾。兴建同善堂小学（现建新小学校址）一所，招收的学生一律免收学费。④举办义冢。在德山和小西门外购置“义地”两处，为鳏寡孤独以及流落街头者死后无人收尸埋葬，同善堂即派人收尸埋葬于“义冢”祭扫。⑤施发年米。每年春节前夕，同善堂向各布店临时募捐米一百石，印发一升、五升的米票，由捐助户到同善堂领取米票，发给贫民户和倒头乞丐。⑥施发药物。如“糊米”、“霍香正气丸”、“治蛇丸”等等，凡是过往行人和乞讨为生的叫化子有求必给。⑦施茶。每年夏天在街道路旁设茶缸，供来往行人饮用。⑧施棉絮、寒衣。对在冬天寒衣寒被的穷人，同善堂可按人发给一件棉衣或一床棉絮。但在发放时，须将具领人的眉毛剃掉，以防重领。⑨设置路灯。在僻街小巷夜晚没有灯光照明的墙壁上挖一个窟窿，安放一盏油灯，照明引路。（后因鼎新电灯公司开办，设置路灯的事就停下来了）

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机制棉布兴起，土布逐渐衰落，加之农村连年遭受水涝旱灾，同善堂原基金收入随之大为减少。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日机不断轰炸常德，

城区于一九四三年冬会战中一度沦陷，同善堂所管房屋全部被毁，全市商民都已疏散湘西和附近农村，基金收入断绝。同善堂的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也都离开常德，同善堂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抗日战争胜利后，除原同善堂小学继续举办外，其他慈善事业均已停办。常德解放后，同善堂小学已由市工商联接办。至此，同善堂的历史宣告结束。

同善堂具有一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做了一些关心穷苦百姓的好事，赢得了社会上的好评，至今在老一辈的工商业者和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积德行善为功果，不问耕耘与前程”的佳话。

忆商办商业学校

张俊涛

一、商业学校创办始末

民国二年（1913年），常德总商会在“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由会长郑莲荪发起创办“常德总商会立商业学校”。迄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校舍被日机炸毁，加以经费来源断绝，学校被迫停办。在创办的二十五年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变化阶段。

第一阶段：从民国二年至民国八年（1913年至1919年），商业学校是一所七年制的旧制小学，即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校址设在府城隍庙（现市立四中地址）校长由郑莲荪兼任。课程内容主要有国文、算术。高小除授上述课程外，还兼授家庭簿记（日本式亦叫大鹿式）。学生大部分是城区商民的子弟。

第二阶段：民国九年至民国十八年（1920年至1929年），校址迁移在东围墙（现地区卫校地址）。校舍是总商会新修的三栋两层楼房，拥有十二间教室，设备比其他私立学校要好。课程内容，由小学课程改为初级商科课程。有商业簿记、银行簿记、官厅簿记（政府会计）、工业簿记、法学通

论、广告学、商品学、语文、数学等。余鼎任校长，教师由校长聘任。教师工资按时计算，每点钟银元六角，每月另发阅卷费五块银元。学生系招收高小毕业生，招生范围已由城区扩大到石门、桃源、慈利、安福（临澧）、汉寿等县，由走读形式发展到在校寄宿。

第三阶段：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0年至1938年），报经湖南省教育厅备案，将学校名称改为“常德商会立维新商科初级职业学校”。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二年由商会会长杨少云任名誉校长，学校行政与教学，主要由黄逸奴负责。民国二十三年以后，聘请杨文兰任专职校长。课程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又增设了英语、代数、物理、化学、体育等课。既有商科专业课程，又有普通初中课程，这是与第二阶段的不同点。课程安排上的变化，主要是鉴于商科毕业的学生在当时找不到出路，因为商界习惯于中式帐，不用横式簿记，由于学不对路，商店不用，此其一。其二是，政府财税银行部门虽然用的是横式簿记，但雇用的会计人员大都有裙带关系。商校学生因无此门路，虽学有专长，也无用武之地。学校鉴于这一客观事实，乃从课程安排上作了调整与补充，为学生作好两手准备。一手是，要学生学好专业知识，为毕业后就业创造条件；二手是，学生毕业后，如果不能对口就业，还可以报考高中、中师继续深造。

可是，由于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军阀混战的影响，学校时办时停，尽管经费来源好，师资力量强，还是办得不够兴旺。举办商科专业的十八年间，商中也只办了六个班次，毕业生只有三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对口就业的为数寥寥，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不得不另谋出路。这一事实说明社会办学

必须从社会需要出发，才有广阔的前景，否则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二、经费来源与收费标准

1、经费来源：从开办到结束，主要靠收“桐油捐”作为学校经费。即在桐油进关时，按每桶抽学捐一角，全年约可收油捐一万银元。

2、收费标准：民国二年至民国八年，举办小学教育阶段，不收学杂费，纸、笔、墨、砚、书全由学校免费供给。民国九年至民国二十七年，小学变为商科专业中学阶段，学费一律免收，每期每个学生只收杂费二元，寄宿生每月收膳食费五元。纸、笔、墨、砚、书由学生自备。

三、机构设置和员工待遇

1、民国十九年以后，学校设有校董会，由商会委员中推选七人组成。校董会聘请校长一人管理学校的全盘工作。

2、学校内部设校长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三部。教务部负责编课表、查进度、出考试题、选聘教师。训育部管理学生纪律，点名查到，调解纠纷。事务部办理学生食宿，发放员工薪俸，收取经费，修缮校舍，编制财务预决算。

3、专职校长月薪三十块银元，兼课按钟点另付报酬。教务、训育、事务等三部的职员每月薪俸二十四块银元，校役每月工资十六块银元。

附：历届校长和教师名单

历届校长名单

校长姓名	兼职或专	学 历	任 期	商会职务	其他
郑莲荪	兼职		民国二年— 民国八年	常德总商 会会长	
余 謧	专职	武昌商大 毕 业	民国九年— 民国十八年		
杨少云	名誉职		民国十九年— 民国二十二年	常德县商 会主席	
杨文兰	专职	法政大学 毕 业	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二十七年	常德县商 会委员	

商业学校教师名单

姓名	任课内容	学 历	专职或兼课	其 他
吴鉴青	商业簿记	武昌商大毕业	专 职	
杨德芬	官厅簿记	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	专 职	
朱云岚	银行簿记	武昌商大	专 职	
余 鼎	工业簿记	武昌商大毕业	专 职	
刘淑恒	商品 学	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	专 职	
杨文兰	法政通论	法政大学毕业	专 职	
裴 英	数 学	武昌商大毕业	专 职	
黄逸奴	国 文	读老学的	专 职	建设报主 笔代校长
李育凡	物 理	× × × 大学	兼 课	沅澧中学 校 长
唐庭华	化 学	× × × 大学	兼 课	
陈群林	数 学	明德大学毕业	兼 课	
熊庆球	英 语	民国大学毕业	兼 课	
王光伯	外国史地	民国大学毕业	兼 课	
周耀堂	历 史	湖南省立老二中毕业	兼 课	
成泰山	体 育	体育专校毕业	兼 课	
付儒珍	广 告 学	湖南省甲种商业学校毕业	兼 课	
杜述昂	生理卫生	南洋医科大学毕 业	兼 课	

川军在常德横征暴敛的片断

张俊涛 刘元惕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阶层人民饱经长期动乱，渴望和平与安宁，以资休养生息，图谋发展。然而，当时国内大小军阀林立，各据一方，拥兵争雄。据有关部门记载：到一九一九年初，全国军队达一百三十八万人，为一九一四年的三倍；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四。各地军阀为扩军争夺地盘，在粮饷不足的情况下，便在自己所盘踞的地区内，巧立税目，滥发纸币，加重厘金，派捐派款，尽情搜刮，就地补给。因此，各种税收成倍增加。以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一二年相比，烟酒税增加三倍，印花税增加六倍，田赋税增加七倍。尤其是湖南，“地当南北要地，受祸尤深，凤鹤频惊，饥馑荐至，富者室如悬磬，贫者地无立锥，阖閭凋零，商贾因之失业，田园寥落，农民几至辍耕。”

历称物产富饶，又系连结湘鄂川黔诸省咽喉要道的常德，从一九一四年湖南反袁驱汤斗争开始，至一九三一年宁粤战争爆发，在将近二十年里，一直成为南北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争夺盘踞、攫取粮饷的重要之地。几乎是这派军阀部队刚刚开拔，另派军阀部队又接踵而至，连年战火纷飞，自

相残杀，人民处境则“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特别是一九二一年间，湖北督军（山东人）因任用大批同乡人占据了湖北许多重要职位，严重排斥了本地绅商的政治利益，引起了湖北人士最大不满，使湖北地方绅商势力与督军为首的地方军阀的矛盾尖锐化。绅商势力无力驱逐督军，便运动湘军以武力援鄂，以实现“鄂人治鄂”之目的。当时，湖南、四川两省虽然表面上宣布脱离南北政府实行“中立”，即所谓自治。但内部南北派系之争并未统一，均力图通过援鄂来解除各自的内部矛盾。于是，经前川督来湘游说，并许以川军相配合，湖南决定兴师援鄂。从而爆发了在湖北境内的援鄂战争。

川军在援鄂进驻常德后，为了谋取钱财，首先撤掉了常德县县长及税务部门的负责人，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和部属，立即施行横征暴敛，肆意搜刮。一手预征民国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一年（1922年至1932年）这十一年的田赋税，一手加重厘金，新征桐油捐和烟土税（每桶桐油进关时抽银元两块）。更为令人愤慨的是，采取强制手段，胁迫商民筹饷。川军第二师进驻不久，即要挟常德总商会捐款二十万银元，限期三天交足。此时，总商会会长曾春轩鉴于市场萧条，一时难于筹措这笔巨款，再三恳求体念民情，缩减款额。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圆满答复，反而将曾春轩扣押起来作为人质。面对这样的情况，总商会为了息事求安，避免市场骚乱，维护商民利益，不得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商讨“救曾解危”大事，议定向花、油、盐、碱、卷布、银楼、钱庄、匹头、百货等九大行业筹措分摊，进驻川军则派枪兵上门催缴。次日，街头巷尾士兵川流不息，到处皆闻一片逼捐声，真是满

城风雨，狗吠鸡鸣。有的店铺因缴款不出，店主弃店逃走；有的店主不得不忍痛将妻室儿女的金银手饰统统拿出来抵交派款；有的不得不拍卖货底或变卖房屋良田，如款按期缴款。以致造成了不少巨商富户关门歇业。如卷布业的蒋万新、李亨泰、蒋谦和、蒋怡顺、维新和，匹头业的义孚信、裕厚昌民德昌、钱裕协、瑞新和，金银业的杨宝华、陈德华，药业的同济堂、慎余堂，油行业的晋昌生、集泰恒，丝业的鲍兴发等数十户，因受此害而垮台。其他小户，也因惧怕抢劫纷纷关门罢市。这时驻常川军又假惺惺地出示安民，号召商民复业，工人复工，市民回城安居乐业。据后来统计，川军部队驻常期间，全市商民被其刮走的钱财近八十万银元之多，导致了常德市场冷落，商业不振，工人失业，民不聊生的恶果。

解散袁祖铭部队的见闻

张俊涛·刘元惕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运动，广州、香港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浪潮。这时，四川境内各系部队，又结合起来驱逐驻川黔军。袁祖铭部属的驻川黔军，鉴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不愿与川军作战，决心加入广东革命军北伐，各将领自动与广东革命政府接头，王天培（袁祖铭部属第二师师长）部受委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任军长；李申（袁部属第一师师长）部受委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七军，后改为第四十三军，李任军长。袁祖铭被委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总司令。

袁祖铭是西南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军阀。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在短短五、六年时间中，不仅自己做过贵州省长，还保委过彭汉章、周西成当省长，他还先后任过川黔边防督办和川黔鄂陕甘五省联军总司令。他不仅“图霸西南”，还想“问鼎中原”，一心只想向外扩充势力。他在投靠北洋直系军阀取得贵州政权，在西南独树一帜以后，对广东孙中山先生既不卖帐，对新回云南重掌政权的唐继尧更看不起。当广

东革命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总司令时，袁曾说：“有奶便是娘，蒋介石送大批械款来，则助蒋攻吴，吴佩孚送大批械款来，则助吴攻蒋”。因此，迟不就职。革命政府才改委王天培兼左翼军总指挥。这时袁祖铭驻在常德。由于袁祖铭与黔军有悠久的历史关系，部下对他有相当的好感，对长沙驻军带来很大威胁。基于上述情况，湖南唐生智几经密谋，精心策划，待机诛之。一、首先将袁祖铭部队的师长李晓炎、旅长罗启疆进行收买，拆其后援；二、唐生智指使驻常的教导师师长周斓，巧设“鸿门宴”，逼袁就范，解散其部队；三、周斓坐镇指挥，部队与袁军穿插驻扎，密切监视其行动，并在下南门至陡码头地段安排三艘快艇，以防败络。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于农历腊月二十七（1927年1月30日）下午七时，周斓以个人名义，邀约已串通的湘西绥靖公署署长周鳌山作陪，请袁到常德总商会设立的“商事研究社”吃年饭。此时，袁祖铭既未料想早有预谋，又持自己兵力雄厚，满不在乎，毫无戒意，率指挥官何璧辉、参谋长朱××以及随从马弁等陪同赴宴。到达商事研究社后，袁祖铭准备上楼，周鳌山随即下楼并告知周斓已在楼上候驾。袁登楼后，一看主人不在，已知误入圈套，即破窗纵步上屋，企图逃脱虎口，不幸跌落在周斓部队的驻营地，被周斓的士兵捉拿枪毙了。随之枪声四起，周斓以一营兵力首先向城内攻打，另两营兵力配合夹击。袁祖铭的部队因无准备，打得群龙无首，慌作一团，不知所措。与此同时，袁祖铭部属警卫旅旅长许克祥又乘机反水（许是湖南人，在黔军中曾受排挤），从而加速了袁祖铭部队的全部瓦解和崩溃。战斗时，商店、居民紧急关门躲避，来往行人和讨米票的贫苦百姓，

一时无处藏身，不幸死于战火，尸体累累，血溅满城。游勇趁机抢劫，市面兵荒马乱，使人们行将热热闹闹欢度的春节，顿时浸沉在战火弥漫、鬼哭神嚎的悲惨声中。常德总商会为了维护市面安宁，保护商民利益，出面调停，收拾残局，告示安民。对于缴枪游勇，每人发给十块银元遣散费。这样才使市面恢复正常。袁祖铭的尸体由贵州会馆收殓。主要街头还贴有“袁祖铭是西南大军阀之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等横幅标语。

袁祖铭被捕杀后，其直属部队数万人，分散归投周西成和李申两军。至此黔军的名目也就消失了。常德市民谓此为“一卅”事件。

光明的历程 终身的幸福

谢海泉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不过是弹指间的事，然而在我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昔日的旧中国，外国军舰任意停泊在黄浦江上，外国租界挂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禁牌，国内反动势力横行不法，老百姓吃粮要背着成麻袋的钞票，挤在人群中去抢购，连年天灾人祸，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民不聊生，这种种鸟烟瘴气，早已一扫而光，成为历史陈迹。曾被洋人讥为“东亚病夫”的我国人民，已经一跃而起，成为“东方巨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十多年中，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努力，迅速医治旧中国的创伤，恢复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和巩固了各民族的大团结，人民生活也不断有了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历了坎坷的道路之后，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坦途，改革喜获成果，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心头又燃起了新的希望。真是盛世如花遍地春，前程似锦无限好。每一个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中国人，无不对此欢欣鼓舞，感到祖国大有希望，社会主义大有奔头。

每当自己回首往昔，面对现实，展望将来，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原工商业者转化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绝境中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并成为国家干部，这是党给我终身最大的幸福，说明党对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完全的英明正确。同时也是我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坚持“听、跟、走”，认真学习政治时事和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实践中努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结果。

常德解放前，我与人合伙开设信义药材行，除了说合交易、评议价格、以助货畅其流外，还自营购销业务。由于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把握住市场瞬息万变的脉搏，增强商品的市场竞争能力，生意做得十分活跃，在同行业中享有一定的声誉。可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期间，外患未息，内忧迭起，常德这块弹丸之地，既遭日机狂轰滥炸，又受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信义药材行不仅资力日益萎缩，而且业务几乎陷于停顿。原来指望抗战胜利，会有一个休养生息、图谋发展的良机，但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却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官匪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经济凋零，民怨鼎沸的更加黑暗景象。我们民族工商业者真是处于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一九四八年底，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辽沈、淮海、平津地区激烈进行，南京总统府已趋鸟兽散之势，我对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义愤填膺。故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早日到来，以便安居乐业。但是，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宣

传，加以工商界很多朋友也传说纷纭，怕共产党革资产阶级的命。因此，大户跑香港、去贵州，中户避往沅陵、所里。也有人劝我走离常德。一时使我心神忐忑不安，对共产党信疑参半，真是莫衷一是。当时我想，去台湾吗？我的襟兄在台湾任蒋介石侍从室警备主任，我去了以后，暂时生活虽有所靠，但长期离乡别境，寄人篱下，未必会有良辰美景。何况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吃尽苦头，教训良深！跑香港吗？那里是纸醉金迷、投机诈骗的花花世界，我是一条小鱼，肯定会被大鱼吃掉，到头来，会落得告贷无门，走投无路，亦非安身之地。思来想去，又认为共产党无非是“共产”，如果大家都富起来，社会上再无穷人，何尝不好，总不会象国民党那样摒弃老百姓，更不会象日寇那样杀人、放火，惨无人道。想到这里，我下定决心不离开常德了，但还是担心信义药材行名声在外，树大容易招风。于是把业务范围缩小，资金分散，坐观应变。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接到我弟（现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电告：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不受侵犯。喜讯传来，使我疑惧稍释，心情较安。等到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常德解放了，我在乡下闻讯后，立即回城，目睹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使我惊喜交加，额手称庆。几天后，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军长、常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道生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用，在天声剧院召开常德各界代表大会，我被邀请参加。刘道生军长在大会上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布了城市解放后的各项规定，同时着重阐述了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希望工商界人士大胆经营，支援人民解

解放军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我聆听之后，极为振奋，疑惧心情大为消失，立即着手恢复营业，在工商界中广为宣传。经过协助人民政府做些具体工作如借粮、筹款、征税、推销公债等，使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提高，认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国情，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民族工商业也受到了保护，因而从内心表示拥护。

一九五二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一时，平静的心情又蒙上一层疑惧的阴影。于是我抱着“扫地出门”的想法，以度过“五反”这一关。但事实并非我的想象，党和政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对我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而且指出在常德市工商界中不作“守法户”和“违法户”的划分，只是反对偷漏税收的行为。我才认识到“五反”确是对工商业者进行的一次爱国守法教育。澄清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我把抽走的资金又全部投入企业，扩大经营业务。当即受到领导和职工群众的好评。“五反”结束前夕，市人民政府就指定我组织常德市工商界代表团，参加中南区物资交流大会。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在开幕时作的报告中，再次阐明“三反”、“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与目的。指出“五反”是帮助工商业者肃清“五毒”行为，克服消极因素，为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铺平道路。还说：“工商业者有其积极的一面，是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应该克服消极面，积极生产经营，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贡献”。邓子恢主席的这段话，使

我受到很大地教育，告诫自己成为新人。我静心思考，正视现是，工商界中确有偷税漏税、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如果不清除这些污泥浊水，又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呢？联想到这里，思想开朗，是非分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这次物资交流会上，我就为本市推销了大批滞销秀油、皮鞋等产品，采购了本市急需的药材、机械，当场获得省商业厅厅长的表扬。回到常德之后，我更加主动开展业务活动，实行深购远销，供应城乡需要。同时推动全市工商界积极搞好经营，活跃市的，增加税收，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作场一切有益活动，都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促使我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步步前进。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对自己的教育也进一步深化，但总是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的心田。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党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下，我逐步明确党对民族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政策，就是使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对资产阶级成员，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放弃剥削，自食其力，消灭人剥削人的不平等制度，这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事情。我是十分赞成的。因此，在一九五四年就主动申请把信义药材行公私合营，政府领导见我认识端正，行动积极，态度真诚，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年恰逢组织“公私合营常德大饭店”，我被任命为私方经理。为了力争早日营业，

我抓紧动工兴建，翌年就竣工落成。开业之后，生意兴隆，门庭若市。继之，我又被调任全市饮食、旅栈、照像、洗染、理发、影剧院等行业的管理机构——常德市福利公司副经理。从这一段时间起，我由原工商业者成为国营企业中的领导成员，深感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和爱护，决心与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群众对我的期望。一九五五年，毛主席教导工商界人士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这时我正派到湖南省政校学习。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联系我国的历史实际，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近百年来，为了改变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被压迫地位，为了消除贫困、落后的根源，许多革命家和爱国仁人志士提出了种种政治方案，用武装的或和平的手段力图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镇压和阻挠，他们拯救中国的愿望全都变成了泡影，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繁荣、富强，而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去完成，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挽救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也只有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宗旨，加深了对党的热爱，坚定“听（听共产党的话）、跟（跟共产党走）、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因此，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都尽力发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至在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坎坷道路上，尽管思想上矛盾重重，但从来没有动摇对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不仅如此，而且还和工商界的同志互

相勉励，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坚守工作岗位，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就这样跟着党走，终于隧道尽头见到了光亮。

一九七六年，反革命集团“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重放光芒，党中央庄严宣布“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中的自食其力劳动者”。两会中央也及时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此时此刻我梦寐以求的夙愿已经实现，爱党之心更亲，报国之情倍切，大大增添了为四化服务的新动力。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和民建、工商联的同志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上级两会的指导下，围绕党的经济建设中心，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加强“三胞”联络、搜集整理工商史料等工作，还自办了三个经济实体（工商贸易公司、百花服装厂、兴中打印服务部），创办了“育才会计学校”和“革新幼儿园”。共培训了财会、家用电器维修、缝纫、打字……各种专业人员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安置了城镇待业青年五十二人，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好评。每当做出一点成绩，党和人民就对我备加赞许和鼓励。安排我为省、市人民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市侨联主席。我有十个儿女，为了使他们立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哺育之恩，我总是以我和我一家人的幸福来教育他们。知识是党和人民给自己的，一定要把自己的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要与工农相结合，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努力学习和工作。因此他们在党的谆谆教诲下，有七个儿女担任了工程师、医师、药剂师、教师、科长等职务，有三个儿女光

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近两年来，有两个儿子出国工作，大孙女又考上了留法研究生……。所有这些，想到我一个普通的工商业者，能享有今天如此之多的荣誉和幸福，完全是共产党和人民给我的，作为我自己来讲，只是在党的指引下，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这是微不足道的。饮水思源，我衷心感激共产党，一定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荣豪迈事业联系起来，誓志奔向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